

分类号：

U D C :

密级：

学号：405025514130

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

江西宜春禅宗与地方社会

Zen Belief and the local society in Yichun Jiangxi

袁 坤

培养单位（院、系）：人文学院历史系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张芳霖教授

申请学位的学科门类：历史学

学科专业名称：中国史

论文答辩日期：2017年5月23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评阅人：_____

2017年5月

一、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南昌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手写）：袁坤 签字日期：2017年6月1日

二、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南昌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南昌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表，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同意按“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手写）：袁坤 导师签名（手写）：涂若希
签字日期：2017年6月1日 签字日期：2017年6月1日

论文题目	江西宜春禅宗与地方社会				
姓 名	<u>袁坤</u>	学号	405025514130	论文级别	博士口 硕士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院/系/所	人文学院历史系	专业	中国史		
E_mail					
备注：					

公开 保密（向校学位办申请获批准为“保密”，_____年____月后公开）

摘 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禅宗在宜春地区传法脉络的分析和对三大祖庭寺院修建过程的考察，探究禅宗与宜春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

唐中后期，随着宜春地区人口的增多、经济开发的加速和科举文化的繁盛，禅宗开始在宜春落地生根。禅宗在宜春的广泛传播根植于宜春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人文环境，以及官僚士大夫对宜春禅宗的青睐。与此同时，宜春地区流传的诸多民间信仰与禅宗之间的冲突、糅合呈现出大传统与小传统共存于同一空间的和谐图景。建构于这一时期的诸多灵验故事不但映证了禅宗与宜春地方社会的积极互动，而且展现了唐宋时期宜春地区经济开发的历程和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宋前中期，朝廷对宜春禅宗的封赐达到了一个高峰，三大祖庭的增建规模也更为宏伟，四方前来修法的人数较之前有所增加。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禅宗开始从宜春大规模向南北诸省及海外扩散，奠定了“三大祖庭”地位确立的认同基础，宜春禅宗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而从其弘法规模来看，到宋后期又不断呈现式微之势。有宋一朝，政府放松了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土地私有越来越普遍，租佃关系进一步确立，以“禅农”“禅茶”为特征形成的禅院庄园地主经济即属于这一时代的产物。

明清时期，宜春禅宗逐渐衰弱下来，有的寺庙甚至到了僧散寺废的境地，禅院庄园地主经济的继续发展激发了禅宗与地方官府、土民的诸多矛盾。然而，地方士绅、大家族对禅院修建、法脉恢复的大力支持又使禅宗得以延续不灭。

关键词：宜春禅宗；三大祖庭；地方社会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ed to analyze the context of Zen's Dharma teaching and the three Zen ancestral chamber's constructed in Yichun,then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Zen and Yichun local society.

In the mid-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with population growth,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in Yichun,Zen set down roots and expanded gradually.It was based on the diversity of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economic and human environment , Zen spread widely in Yichun.Especially scholar-bureaucrat's fondness for Zen promotes it's development.Meanwhile,there are so many folk beliefs existing in Yichun,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Zen and Yangshan god presents a harmonious prospect as the two beliefs existing in the same space.Those efficacious stories not only underline the a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Zen and Yichun local society,but also sh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earlier middle Song Dynasty,it reaches a climax of dynasty's reward to Yichun Zen,also the three zen ancestral chambers became more grander, and the ri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come to study Dharma. During that same time, Zen spreaded further and faster from Yichun,it laid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ree zen ancestral chambers".That shows that it was at its height during the earlier middle Song Dynasty, and flagging in late Song Dynasty.In So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relaxed controls on the land and the population,privatising rural land became more common, and the tenancy relationships established further,Zen landlord estate economy featuring Zen agriculture and Zen tea is the production of this er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Yichun Zen was gradually weakened,such as some temples failed at last, and it aroused contradictory conflict between Zen and Yichun local society.Certainly, strong support of local gentry and family for Zen made it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Key Words:Yichun Zen;local society;three zen ancestral chambers

目 录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录.....	IV
第1章 绪论.....	1
1.1 问题意识.....	1
1.2 学术史回顾.....	2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6
第2章 禅宗在宜春区域传播的生态基础.....	8
2.1 区位与地理环境.....	8
2.2 经济与人文环境.....	10
2.3 沔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三祖庭的出现.....	12
第3章 禅宗与民间信仰的糅合.....	20
3.1 国家对禅宗的封赐.....	20
3.2 佛、道、民间神祇的并存.....	24
3.3 禅宗与民间信仰的冲突、糅合：以沩仰宗为例.....	31
第4章 禅宗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37
4.1 士绅、家族与禅宗：信仰传播中的引力及推力.....	37
4.2 禅农、禅茶与禅宗：禅院庄园地主经济的形成.....	43
4.3 官府、土民与禅宗：赋税纠纷及土地权的争夺.....	48
4.4 灵验故事所见的地方社会：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	54
第5章 结语.....	61
致谢.....	63
参考文献.....	65
附录一 禅宗五家七宗表.....	70
附录二 宜春各地区寺庵表.....	71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115

第1章 绪论

1.1 问题意识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最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禅宗。一般认为，菩提达摩东行中国传法，是为禅宗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其传至第五代弟子慧能，慧能开创南宗，弘扬顿教法门，标志着中国禅宗的形成。慧能之后，南宗分为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支主脉，后来又衍生成五派，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禅宗传入宜春，始于南岳一系慧能二传弟子马祖道一，其在靖安宝峰寺建立了道场；而盛于马祖首传弟子百丈怀海在奉新百丈山的传法，“海既居之，禅客无远不至，堂室隘矣。”^①百丈怀海传至黄檗希运，希运传至临济义玄，两人开创了临济宗；百丈怀海同时传法湖南沩山灵祐，灵祐传至仰山慧寂，两人是为沩仰宗的开创者。青原一系四传至洞山良价，良价传至曹山本寂，两人创立了曹洞宗。因此，仰山栖隐寺、黄檗山黄檗寺和洞山普利寺分别被称之为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之祖庭。

宜春仰山栖隐寺由慧寂禅师创建于唐会昌五年（845），得到了当时宰相裴休和江西观察使韦宙的大力支持，由唐宣宗亲题“栖隐寺”三字。到了宋朝，“栖隐寺”奉敕改名为“太平兴国寺”，前来主持过的高僧大德不计其数，慕名而来的文人分别有黄庭坚、范成大、朱熹等等。此时，栖隐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寺院面积达千余平方米，修法人数逾千。到了元代，其主持希陵禅师还曾进宫为忽必烈讲经，并得到多次赐号。元仁宗亲题“大仰山太平兴国寺”，并命大臣程钜夫撰文，由著名书法家赵孟頫运笔勒石《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禅寺碑》以资纪念。

临济宗祖庭在宜丰黄檗山。唐开成年间（836—840），希运在百丈怀海处承嗣佛法后驻锡于此，创建了黄檗禅寺。相传，唐宣宗李忱在即皇位前曾避难于此，与希运交从甚密，希运圆寂后，宣宗特赐“断际禅师”封号。到了宋代，黄檗禅寺仍然香火不断，声名远播，名士黄庭坚、苏轼先后造访过该寺，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在瑞州任职期间多次参谒。南宋绍兴九年（1139），改名为“报恩光孝寺”，祀奉徽宗。

曹洞宗祖庭——洞山普利寺，在宜丰县同安乡。唐咸通年间（860—874），

^① (宋) 赞宁撰; 范祥雍校点: 《宋高僧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236 页。

良价禅师云游至洞山，募村民雷衡土地建广福禅寺，在此弘扬佛法。到了宋咸平年间（998-1003），易名为“功德禅寺”，宋真宗亲书匾额。

宜春是禅宗圣地，禅宗“一花开五叶，三叶落宜春”。在屈指可数的禅宗“祖庭文化”中，宜春在数量上便占其三，是什么原因使宜春成为禅宗文化之圣地，又是什么原因使禅宗在宜春传胜千年而佛灯不灭并扬名海内外？禅宗在宜春传播演变的过程中与宜春地方社会有什么内在之互动？“大传统”与“小传统”又是如何争夺信仰圈并相依而发展？以上种种即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本选题写作具有可行性的关键依据。

1.2 学术史回顾

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宜春禅宗的动态演变进行考量，并试图探讨它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20世纪以来，禅宗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视角也从思想史层面过渡到社会文化史层面。海内外学者试图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宗教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并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宗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宗教在上世纪初就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①是为研究中国宗教信仰的扛鼎之作，他在该书中细致地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中国这一古老帝国在历经数次传统转换、民族冲突和文化融合之后，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稳定性和条理性的文明机制。但为何中国却反而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呢？韦伯提出，宗教理念的精神驱动力，即儒教和道教的传统本质，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中国缺乏一种宗教精神来刺激资本主义的产生。此外，韦伯还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进行了分析，作为官方正统的儒教，之所以对佛道及民间信仰一面持以高傲的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却又投以半信半疑的容忍态度，是源于宗教的共同特点：巫术信仰。它不仅能满足群众的心理需求，更能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神圣的依据。

杨庆堃则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②一书中探讨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组织中的多种功能及其体现形式。在他看来，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宗教社会，在中国下层社会，任何地方都普遍存在着寺庙、神坛等祭祀场所，宗教作为集体的象征，可以超越个人的功利主义，以其价值观和仪式来约束世俗利益，为共同利益凝聚集体力量，因而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可以站在共同立场上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并全

^① (德) 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等译：《中国的宗教》.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美)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身心投入到社区生活之中。而在上层社会，封建王朝的合法性从某种功能来说也与宗教的教义和神秘感错杂不可分。当然，宗教之所以能够受到统治者赋予的绝对合法性，是因为宗教首先能以超自然的神秘身份，强化和维持封建王朝伦理政治秩序的传统价值。由此看来，宗教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杨庆堃以结构—功能的视角将中国宗教分为两种形态——“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佛教即属于前者，而后者却是中国宗教构成的主导。在文中，杨庆堃之所以沉浸于对中国宗教的某些事物进行细致的功能性阐释，实是为了揭示宗教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那就是中国宗教通过庞大的家族制度网络和社会政治体系成功维护了中国文明中伦理道德秩序的长时段延续。

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从宗教信仰传播的角度来关注社会底层。韩书瑞以宗教为视角重构了北京的城市社会生活。她的《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①以明清时期北京的寺庙和民间宗教活动为中心论述了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在北京历史变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寺庙通过向世俗阶层组织捐赠、庆典、社团、休闲等活动，对社会经济及政治进行了巨大的整合。卜正民的《为权利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②则通过晚明佛教徒及广大士绅对寺庙的一系列捐助活动探究了佛教与士绅社会形成的关系。佛教在国家权力与地方士绅两者的调适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寺院为士绅提供了一个能展现他们精英身份的场所，而这也是导致士绅捐赠行为频繁出现的原因。谭伟伦主编的《民间佛教研究》则把眼光放在了新的研究点之上——民间佛教，从以往对义理和精英方面的研究转向探究底层民众中传播的佛教，他总结出地方佛教、宗派佛教、仪式佛教三组概念，从而建立起民间佛教的研究旨趣，他提出要“采取新的方法（田野考察与文献分析的双轨研究法）与新的态度（非认信性与批判性）来扩阔中国佛教研究的领域。”^③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欧大年也曾提到，中国宗教研究应该关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强调要研究普罗大众的地方宗教，其著作《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④即对民间佛教进行了论述。他们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民间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深化了对佛教的研究。

谈到这一点，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⑤也是很好的范例。她以下层民众和民间神祇为基点，围绕民众的信仰选择，认为“惟灵是信”是民众选择一种信仰的实用原则，即信仰需求。作者以个案研究为例对南宋时期流行的朝廷赐封进行分析，发现一种信仰能够被朝廷封赐，不仅要具备灵验的功效，

^① (美) 韩书瑞著；朱修春译：《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台北：稻乡出版社，2014年。

^② (加) 卜正民著；张华译：《为权利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 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页。

^④ (美) 欧大年著；刘心勇等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⑤ (美) 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更需要地方各阶层势力的通力合作。民众极力争取使自己信奉的神祇得到官方的支持，而官方则以赐封名号等手段对神灵体系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掌控地方社会的目的。

与此相映照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一批历史学者也开始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民间宗教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陈春声通过对广东潮州三山国王和双忠公两种信仰的探讨，认为其形成及象征意义的转换，与潮州数百年来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复杂互动的契合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①。而赵世瑜则在对碧霞元君和东岳庙两种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看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是：民间信仰为了壮大自己利用了国家权力，而国家也利用民间信仰来控制地方社会^②。相同的还有刘志伟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北帝信仰的研究^③。他们都注重通过某种民间信仰在地方的传播来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向边缘社会渗透的，这种视角对于研究禅宗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有着不言而喻的启发意义。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宗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禅宗的学术研究，葛兆光关注的是禅宗的文化层面，他在《禅宗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运用了独特的心理分析法对中国禅宗的人生哲学和审美情趣进行分析，并将它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心理性格、生活情趣、思维方式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结构在唐以后，就从“儒道互补”转向了“儒禅互补”，传统士大夫的“内倾”型心理性格、清净淡泊的生活情趣、简练含蓄的思维方式等等都是在禅宗的深刻影响下形成的，“禅宗以直觉观照、沉思默想为特征的参禅方式，以活参、顿悟为特征的领悟方式，及以自然、凝练、含蓄为特征的表达方式改变了过去佛教偏于灌输与说教的习惯，突出了表现与自悟，它正好吻合了士大夫们试图在诗画中表现自我细腻、微妙感受的希望”^④

另外，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⑤专门讨论了南禅的发展，他认为在中国佛学宗派中，正是这种公案接机、唱评棒喝的南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重大。同样是研究南禅，邢东风《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⑥则思考了禅宗思想和实践的问题。刘泽亮《士大夫与禅宗》^⑦提出，士大夫与禅僧的双向互动，不仅加速了佛教世俗化的过程，使禅宗走向鼎盛，也造成了禅宗的直接衰变。

^① 陈春声：《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②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③ 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⑤ 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年。

^⑥ 邢东风：《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⑦ 刘泽亮：《士大夫与禅宗》，《佛学研究》，1998年第6期。

也有一些学者关注着对禅宗寺院经济的研究，黄敏枝在《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①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唐代寺院所经营的土地、质库、高利贷等经济活动；法国谢和耐《中国五一世纪的寺院经济》^②一书运用敦煌文献、西域文书和汉语典籍述及佛寺土地管理、经济经营和慈善活动；张弓《唐代的禅林经济简论》^③一文则研究了禅宗的“禅农合一”体制，认为其促进了禅宗寺院经济的转型；周奇《唐代国家对寺院经济的控制——以寺院土地为例》^④从寺院土地的买卖角度来研究国家对寺院经济的控制；王建光《禅宗农业的形成与发展》^⑤认为禅宗农业从本质上来说仍属于小农经济形态，它是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也有对江西禅宗经济的研究。刘小平《〈百丈清规〉与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变迁》^⑥以《百丈清规》为视角结合唐代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探讨了唐代江西禅宗寺院经济的表现形态，以及分析了《百丈清规》对佛教发展的历史意义。李立民、习罡华《江西与农禅的关系》^⑦通过对禅宗公案和《百丈清规》的释读揭示了江西禅僧们在注重农业生产方面对禅宗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龚国光《佛教禅宗在江西的繁衍及民族文化特征》^⑧认为禅宗在江西的成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和儒释道的融合，禅宗具有的民间性和草根性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校的学位论文也开始关注江西禅宗的研究。巩丽君《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⑨一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分析了佛教在江西繁荣的原因，也从文化教育、公益事业、地方民俗三方面考察了佛教与地方社会两者之间的互动。张映雪《明代吉安府佛教与士绅》^⑩从佛教与地方士绅的互动上探究了佛儒二者的微妙关系，该地区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也影响了佛教的兴衰发展，但是佛教在吉安的重大影响决定了地方士绅对佛教只能持以支持的态度而非改造。施梅芳《唐代江西寺院经济探析》^⑪以《百丈清规》为视角力图考证唐代江西经济发展与禅林经济的互动关系，并考察了禅院农业经济的运作情况。黄熙蓉《清代江西书院与禅宗寺院教学比较研究——基于学规与清规的视野》^⑫以清代江西书院学规与禅院清规为研究对象，从教学法、课程内容、日常管理等方面探

^① 黄敏枝：《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北：台湾天一出版社，1970年。

^② (法) 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 张弓：《唐代禅林经济简论》。《学术月刊》，1987年第9期。

^④ 周奇：《唐代国家对寺院经济的控制——以寺院土地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⑤ 王建光：《禅宗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

^⑥ 刘小平：《〈百丈清规〉与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变迁》。《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⑦ 李立民、习罡华：《江西与农禅的关系》。《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⑧ 龚国光：《佛教禅宗在江西的繁衍及民族文化特征》。《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⑨ 巩丽君：《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⑩ 张映雪：《明代吉安府佛教与士绅》。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⑪ 施梅芳：《唐代江西寺院经济探析》。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⑫ 黄熙蓉：《清代江西书院与禅宗寺院教学比较研究：基于学规与清规的视野》。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究了两者在教学上的异同点。刘忠《江西佛教寺庙经济状况的剖析（1949.10—今）》^①则把视角放在解放后江西寺院经济的研究上，从国家政策变迁、江西时代经济发展来说明寺院经济从“农禅并重”向社会主义市场商业化的过渡。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禅学专著，诸如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②、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③、黎明中主编《江西禅宗文化》^④、段晓华、刘松来《红土·禅床：江西禅宗文化研究》^⑤等都对江西禅宗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和研究探讨。

然而，有关宜春禅宗方面的学术论著却屈指可数。除宜春学院做过一些禅宗发展、禅僧生平考证、禅宗旅游等研究外，目前所见的有：南昌大学超茶英《曹洞宗：一笔丰厚的赣文化遗产》^⑥从四个层面对宜春曹洞宗之所以能传胜千年的原因做了独到的阐释；吴雯也从四个方面对宜春禅宗林立的原因做了简短的剖析^⑦；刘泽亮《黄檗禅学与裴休、李忱》^⑧则考察了宜春黄檗宗的兴盛机缘，认为它与裴休等士大夫的大力支持息息相关，禅宗的兴盛是与知识分子相互作用的结果；陈金凤《宜丰禅史》^⑨一书对宜丰禅形成、发展、兴衰的历史做了全面阐述，并探究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原因，确立了宜丰禅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

以上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宜春禅宗提供了方法上的思考和资料上的借鉴，也为我们重新审视禅宗等宗教信仰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但是，需要指出来的是，他们无论是对宜春禅宗亦或是对中国禅宗的研究，多是从思想史、文化史的层面出发，忽略了禅宗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没有关注到禅宗与民间信仰的互动。禅宗的兴盛发展必然会与地方社会产生一定的联系，以“眼光向下”的视角重新建构禅宗的发展史，是我们尤为要重视的一点。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从考察禅宗在宜春的历史流传着手，打破传统意义上仅对宗教做思想层面上的研究，转向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探析禅宗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内在关系，通过分析禅宗与宜春当地民间信仰的冲突、融合，及其与周围村落的沟通，试图建构禅宗在宜春地化的过程，从而为禅宗之发展史做更广阔的脉络分析，更从宗教信仰的把握中来窥看地方经济与生态开发之变迁及其体现的国家与地方

^① 刘忠：《江西佛教寺庙经济状况的剖析（1949.10—今）》，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②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③ 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④ 黎明中主编：《江西禅宗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段晓华、刘松来：《红土·禅床：江西禅宗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⑥ 超茶英：《曹洞宗：一笔丰厚的赣文化遗产》，《南昌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⑦ 吴雯、陈荣庆：《宜春禅宗》，《华夏文化》，2006年第3期。

^⑧ 刘泽亮：《黄檗禅学与裴休、李忱》，《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⑨ 陈金凤：《宜丰禅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

的关系。

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讲述了论文写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宗教研究的相关学术史回顾；第二章通过分析宜春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来探讨禅宗在宜春传播的生态基础；第三章讲述了国家对宜春禅宗的封赐，以个案来分析禅宗与民间信仰的冲突和融合；第四章论及禅院地主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与世俗社会的土地之争，灵验故事所蕴含地域社会变迁的信息；第五章为结语，概括全文观点。

本文除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外，还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及方法，主要有如下研究方法：

1、文献法。文献法是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通过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客观分析，以达到研究的目的。在本文中，文献法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文献也不只是官方的、禅宗的、大传统的相关文字资料，民间的、非禅宗的、小传统的相关文献记载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2、田野调查法。人类学、社会学和考古学在研究中往往把田野调查法作为最重要的手段，田野调查需要研究者深入一地对被调查者进行细致的文化观察，并做客观的文化解释。笔者深入宜春地区对禅宗的发展状况进行实地考察，把握其基本情况，并对民间口述资料和文字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做相关信仰研究。

第2章 禅宗在宜春区域传播的生态基础

宜春地区经济开发的加速和人文环境的改善是从唐中后期开始的，并一直持续不断。安史之乱后及至宋时，北民南迁，宜春人口数量急剧攀升，地区经济得到“梯进式”增长；也正是在唐宋时期，宜春科举繁盛，成为著名的诗书之乡。本章即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来探析禅宗在宜春得以生根的生态基础，以及三祖庭的形成和三派系的法脉传播。

2.1 区位与地理环境

宜春市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在东经 $113^{\circ}54'$ 至 $116^{\circ}27'$ 、北纬 $27^{\circ}33'$ 至 $29^{\circ}06'$ 之间，北临九江和南昌，南接新余、吉安和萍乡，西与长沙、岳阳交界，东与抚州相邻。宜春市现辖袁州、樟树、丰城、靖安、奉新、高安、上高、宜丰、铜鼓和万载10个县市区，土地面积达1.87万平方千米。

宜春市处在赣西北山区向赣抚平原过渡地带，境内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森林覆盖率高，环境幽静，是禅宗追求宁静的理想之地。史载“环宜皆山也，然山山耸翠，极目远览，应接不暇，如在神仙洞府间，不待穷涯攀跻矣。”^①“宜丰之境，山奇而峻，水清而涟，其间代产伟人，且多隐君子焉。”^②可见，幽静适宜如仙境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一些隐居者的到访，又如：

大江以西，宜春之地最为胜境。仰山攒青，秀水流碧，佳丽之气钟于数百里之内，草木皆殊。古松虬骧，修篁幄张，隐映蔽蔚，万象森爽。^③

宜春不仅风景秀美，亦多奇山“（袁山）县北五里，峰峦秀拔，昔高士袁京隐居于此……（仰山）县城南八十里，为府之镇山，周回数百里，高耸万仞，不可登步，只可仰观，因名。绝顶名集雪峰，夏云气明其巅则雨立至，冬微阴即停雪。”^④优美的自然环境不仅是隐居者的选择之地，更成为佛道修行的绝佳场所。所以，宜春“昔之高人逸士，往往择幽境结茅茨，以为离世循俗之所，后人从而大之。

^① 康熙四十七年《宜春县志》卷1，《舆地》。

^② 道光四年《新昌县志》卷23，《艺文》。

^③ (宋)丁骥：《慈化寺记》，《宜春禅宗志》(杨宪萍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

^④ 康熙四十七年《宜春县志》卷2，《山川》。

故佛老之居，比他处为尤盛焉，兹化倒指之一也。”^①

弘忍亦曾说：“故知栖神幽谷，远离嚣尘，养性山中，长避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②禅宗提倡遁世禅修，远避尘嚣才能达到心境清明。宜春在隋唐之前尚属未完全开发之地，自然环境十分幽宁，自然成为了禅修的不二场所。

其次，宜春耕作条件优越，田地广袤，满足了禅宗“农禅结合”的要求，为禅宗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宜春境内地域广阔，地形虽以山地、丘陵为主，但因地制宜大量开垦梯田。据统计，宋代宜春耕地面积约为36万亩，梯田面积不少于14万亩。^③南宋诗人范成大经过宜春时写到“出庙三十里，至仰山，缘山腹乔松之蹬，甚危。岭坂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④广袤的梯田为禅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来源，以致“兹事且置饱吃饭，梯田米贱如黄埃。”^⑤据笔者田野调查，仰山栖隐寺目前还有大片农田和茶园，寺产颇为丰厚。如此，禅僧们有条件自谋生计，不再依赖于“布施”和“化缘”的生存方式。

其实，禅宗的中国化不只是表现为学理上的儒释道三者合流，还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百丈怀海作为从制度层面上巩固农禅体系的完善者，为禅修之人制订了《百丈清规》，在制度上强调修行和劳作并重，实现经济上的自立。从《五灯会元》记载的故事来看，他亦以身作则严厉践行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宗风。禅宗的夹缝中勃生就得益于农禅理念的提出，而宜春优越的农耕环境是农禅理念得以践行的首要条件。

最后，宜春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中心，减小了“会昌法难”的巨大冲击。会昌年间（840—846），唐武宗饬令一批僧尼还俗，并拆毁大量佛寺，开始渐进地毁佛。会昌五年（845），法难达到高潮，史载“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⑥不仅拆毁寺庙，强迫僧尼还俗“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斤两收检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⑦这一事件对佛教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在此前后，慧寂、希运和良价不约而同来到宜春结庐为寺、驻锡传法，他们得以在宜春一带大肆弘扬禅门宗风、开辟大小道场，自然是政令上

^① (宋)丁骥：《慈化寺记》。《宜春禅宗志》(杨宪萍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

^② (唐)净觉：《楞伽师资记》。《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石峻、楼宇烈等编)第2卷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7页。

^③ 王启祥：《宜春梯田》。《中国水土保持》，1986年第7期。

^④ (宋)范成大：《骖鸾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范成大：《石湖诗集》。四部丛刊景清爱汝堂本。

^⑥ (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校点：《唐大诏令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543页。

^⑦ (日)圆仁著；顾承甫、何泉达校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6页。

的不可顾及给予了莫大的便利。与西安、洛阳、开封甚至南昌相比，宜春在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给禅宗传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而安适的内部环境。

宜春以其特有的区位优势占据江西西北一角，为禅宗传播创造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2.2 经济与人文环境

宜春古称袁州，属扬州地。其最早设县始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迄今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其名源于城西的一处泉水，该泉以“夏冷冬暖，莹媚如春，饮之宜人”而著名，故称之为“宜春”。到隋开皇十一年（519）在宜阳县设置袁州，得名于宜春城北葬有汉高士袁京的袁山。唐宋大致沿袭不变。元时，袁州设有总管府，隶属湖南行省，至元十九年（1282）升袁州总管府为袁州路，隶属江西行省。明朝末年，今宜春境内设有三个府级行政机构，分别为：袁州府，管辖宜春县、分宜县、萍乡县、万载县，治所在宜春县；瑞州府，管辖高安县、新昌县、上高县，治所在高安县；临江府，管辖清江县、新喻县、新淦县、峡江县，治所在清江县。清沿袭大致不变。民国三年（1914），宜春属庐陵道，其后又不断变更。其名虽有不断变化，但宜春始终是赣西北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宜春是江西通往其他省份的交通枢纽，有着便利的水陆交通。史载：“（秀江）在府城北，亦曰袁江，亦曰渝水，源发萍乡县罗霄山。东流经府西十五里为稠江，至城下为秀江，下流三百里，经分宜、新喻，至临江府合大江。”^①秀江，也就是现在的袁河，是宜春境内的主流，其从萍乡发源，流经宜春、分宜、新余，在樟树注入赣江。在以水路交通为最便捷方式的唐朝，河流发挥了极大的交通优势，从秀江入赣江，可以北上南昌、九江过湖北，东北入信江去福建，南则经吉安到赣州转去广东，宜春正处于中间点上。而从宜春通过罗霄山脉的“岭路”则可以到达湖南的醴陵、株洲、长沙，“（袁州府）至湖广长沙府四百三十里，西南至湖广衡州府七百五十里。”^②宜春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江西和湖南的关键咽喉，“府东屏豫章，西控长沙，山水回环，迄为襟要，由江右而谋湖南，郡其必争之所也。”^③南宋诗人范成大从吴郡赴广西静江府任，就从南昌取道赣江转袁河，过宜春、分宜、萍乡，到湖南再到广西，可见宜春在交通区位上的重要性。皮庆生在研究南宋时宜春仰山神信仰得以大规模向外传播的原因时提出，宜春在全国

^① (明)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1937年，第3680页。

^② (明)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1937年，第3677页。

^③ (明)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1937年，第3678页。

交通网络中地位的提升也是一个导向性因素。^①

唐宋时期，从中原到岭南的主要线路也须经过江西，走水路则由长江进入鄱阳湖，再溯赣江至赣州，越大庾岭进入广东；走陆路则入九江，过南昌、宜春、吉安、赣州，越大庾岭通往广东。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宜春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唐初，六祖慧能在湖北五祖弘忍处得法后，为躲避迫害连夜从黄梅下九江，经南昌、宜春、吉安，翻过大庾岭到达广东，先后在广州法性寺、韶关宝林寺弘法，坐下弟子有怀让、行思等40余人，开创了讲求“顿悟”的南禅。在禅宗往南发展的过程中，宜春是传法途中重要的一站，史传慧能就曾经在宜春靖安山中结庐修法，当地还为此修建了禅院。慧能圆寂之后，怀让在湖南南岳弘扬佛法，开南岳一系，座下开出临济宗和沩仰宗；行思在江西吉安青原山开法化众，开青原一派，其后衍生出云门、曹洞、法眼三宗。慧寂从湖南沩山来到宜春仰山，希运从福建来到宜丰黄檗山，良价从河南、安徽等地云游至宜丰洞山，都得益于宜春便利的水陆交通。

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南移，袁州也是人口迁入区之一。仅以宋时宜春县为例，《宜春县志》记载“宋大中祥符年间，三万二千七百二十五户，五万七千五百九十四口。”^②更突出的是袁州府所辖区域内人口数量在由唐入宋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太平寰宇记》载“唐开元户二万二千一百。皇朝（宋朝）户主四万四千八百，客三万四千九百三。”^③更有研究表明，从唐元和年间到宋初江西诸郡的人口增长率来看，宜春遥遥领先处于首位，高达467.18%，如表所示：

州（军）名	元和户数	宋初户数	增长率
洪州	91130	130426	43.12%
饶州	46116	45917	-0.43%
江州	17945	43211	140.80%
抚州	24767	61279	147.42%
吉州	41025	126453	208.23%
信州	28711	40685	41.71%
虔州	26260	85146	224.24%
袁州	17226	97703	467.18%
筠州		26329	
总	293180	657149	124.14%

（该表引自黄利娜：《唐末五代江西经济开发》。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① 皮庆生在《宋代民众祠神研究》中有详细论述，认为仰山神在南宋时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得益于袁州在全国交通网络中位置的重要性、朝廷赐封的影响、灵验故事的编撰。（详见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② 康熙四十七年《宜春县志》卷六，《户口》

^③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95页。

^④ 黄利娜:《唐末五代江西经济开发》。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这一时期，不仅人口增多，南方经济和文化实力也不断增强，赣江流域也得到开发，经济优势逐渐凸显，史载“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①每到灾荒年份，政府都要从江西和湖南调拨粮食赈灾。阎伯玙在天宝间任袁州刺史“数年之间，渔商阗湊，州境大理。”^②虽不可否认这有夸逸之辞，但这一时期，宜春“百谷丰，万汇苏，而疆理无事。”^③却也是事实无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盛，唐朝是宜春从蛮荒之地向诗书之乡转变的重要时期，据有关研究显示^④，唐后期袁州中进士者多达30余人，居江西首位，在全国亦仅次于苏南，并且出现了两名状元——卢肇、易重。在科举的推动下，文人群体和诗歌活动也随之而出现，韩愈和李德裕因贬官而来到宜春，郑谷在退隐宜春仰山后，与齐己等一批文人群体进行密切的诗歌往来，宜春俨然成为了唐朝中晚期的诗歌中心。经济发展和文化繁盛是禅宗传播的基础，经济发达之地，能为禅宗提供足够的信众和经济支持，而繁荣的文化图景则为禅宗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2.3 沔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三祖庭的出现

达摩东行中国传法，五传至慧能，慧能开创南禅，南禅后来又演化为五家七宗，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其中临济宗后来分化出黄龙派和杨岐派两支。这五宗分别有其祖庭所在，袁州仰山栖隐寺是为沩仰宗之祖庭、宜丰黄檗山黄檗寺是为临济宗之祖庭、宜丰洞山普利寺是为曹洞宗之祖庭，韶州云门寺是为云门宗之祖庭、南京清凉寺是为法眼宗之祖庭。五大祖庭，三落宜春。那么，三大祖庭的形成会在历时性、共时性上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动态过程？三者之间又会产生怎样的交集？他们是怎样从宜春走向全国甚至海外？下面将进行论述。

五宗内，沩仰宗是最早创立的禅宗宗派。慧寂在湖南沩山跟随灵佑习法十四载后，于会昌元年（841）受“神”的指引，从湖南郴州王莽山来到宜春仰山建寺传法：

（慧寂）后参大沩山禅师，提诱哀之。栖泊十四五载，而足跛，时号跛脚驱鸟。凡于商榷，多示其相……自尔有若干势以示学人，谓之仰山门风也。海众抠衣得道者，不可胜计，往往有神异之者，倏来忽去，人皆不测。后敕追谥大师，

^①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8页。

^②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③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427页。

^④ 陈正祥：《中国地理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曰智通，塔号妙光矣。今传仰山法示成图相，行于代也。^①

唐僖宗乾符六年，仰山慧寂禅师初参沩山，悟旨执侍十五载，凡有言句皆为后世宗范。及领众住王莽山，一日，禅床陷入地中，地神告以：“此山不任和尚居止，东南有大仰山，乃人间福地。”遂迁止仰山。^②

慧寂在仰山传法，法嗣十人，分别为西塔光穆、南塔光涌、仰山东塔、霍山景通、无著文喜、新罗顺支、观音常蠲、东禅慧茂、明月道崇、处州遂昌。慧寂禅在栖隐寺只传三代，先后在仰山栖隐寺住持的有其弟子西塔光穆、仰山东塔、南塔光涌。南塔圆寂后，由南塔弟子彦新禅师住持，彦新之后便再无记载。而在慧寂得法弟子中，亦只有西塔一支传承最久，前后相传五代：西塔光穆、资福如宝、报慈德韶、三角志谦、兴阳词铎，之后法脉中断，且西塔光穆以下，各僧皆不见传，灯录亦语焉不详，人事无法细考，“传禅者以云门、临济、沩仰、洞山、法眼为五家宗派。自沩仰而下，其取人甚严，得之者亦甚少。故沩仰、法眼先绝。”^③直到20世纪50年代，虚云法师于真如禅寺挂起沩仰宗钟板，法脉断绝千年才复续。这也是造成仰山沩仰宗史籍阙如、信息多不详的主要原因。



图片一：栖隐寺慧寂禅师亲手所植银杏树（笔者摄于2015年12月）

当然，并非就是说自彦新禅师后，仰山栖隐寺就荒废不再，虽沩仰宗在仰山已断绝，但栖隐寺继而成为临济宗、曹洞宗弘法之所。如元代大德年间，临济宗十八代孙希陵长老化缘重振仰山栖隐寺，深受袁州信众的爱戴：

^① (宋) 赞宁撰；范祥雍校点：《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1页。

^② 《群书集事渊海》卷30，《慧寂住沩山禅床地陷》，明弘治十八年贾性刻本。

^③ 《说类》卷41，《禅教》，明刻本。

虚谷和尚（希陵禅师）辞仰山，赴径山，到袁州城里，四方檀信赎金钱褚币，委积满前。虚谷徐谢之曰：“吾不敏，两浙诸山，以吾颇谙宗趣，虚径山席处吾，欲吾开堂说法，阐扬宗趣耳。岂以贫窭见嫌。诸君所赆物请还，庶免新华严之诮也。”嘱侍僧，囊道具随身而已。^①

到了清朝，临济宗三十五世闲云定禅师也住持栖隐寺，曹洞宗也有禅师在栖隐寺传法。据考证，临济宗自闲云定禅师开始，在栖隐寺共传衍了八代。

而从法脉延续、弘法规模、朝廷赐封、名人效应四方面来看，仰山栖隐寺至少存在两个鼎盛时期。

一是慧寂在仰山初建寺庙之时，当时从而修禅者不可计数，得法弟子十人。江西观察使韦宙倾力支持修建栖隐寺，宣宗也赐额“栖隐寺”。在其得法弟子中，更有新罗国入唐僧五观山顺支，他不远万里从新罗来到仰山求法，《祖堂集》《五灯会元》记载了他与慧寂的故事：

五观山端云寺和尚，嗣仰山寂禅师。师讳顺之，俗姓朴氏，湞江人也。祖考并家业雄豪，世为边将……洎乎大中十二年，私发誓愿，拟游上国。随入朝使，利涉云滨。乘一只之船，过万重之浪。曾无惧念，不动安禅。径到仰山慧寂和尚处，虔诚礼足，愿为弟子。和尚宽尔笑曰：“来何迟？缘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禅师不离左右，咨禀玄宗。^②

新罗国五观山顺支了悟禅师，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竖拂子。僧曰：“莫这个便是？”师放下拂子。问：“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么字？”师作圆相示之。有僧于师前作五花园相，师尽破作一圆相。^③

唐时，新罗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顺支就是这次文化交往的代表之一。唐大中十二年（858）他随新罗遣唐使入中国，慕名到仰山随慧寂习佛法，归国后，创立了韩国沩仰宗。

第二个鼎盛时期在宋朝。到了宋代，“栖隐寺”奉敕改名为“太平兴国寺”，因为到这时，沩仰宗法脉已经失传，住持已变为选贤而任，前来住持的高僧大德不计其数，有曹洞宗仰山禅师、云门宗佛印禅师、黄龙宗行伟禅师等。慕名而来的文人分别有黄庭坚、范成大、朱熹等等，朱熹还曾在仰山设讲坛授业：

^① 《山庵杂录》. 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藏经》. 台湾：佛光出版社，1994年，第5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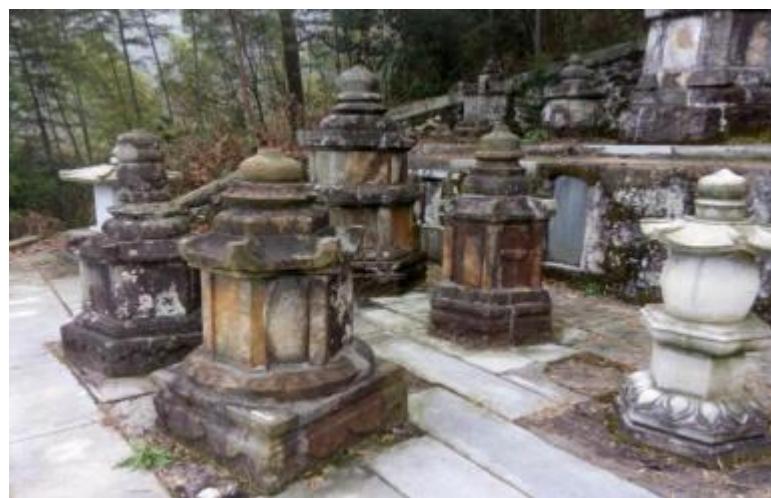
^② (南唐) 静、筠禅僧编；张华校点：《祖堂集》.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49页。

^③ (宋) 普济著；苏渊雷校点：《五灯会元》.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46页。

范成大，号石湖居士。乾道癸巳，至袁州，闻仰山名胜，特往游之，谒二王庙。晚出山，复入袁州，登化成岩，镌“寿眉”二字于石壁。^①

四藤阁，在府城南仰山寺。朱子帅湖南，经此，为学者讲道，郡士李长明等皆受业焉。^②

此时，栖隐寺发展到了又一鼎盛时期，寺院面积达千余平方米，修法人数逾千。但是此后，栖隐寺开始逐渐衰落，不仅法脉传承模糊，也少有朝廷封赐和高僧住持，虽则在元仁宗时也曾有过封赐的辉煌，但这只属于短暂中兴。



图片二：栖隐寺禅僧墓塔群（笔者摄于2015年12月）

相同的是，不止仰山栖隐寺在宋中后期开始呈衰落之势，洞山普利寺和黄檗山黄檗寺也同样难逃这个怪圈。

普利寺在唐后期达到了鼎盛，朝廷赐封不断，却从十世纪中叶起便逐渐式微。良价在洞山圆寂后，法脉传至同安道丕、同安观志和梁山缘观时，佛缘枯竭，孱弱之状日益窘迫。五传至大阳警玄，警玄不得已将传法大事托付与临济派高僧浮山法远，最终曹洞法统传与法远之徒投子义青，这才避免了法嗣断绝的局面：

洞山至大阳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仅得法远一人，其徒号远录公者。将终，以教付之；而远言吾自有师，盖叶县省也。延闻，拊膺大恸。远止之曰：“公无忧。凡公之道，吾尽得之；顾吾初所从之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尔。将求一可传公道者，与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许之。果得清华严清，传道楷。楷行解超绝。近岁四方谈禅，唯云门、临济二宗。及楷出，为云门、临济而不至者，皆

^① 同治十年《宜春县志》卷8，《寓贤》。

^② 同治十年《宜春县志》卷1，《地理》。

翻然舍而从之。故今为洞山者，几十之三，斯道固无彼此。^①

而且到宋末时期，曹洞正传法嗣也多不在普利寺住持，从洞山第五代到第十八代，普利寺住持也多为云门宗、临济宗法嗣，洞山法脉多不详。

相同情况的是黄檗临济宗，黄檗希运住持黄檗寺时，四方云集，黄檗禅备受朝廷和士大夫的推崇。但是希运圆寂之后，希运门下得道弟子都远离黄檗山四处开山弘法，黄檗寺也曾几度被其他宗派管理，如曹洞宗第三代慧禅师，就在黄檗寺活动过，云门宗在五代时期曾完全占据了黄檗寺，临济宗的重心渐渐转移到了北方义玄一派以及此后的少林禅系。

栖隐寺、黄檗寺、普利寺三祖庭地位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历时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三派兴衰交替发展，并从宜春向江西其他地区及中国南北地区横纵扩散，甚至移法海外，形成了庞大的南方禅宗信仰圈。而下面即考察宜春禅宗的对外传播。

如前所述，沩仰宗是三派中最早衰落的，其在仰山的传承仅一百五十余年，共传三代，之后便成为绝响。在江西以外传播的有杭州无著文喜禅师，浙江湖州人，咸通三年（862）至南昌观音院参仰山慧寂，后回到浙江龙泉寺传法，但是最后也没有传嗣：

杭州文喜禅师，嘉禾衢州人也。姓朱氏，七岁出家。唐开成二年赵郡具戒。初习《四分律》，属会昌废教。返服韬晦。大中初，例重忏度于盐官齐峰寺。后谒大慈山性空禅师。性空曰：“子何不遍参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观音院见仰山，言下顿了心契……七年旋渐右，止千顷山筑室而居。会巢寇之乱，避地湖州，住仁王院。^②

慧寂弟子中唯一延续不断的就是前述新罗国顺支禅师一脉在韩国的传承，他继承仰山慧寂九十七圆相，于乾符元年（874）归国，在五观山龙岩寺住持，弘扬沩仰宗法。所以，至今他们仍把宜春栖隐寺当作祖庭。

较之沩仰宗，曹洞宗和临济宗的传承脉络稍微要明晰一些，传播地域也要更加广阔，从江西繁衍至中国南北诸省。

良价之后，虽则洞山一脉传承微弱，住持的也只有其法嗣道全、师虔、道延等，且抚州曹山本寂一脉四传后即中断，其他法脉也都传承不远。但是有良价弟子云居道膺一脉真正将曹洞宗沿袭下来：

^① 《说类》卷41，《禅教》，明刻本。

^② (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215页。

洪州云居道膺禅师，幽州玉田王氏子。童卯出家于范阳延寿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师令习僧闻，篇聚非其好，弃之。游方至翠微问道，会有僧自豫章来，盛称洞山法席，师遂造焉……自尔洞山许为室中领袖。初止三峰，其化未广。后开法云居，四众臻萃。^①

云居道膺在洞山得法后，至九江云居山创真如寺，振兴曹洞宗风，徒众一千五百多人，其中有新罗国利岩、高丽庆甫等，利岩在归国后创须弥山派，是为韩国曹洞宗之鼻祖。

道膺传法道丕，道丕住持南昌凤栖山同安院，因此被称为“同安道丕”，曹洞宗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昌。道丕二传至缘观，缘观住持湖南常德梁山。缘观三传至芙蓉道楷，道楷于崇宁二年（1103）住持开封净因寺。道楷六传至万松行秀和天童如净，行秀住荆州成为曹洞北传的代表，如净住宁波成为曹洞南传的代表：

自是两河三晋，皆钦师（万松行秀）名。构万松庵以自适，耆宿敦请开法，师应之，次住中都万寿。金章宗皇帝诏入禁庭升座，帝躬自迎礼，闻法感悟。赐锦绮大僧伽衣。承安丁巳，诏往大都仰山栖隐寺，次移锡报恩洪济。元太宗二年庚寅，复奉来主中都之万寿。晚年退居从容庵。数迁巨刹，大振洞上安风。^②

到了元代，北方多为曹洞宗法脉，南方则多为临济宗。曹洞宗在北方的传承主要代表为万松行秀禅师的法嗣，其中以雪庭福裕禅师的嵩山少林寺系为突出代表。到了明时，曹洞宗开始向南回旋传播，福裕九传至小山宗书衍出常润、常忠两支，其中尤以常忠弟子无明慧经的寿昌系为胜，慧经门下又开博山系、鼓山系、东苑系，其徒遍于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清时，曹洞宗最主要的脉系则为常润弟子诸缘、方念的江西云居山法系，其所传地则大致又回到了赣中地区。其中，如净弟子道元在元时就将曹洞宗风传至日本，成为日本曹洞鼻祖，而博山系下一支也传往越南。^③

临济一派黄檗希运传至临济义玄，义玄在黄檗山随希运修法三年，颇得黄檗赞赏，于大中八年（854）北上到河北镇州建临济寺弘扬黄檗禅法，共有弟子22人弘化四方，临济宗从此在北方传播开来：

镇州临济义玄禅师，曹州南华刑氏子。幼负出尘之志，及落发进具，便慕禅宗。初在黄檗会中，行业纯一……师后住镇州临济，学侣云集。一日，谓普化克

^① (宋) 普济著；苏渊雷校点：《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93页。

^② (清) 聂先编撰；心善整理：《续指月录》。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232页。

^③ 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6页。

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黄檗宗旨，汝且成襍我也。”^①

义玄数代后传至楚圆，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黄龙派开宗高僧慧南就承法于楚圆禅师，慧南后辗转从福建到庐山、黄檗山，最后结庵于修水县黄龙山。其座下得法弟子有83人，再传弟子满天下。而杨岐派则在南宋时传至日本。到了元代，临济宗已横穿南北，北方以海云印简为代表，南方则以雪岩祖钦、高峰原妙等为代表。

所以，临济宗、曹洞宗两派在国内的传播十分广泛，北至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南达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等地，在海外也远播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在日本仅临济宗、曹洞宗寺庙就有两万多所，僧徒千万众。而在江西省境内，曹洞宗、临济宗两派也遍布赣南北。早在12世纪，曹洞宗就传播到了青原山净居寺、庐山圆通寺、庐山东林寺，这些地方成为了曹洞宗的道场。

由此，从历时性来看，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三派从唐宋至元明清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传播的状态（沩仰宗另论），其传播区域突破江西小地区散及中国南北诸省，甚者远渡海外。其传播状态则呈现出回旋式的结构，也就是以江西宜春为中心，不断向外以波状扩散，但最终又时时回旋到这个中心。而从共时性来看，三派之间也联系紧密、相互交流，尤其是曹洞宗和临济宗始终处于互携互助的状态，两派法嗣不仅混杂而居共传禅法，还托付衣钵越派传嗣。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三大派系的广泛传播，才奠定了三大祖庭地位形成的认同基础。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法嗣，他们都把仰山栖隐寺、黄檗山黄檗寺、洞山普利寺称之为祖庭。

由此来考量，宜春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在唐后期至宋前中期高度繁荣，宜春成为中国禅宗的中心；宋后期开始逐渐式微，宜春禅宗失去了宗教的中心地位；元明虽有小规模复兴，但总体上处于衰落并趋于沉寂的状态，以致到清末遭寺灭嗣绝的地步。但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临济宗、曹洞宗开始向中国南北诸省传播。所以，栖隐寺、普利寺、黄檗寺三祖庭概念的形成正基于这一动荡的传播历程，并逐渐被大众所熟知认可。

关于“三大祖庭”的记述，地方志中有多处记载“（黄檗寺）宋改为报恩光孝禅寺，与洞山、五峰为释家三大祖庭。”^②这里所说的五峰，即为宜丰县五峰山，以净觉寺而著名，与洞山、黄檗山、九峰山、云居山并称筠州“五大道场”：

（五峰）在三十九都。原名“静觉”，唐大中改曰“普利”，柳公权书额。有《楞严标指要义》十卷，宋苏文定夫人史氏施也，丞相益公周必大为之跋。元

^① (宋)普济著；苏渊雷校点：《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42页。

^② 民国六年《盐城县志》卷1，《疆域志》。

翰林学士乔迁书“观音堂”三字，僧嗣鑫立石。明成化间，废为民产。国朝顺治十三年，邑庠生熊瑛夫捐赎，迎释济炤修复，与洞山、黄檗称三祖庭云。^①

可见，洞山、黄檗山祖庭地位的共识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为何两处文献都没有提到仰山呢？这可能与仰山沩仰宗在宋中后期相关史籍阙如、法脉断绝造成的一度沉寂有关。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其祖庭地位的客观认可，即使是在明清时期，栖隐寺周围还建立起了一大批小寺庙，分别有西林寺、宝珠寺、大仰寺、祥隆寺、獭径寺等等，无不受到栖隐寺的影响。而且，仰山传出的沩仰宗一派在禅界占据极高的地位，所以，称其为宜春禅宗又一祖庭并不为过。

^① 道光四年《新昌县志》卷6，《寺观》。

第3章 禅宗与民间信仰的糅合

唐宋时期，朝廷对地方神祇的赐封达到一个高潮。宜春禅宗就得到了封建国家的不断赐封，其中以三大祖庭和三派传法高僧为受封主体。国家对禅宗的不断赐封正是国家与地方相互沟通的结果，双方努力之后的情况是，禅宗在宜春的传播得到官方的认可和保护。与此同时，道教、各种民间信仰也与禅宗共时交融发展，而沩仰宗与仰山神信仰的糅合就是一个特例。

3.1 国家对禅宗的封赐

隋唐以降，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对佛教事务的管理也逐渐深入和细致，这反映在僧官的设立上，法律对寺庙数量、僧人数量严格控制的细枝末节上，以及对寺庙封敕的频率上，以至于住持的产生、寺庙之间的利益纠纷都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预。甚者，封建王朝对神明的敕封还存在一整套严格的筛选要求和详细的实施步骤。禅宗在唐中后期进入宜春地区，在传法初期就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封敕。

元和九年（814）百丈寺怀海禅师圆寂，在七年之后的长庆元年（821）唐穆宗就敕怀海谥号“大智禅师”；大中元年（847），也就是仰山慧寂在避武宗灭佛之难后重回仰山振兴佛法时，经江西观察使韦宙的奏请，宣宗即赐名其所建寺庙为“栖隐寺”。宣宗之所以即位后便一反武宗灭佛的政策而大兴佛教，这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而他对禅宗的亲近远不止于此，即位当年，他还赐名百丈寺“大智寿禅寺”；大中三年（848）希运逝世于黄檗山，宣宗也赐谥号“断际禅师”，塔名“广业”。

其后，唐统治者一如既往，对宜春禅宗的赐号不绝如缕。咸通十年（869）良价在洞山圆寂，唐懿宗敕谥号“悟本禅师”，塔名“慧觉”；中和三年（883）慧寂在东平山圆寂，其法嗣光涌禅师将慧寂灵骨迁回仰山建塔供奉，到大顺二年（891），唐昭宗敕谥号“智通禅师”，塔名“妙光”。这些仅仅是对宜春三大祖庭高僧所获谥号的粗略统计和罗列，除此之外，还有：

大顺元年（890）上蓝令超禅师圆寂，昭宗赐谥号“元真大师本空之塔”；
天复二年（902）云居道膺禅师示寂，昭宗赐谥号“弘觉大师”；
顺义初，九峰山道虔示寂，赐谥号“大觉禅师”。^①
谥号，是对已故帝王、王侯、大臣等生平事迹进行考量之后所给的褒贬称号。

^① 《宜春禅宗志》编纂委员会：《宜春禅宗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416页。

这一做法始于西周，秦汉以前，主要以一字谥为主，汉代开始采用二字谥，到了明清其制度更加完备，皇帝谥号多达 21 字，但大臣依旧是 2 字。唐宋是谥号制度发展的中兴时期，谥号成为满足封建统治者虚荣的工具和驾驭群臣的褒贬方式。对高僧加封谥号的做法普遍于唐朝，我们不去揣测统治者对高僧加封谥号的本意是否是出于敬慕之情，但把世俗社会的官僚制度模式化地运用于神灵社会，却无形中达到了掌控宗教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自古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掌控不过三种方式：敕封官爵名号、列入祀典、修建寺庙。^①一般看来，第一种方式是最为普遍和有效率的，不仅唐代统治者善于运用这种方式，宋朝也照用不弃，“自天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熙宁复诏应祠庙祈祷灵验，而未有爵号，并以名闻。”^②甚至，宋朝实施的范围和力度要远远大于前后各封建王朝，相对而言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而且，由朝廷对民间神灵进行赐号封爵的形式在宋后变得越来越普遍：

太平兴国寺，在城南集云乡大仰山下，即慧寂禅师修真处，唐会昌赐名“栖隐”，宋改今额。唐宋赐经御书碑碣甚多，俱毁，仅存元程巨夫撰碑记。^③

首先是仰山栖隐寺在太平兴国年间获得宋太宗敕额“太平兴国寺”，“寺兴于唐会昌之元，至皇朝太宗皇帝赐以‘太平兴国禅寺’之额，仍赐御书，栋宇之胜，甲于江右。”^④至于宋太宗为何会把敕封的眼光放在栖隐寺，我们不得而知。而当时赐额以“太平兴国寺”的寺庙在全国亦不止一例，然考证其被封赐的缘由，无非是流传着僧人因力助赵匡义躲避大难而得皇帝恩施的传说。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到的是，正是宜春地方精英利用宋廷这样广敕寺庙的机会，向皇帝进呈，栖隐寺才得到了朝廷的特殊赐号。

其后，真宗、仁宗两帝分别给洞山普利寺赐御书飞白；绍兴九年（1139）黄檗寺也奉诏更名为“报恩光孝寺”，祀奉徽宗。其香祀徽宗的原因各史籍虽俱无详述，但查据史实可以知道，绍兴九年，南宋政权正式宣布与金和议，和议有一项内容即要求金朝送还宋徽宗棺梓，黄檗寺此时祀奉徽宗或许正出于这个考虑。有宋一朝对宜春禅宗的封赐陆续还有，恕不能一一尽述。

从唐宋两朝统治者对宜春禅宗的封赐来看，唐朝给禅僧赐谥号的现象要多于宋朝，宋朝给寺院赐额的现象要多于唐朝。说明至少在唐时，宜春禅宗高僧大德

^① (美) 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8 页。

^② (元) 脱脱等：《宋史》卷 105，《礼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561 页。

^③ 同治十年《宜春县志》卷 2，《寺观》。

^④ (宋) 楼钥：《攻瑰集》卷 57，《仰山太平兴国禅寺记》。钦定四库全书本。

辈出，高僧在外之声誉要高于寺院，这一时期，寺院的声名并未有多大弘扬。而到了宋代，经过前代高僧们的努力，寺院建制越来越完备，规模越来越大，其声名渐渐得到弘扬，寺院声誉开始高于禅僧声誉，而宋时高僧大德的名望显然要弱于唐代。朝廷的赐封形式有多种多样，但其制定的依据是与地方具体情况相符合的，于此，我们正可以从宜春禅宗所受封赐的不同来考量其历史发展。



图片三：普利寺旧景（图片来自 <http://image.baidu.com>）

客观地说，到了元代，国家对地方神祇的加封要明显少于其他封建王朝，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而谨慎的，我们所看到的对宜春禅宗的加封只有元仁宗对仰山栖隐寺的赐额。

大德七年（1304），太平兴国寺由于火灾而被毁。但在住持希陵禅师的八年艰苦努力之下，最终重新修建起来：

大德癸卯冬十有二月乙亥，寺灾。明年，长老希陵图复厥宇，冰涉暑陡不懈，输币荐货者川至。为殿、阁各四，楼、亭各二，堂六，祠一。若方丈众寮，若门庑轩庭，若庾库庖湗，以区计廿有八。丹碧焕灿，制度宏密，广员倍于旧而加美焉。攒峰突嶂，灵潭健瀑，风景不改于昔而增胜焉。十方来者莫不惊异赞叹，惝恍四顾而忘归。又建栖隐禅院于城南门，为出入祝厘之所。^①

为此，元仁宗亲题“大仰山太平兴国寺”匾额一块，命大臣程钜夫撰写《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寺记》并刻碑留念，其辞曰：

^①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6.《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禅寺碑》.钦定四库全书本。

皇元有天下，佛法益尊大。天下名山，思致崇极以称德意。皇庆元年，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禅寺成，有司图上其事，诏加封开山祖师小释迦曰“慧慈灵感昭应大通正觉禅师”，二神曰“显德仁圣忠佑灵济广庆王”、曰“福德圣仁忠卫康济顺庆王”，命词臣发扬烈休，勒垂坚珉。^①

碑文提到在太平兴国寺重建之后，就有相关地方部门向朝廷进呈加封事宜。不仅国家积极向地方散播权力网络，地方也踊跃于向国家权力靠拢。地方精英之所以热衷于向朝廷推荐本地神祇，是为了朝廷能把其纳入国家祀典以宣扬本地区的声名，提高区域地位。当然，通过这种方式，地方精英也获得了与国家对话的权力，国家的赐封手段与地方的自身逻辑是不相矛盾的。而且，于文本之外我们只需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些代表着身份象征的赐号并没能直接造福于神明本身，受益者还是积极努力的信徒们。

到了明代，统治者继续加强对宜春禅宗的权力深入。首先是对临济宗法嗣普庵禅师的赐封，从南宋嘉熙元年（1237）到明永乐十八年（1420），普庵前后受到7次赐封，其谥号长达30字“普庵至善宏仁圆通智慧寂感妙应慈济真觉昭贶惠庆护国宣教大德菩萨”：

朕惟佛道以慈悲为体，方便为用，超卓万有，拯拔群伦。广利济以无边，妙神通而莫测。不有丕承于法绪，曷能茂振于宗风。惟普庵禅师万行圆融，六通具足，端严自在，变化无方。誓学悟于群迷，普利益于庶类。如溥甘霖于六合，膏泽均沾；犹现满月于千江，光辉旁烛。眷此宏彰于灵化，式宜荐锡于名称。今特加封“普庵至善宏仁圆通智慧寂感妙应慈济真觉昭贶惠庆护国宣教大德菩萨”。

^②

不仅如此，朱棣还专作《普庵实录序》，序曰：

朕尝取而观之，究其慈心慧力，莫非御灾捍患，拯危济急。化人为善，而积其善因；戒人为恶，而脱其恶趣。所以振扬宗风，上裨益于王化，下利泽于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议焉。然非有以表彰之，曷以称朕归崇尊显之心哉。是用进加鸿号，并为序诸编端，锓梓以传。^③

从序言看，朱棣毫不遮掩其之所以对普庵加封谥号并亲撰序文的本意，“所以振

^①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6. 《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禅寺碑》. 欽定四库全书本。

^② 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67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③ 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67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扬宗风，上裨益于王化，下利泽于生民。”可见，朱棣也认为加封神祇是“上”“下”互益的有效方式。

帝王通过特权对有灵验的神祇进行敕封，一方面是直接显示出皇权的神圣不可替代，另一方面则间接拥有了掌控神灵的主导权从而控制地方社会。华琛提出“神明标准化”的概念，国家通过对地方神灵的敕封，把其统一划归到官方的控制之下，从而使官方权力和意识形态向地方渗透。

其实，对神灵的赐封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至宋达到鼎盛，并一直延续至明清。宋朝是一个特别时期，中国佛教开始了世俗化的历程，形成许多新的特点，那就是从泛泛地提倡救度众生，发展为提倡忠君爱国；从泛泛地主张三教调和，发展到依附儒家的基本观念。^①这个时候，不仅国家开始关注于佛教是否也能同儒家一样成为官方权力网络之下的社会体制之一，佛教也积极向这种引力靠齐，佛教不再是局限于个体修养的宗教模式，它开始对世俗机制感兴趣，并把官方放在首要利益位置之上。^②就像“现在佛不拜过去佛”的公案，佛教对官方的态度巧妙地从冷淡过渡到了迎合，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僧侣们或寺庙代理人（地方精英）热衷于向朝廷为寺院请求赐号并以此为荣。

通过以上论述，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待问题，从唐宋到明清，封建王朝对宜春禅宗加封行为的一步步深入，其实既是封建集权加强的需要，也是地方谋求自身利益努力的结果。

3.2 佛、道、民间神祇的并存

江西是佛道两教传播的核心地区，史载“豫章山水甲天下，洞天福地最夥，二氏多居之。道如张、许、王、吴，耀照千古；释则自远公说法匡庐以来，宗风大振。”^③东汉末年，道教第四代天师张盛从四川来到江西龙虎山，创立了天师道龙虎宗并世代传袭，后来又有葛玄、许逊、王文卿等在江西创立道教宗派；唐时，佛教在江西衍化出净土宗、禅宗两派。

宜春是佛教名地，据县志载，早在汉建安时，奉新县就建有白云寺“在南乡虬峰，汉建安时建。左为虬王殿，祀汉刘繇；右为禅堂，后有观音阁。”^④南朝时期，梁相袁璞故宅捐建为鸿阳寺，是为宜春城最早的寺院，唐时改为开元寺，县志载“有开元寺在府城北，本梁相袁璞宅，捐以为寺，旧名鸿阳，唐改开元寺。”

^⑤到了唐代，宜春各地的寺院数量急剧增多，诸如：

^①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63页。

^② 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康熙四十七年《宜春县志》卷15，《艺文》。

^④ 同治十一年《奉新县志》卷4，《寺观》。

^⑤ 同治十年《宜春县志》卷2，《寺观》。

(宜春)报恩寺，在城东门内。唐天授初名重兴。宋乾明后改崇宁、万寿；政和间额天宁，又改神霄宫；绍圣间赐今额。元毁，明重建。^①

(樟树)天宁寺，在试院左。唐以前名兴化，后更名铁佛。宋赐额天宁、万寿，又改报恩光孝。元改大天宁寺，屡修屡毁。^②

(宜春)瑞庆寺，在城南六十五里。唐贞观间建，名能仁。宋绍兴间方整插天其上砥平，名为讲经台，下有乌龟石，左右有此字岩、鸡冠石、龙头山等，最为宜邑胜境。^③

(宜丰)清凉禅寺，又名石台寺，在十二都。隋九年，将军漆兴公舍宅为寺。唐咸通智演禅师挂锡于此。宋治平觉范禅师唱道此山，丞相张商英、节度使郭天信奉，勅建报恩禅寺……^④

这些寺院都建于唐前期或唐以前，历代不断得到改造。说明，宜春具有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奠定了禅宗形成的信仰基础。

道教传入宜春的时间要远早于佛教。东汉时期，葛玄在樟树阁皂山悟道开创了道教灵宝派；三国时期，吴国五斗米道开始传入宜春，在宜春城西南建有蕊珠观；西晋时期，宜春城内先后又建有玄妙观和靖严观；到了东晋时，又有邓表在湖冈台、小仰山采药炼丹，“邓表尝修炼于小仰山，又号邓表峰，有星坛、石臼、药龟。湖冈上即表故宅，山顶有丹崖、丹池，即礼斗石。”^⑤在道教的“七十二福地”中，樟树阁皂山为第36福地，丰城始丰山为第37福地，奉新东白源为第39福地。同时，在宜春各地也流传着内容不一的道教仙迹故事：

豫章记云：靖安有葛仙山，仙本楚人，汉末隐此，或云即葛洪山，有洪炼丹坛、饮马池。旧志盖本于此。然考之《真仙通鑑》，葛元以吴赤乌七年上升。《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俱载：弋阳葛山有葛元冢，江右多其修炼遗迹。此事在吴桓王时或即为葛元欤！洪则元之从孙也。^⑥

邓峰寺，在城南二十五里邓尖峰。昔邓表修炼道场。明，袁忠毅公捐买前后山场、田土，上建白云庵，下建狮子庵。施僧供奉香火，永禁盗卖。^⑦

邓表是江右道教的一支，它遍布于宜春各地区。在宜春西南仰山附近，有一座道

^① 同治十年《宜春县志》卷2，《寺观》。

^② 同治九年《清江县志》卷2，《寺观》。

^③ 同治十年《宜春县志》卷2，《寺观》。

^④ 同治十一年《新昌县志》卷6，《寺观》。

^⑤ 嘉庆八年《袁州府志》卷29，《仙释》。

^⑥ 同治九年《靖安县志》卷16，《杂志》。

^⑦ 同治十年《宜春县志》卷2，《寺观》。

教名山“邓尖峰”，山上有道观曰“紫云观”，传言先后有邓表、蔺道人在此修炼成仙，因此得到当地民众的庙祀。道教在宜春的发展并不逊色于佛教，其故事流传也十分丰富精彩。可以说，宜春的道教文化蕴涵是基于悠久的历史沉淀的。苏辙在《筠州圣寿院法堂记》里说道：“昔东晋太宁之间，道士许逊与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术救民疾苦，民遵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为多。”^①足以说明宜春道教的发展情况了。

佛教和道教在宜春共时交叉传播散布，占据着不同的信仰场域和信仰群体，有时两种信仰甚至寓于同一空间、和平相处，而民众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信仰需求对寺观的属性适时改变，把道观变成了禅宗寺院，诸如：

广济寺，邑西门外锦衣坊。原名紫霄观，许旌阳香火，道士涂道创建。宋政和三年，改万寿宫；靖康元年，更名广报观，内有悟元楼。明宣德五年道士涂隐真、天顺三年道士罗惟鑑各有修葺。国朝康熙三十六年，宋瑞洪与僧某改建为寺，额曰：“广济”，瑞洪助田三十把；五十九年，三元堂众修上栋两廊，额曰：“西屏”，山助石版、瑕田资香火有碑。嘉庆戊寅，瑞洪子孙与僧重葺上栋。道光某年，僧佛圆募修。^②

许逊，江西南昌人，亦名“许旌阳、许真君”等，是道教净明道的祖师，相传能斩蛟龙治水，后因拔宅升天而受到地方和朝廷的祠祀，全国各地都建有万寿宫以祭祀许逊。万载的广济寺本是祭祀许真君的万寿宫，从宋朝到明朝一直属于道教香火，但是到了清康熙年间不知何故而突然被僧人改建为佛寺，其原因极有可能是该道观到康熙时已经完全衰败荒芜了，才给僧人以改建的机遇，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再举两例：

郡南距城十五里有湖冈山，志载五台之一也。其先晋邓表故宅，及唐更为三僧精舍。历宋而明，建置梵宇，高杰整丽，切云耀日。其时缁侶之殷蕃，宗风之响振，殆于临济、博山大有光焉。颜曰“明教禅寺”，所由来非一日也。^③

昔晋中叶，有邓表者，泥涂冠冕，遁迹岩阿，练心修形，立序仙班，此湖冈台所繇著也。至盛唐，雪峰存祖五百头陀，丰、刘、杨三际圣僧精修于此，易仙境而为佛地矣。^④

^① (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03页。

^② 同治十一年《万载县志》卷28，《寺观》。

^③ 道光三年《宜春县志》卷31，《艺文》。

^④ 道光三年《宜春县志》卷31，《艺文》。

这里，将道观改建成禅寺的事例早在唐时就已经开始了，为何僧人并不介意于道观的信仰属性呢？说明，宜春的佛道两教至始至终处于胶着、软磨的状态，也说明宜春的信仰风气开放并容，佛道两教相互交融发展，例如，邓表修炼之处即为沩仰宗祖山“大仰山”之旁的“小仰山”，“小仰山，在府城南三十里，与大仰山连麓。晋邓表修炼于此，又号仰表峰。”^①可见，佛道两教在仰山区域内并行发展。正如民众在佛道信仰繁盛之图景下所寄予的“每因时而湮没，若邓公、三际诸公乘莲御鹤，与释老同寿。”^②

佛道两教在宜春传播的同时，也并存着许多民间信仰。笔者根据宜春各地区的县志记载发现，唐宋至明清时期在宜春传播范围较广的民间信仰有如下几类：

城隍神。城隍是冥界的地方官，是城池守护神，因此与城市的发展十分密切。城隍神信仰大抵源于南北朝时期，滋盛于唐宋。宜春各地区关于城隍庙的修建记载比比皆是，几乎有城即有城隍庙：

（靖安县）城隍庙，在县治东门内，旧在城外。元季毁于兵。前朝洪武三年知县衡守敬重建；正统七年知县金文英、景泰三年知县张羽、成化十八年知县刘芳、嘉靖二十三年知县史载泽陆续修葺；嘉靖四十二年，知县赵公辅修筑砖城，始改迁今址。^③

（上高县）城隍庙……嘉庆十三年，知县刘丙重修，每岁五月二十八日诞辰祀之，道光辛丑，合邑捐修两厢，分为十殿，颇觉壮丽。^④

我们随处摘录一段就可发现，地方发展与城隍神崇拜的重要关系，不仅官方要给城隍配以隆重的国家祀典，地方也尤为注重对城隍庙的修建。古人每逢大旱或者新官到任，也必到城隍庙祈雨、祭祀，“城隍庙，在宜阳门内报恩寺左，附府城隍庙之右。洪武四年，大正祠典称，宜春县城隍之神，每岁春秋二仲月戊日祭之，初到任者先期祭于神而誓，颇有宿庙告文令仍旧。”^⑤早在唐元和十五年（810），韩愈就曾带领袁州官僚到城隍庙祈雨，说明城隍神在宜春传播的时间很长。

江西各地所祀城隍神皆为汉将灌婴，“江右城隍相传为汉灌婴，高帝六年封颖阴侯，南唐时封辅德王，宋淳佑八年封忠惠王”^⑥因为他筑造了南昌城，而受到江西人民的祠祀。但是在高安，城隍庙所祀却是本地神应智项，宜丰所祀为西晋卢姓者。^⑦虽则他们的主神不大相同，但是城隍神信仰早已深入宜春各地。

^① 清雍正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卷 151，《仰山部》。

^② 道光三年《宜春县志》卷 31，《艺文》。

^③ 同治九年《靖安县志》卷 2，《坛庙》。

^④ 同治九年《上高县志》卷 9，《坛庙》。

^⑤ 康熙四十七年《宜春县志》卷 12，《祠庙》。

^⑥ 康熙四十七年《宜春县志》卷 12，《祠庙》。

^⑦ 相关研究可见：林宏《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仰山神。仰山神信仰源于唐时宜春仰山的萧氏二兄弟，宜春民众祭祀甚重，“袁人事二神至谨，祷无不应，明称大仰山之神，每岁春秋二仲月府官择日诣庙致祭。”^①北宋时还只是宜春小范围内的地方信仰，到了南宋则由于各种因素的促合而在江西省境内以致南方诸省传播，“尽江之南，二浙、襄汉、湖湘、闽广咸有异迹，不可殚纪。”^②宜春最早的仰山庙是在城南六十里的仰山上，后因慧寂在仰山弘禅法而迁移到了城南三十里的堵田，也就是仰山正庙，“仰山正庙，府城南三十里，地名堵田，俗称南庙。自府城至古庙，此为中路。唐会昌间建，元欧祥重修，庙宇弘敞。后圮，知府郑惇典重修。”^③



图片四：仰山和栖隐寺（笔者摄于 2015 年 12 月）

到了明清时期，宜春各地都兴建了仰山庙，在高安一地更是多达 12 处以不同称谓存在的仰山行祠：

仰山行祠，在县治西。神为宜春孚惠二圣，姓萧，自唐以来水旱疾疫有祷必应，乡村镇市多祀之。在金石桥东者曰“七郎祠”，在黄田村者曰“孚惠祠”，在曲礼下坊者曰“九龙祠”，在敖塘者曰“竺云峰”，在天则冈者曰“二圣祠”，在黄村堆上者曰“石龙冈祠”，在带源者曰“杨柳江祠”，在唐良陂下者曰“仰山行祠”，在印堂岭上及河东象嘴滩者曰“仰山庙”，在修仁团界埠下会者曰“仰山祠”。^④

许真君。唐宋时，许真君还只是道教净明道的祖师；明清时期，许真君信仰

^① (清)袁锡光辑：《袁州汉后七代集略》。道光元年寻根书屋本。

^② (清)袁锡光辑：《袁州汉后七代集略》。道光元年寻根书屋本。

^③ (清)袁锡光辑：《袁州汉后七代集略》。道光元年寻根书屋本。

^④ 同治九年《上高县志》卷 9，《坛庙》。

深入地方社会和民众生活，逐渐完成了民间化的过程而成为了民间信仰。这一时期，由于江西移民和江右商帮的辅助，许真君信仰传播到南方各地，成为江西影响力和认同感最强的本土之神。宜春几乎每个县区都建有万寿宫，有的地方就多达几十处，如新昌有二十九处、高安有十一处：

真君庙。一在大观塔左，乾隆五十四年合邑以修塔阁，余银创建；一在河南下街；一在河西凌江墟；一在崇本洋田；一在下京坡徐家渡廖洲；一在白上上泉港；一在百岁莲桥；一在后塘田心；一在蒙安下团；一在唐良水口墟；一在乐城游家丛。^①

关羽。关公作为忠毅的化身，与文圣孔子并肩而被称之为武圣，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普遍建有关公庙（亦称“老爷庙”）来祭祀关羽。江西较早建立的关帝庙之一即在高安，据同治九年《高安县志》载，高安一地就有关帝庙 19 处。

东岳大帝。也称泰山神，源于我国的山川崇拜。从汉代开始，历代帝王不仅屡屡登泰山封禅，更是对其不断加封，后因宋真宗将其赐封为“圣帝”，所以又称为“东岳大帝”。东岳大帝信仰的体现便是东岳庙和东岳行祠的建立，据方志记载，江西境内最早的东岳庙就在萍乡（萍乡在唐时属袁州管辖），其建于晋朝。到了唐时，在宜春高安和上高地区也出现了东岳庙。

天符神。天符信仰源于我国古代的天象崇拜，人们认为天符大帝是天宫的文官，能祛病疫、除厉鬼、保平安而流传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宜春祀奉天符的庙宇非常多，宜春城就有 5 所，万载县也有 8 所。

除此之外，还有晏公、萧公等一些在局部地区传播的本土之神。

上述民间信仰中，既有宜春本土香火也有他乡之神，它们都与禅宗在宜春共时传播。为什么唐宋之间会有这么多越界神祇的出现呢？一个原因是这些神祇确实具有能满足当地民众信仰需求的功能；另一个原因是，唐宋时期，社会处于变革之中，人口控制在宋代被放松，客户的地位逐渐被承认，人口流动加大。只有社会群体的流动受到合法保护，人们才会去接受外地人带来的他乡神祇，并与这些附属的灵验故事达成共识。^②

禅宗的发展是与宜春民间信仰产生了交集和共融的，如清江县（樟树）支提庵就保持着这样一幅和谐的图景“内有万寿宫、天符庙、文昌宫、关帝殿、观音堂。”^③禅宗、道教、民间神祇共处一室。部分寺院还一度寄托于民间祠庙内，

^① 同治九年《上高县志》卷 9，《坛庙》。

^② 皮庆生：《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历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③ 同治九年《清江县志》卷 2，《寺观》。

如丰城连珠寺“后移建城隍庙内左侧”^①，万载静安院“乾隆间毁，移佛像于关帝庙后，今与武庙互易。”^②

同样，在民间信仰的传播过程中，禅宗也起到了中间桥梁的作用。仰山神信仰的传播就依赖了沩仰宗的力量，许多民间信仰的传播者都是先将神像安置在寺院之内，等到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再创建独立的庙宇。有研究显示^③，仰山行祠在全国共有 13 座，有三处处于寺院之中，如太和行祠内设有佛堂，由僧人管理；潭州行祠诞会由僧人主持仪式；而宜春普济院的身份转变似乎更能说明两者的亲密关系，“宋绍兴初为孚惠二王行祠；淳熙间改建台西，祀慧寂禅师；庆元己未毁，州守李訏重建，置有田十六亩五分。”^④至于仰山沩仰宗与仰山神的微妙关系在后文将有详述，兹不赘述。



图片五：古庙村孚惠古庙内景（笔者摄于 2016 年 1 月）

不惟仰山神信仰如此，还有一些民间神祇也一样被置于寺院内，如上高县“上高县治南距百步，崩然若浮屠屹立者，观音阁也。其上祀补陀大士，下则五通神居之，神号将军姓周者，尤著灵。”^⑤五通神与观音置于一室。再举一例“刘愿，字恭叔，同友游洞山。山有五通庙最灵，夜闻人嬉笑声，谩侮诸人，独不犯恭叔，曰：‘此官人也。’早作，诸人衣冠皆污，恭步如故。”^⑥刘愿，宜丰天宝乡人，

^① 同治十二年《丰城县志》卷 3，《寺观》。

^② 同治十一年《万载县志》卷 28，《寺观》。

^③ 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253 页。

^④ 同治十年《宜春县志》卷 2，《寺观》。

^⑤ 康熙十二年《上高县志》卷 6，《文苑》。

^⑥ 道光四年《新昌县志》卷 25，《说林》。

北宋政和六年（1116）进士，曾任湖南沅州太守，这则故事是他出仕之前的事情。洞山本是曹洞宗的祖庭，为什么会有五通庙呢？

五通神信仰源于江西婺源，顾名思义，其神共有五人，因分别在宣和五年（1123）被封为通贶侯、通佑侯、通泽侯、通惠侯、通济侯，所以被人们称之为“五通神”。而到了淳熙元年（1174）五神又被加封为显应公、显济公、显佑公、显灵公、显宁公，所以人们又称之为“五显神”。五通神信仰在南方地区传播广泛，史载“阖境之人，旦夕必祝之，岁时必俎豆之惟谨。神之灵应不可殚纪……地方百余里，民近数万户。水旱有祷焉而无凶饥，疾病有祷焉而无夭折，其庇多矣。余威遗德，溢于四境之外，达于淮甸、闽、浙，无不信仰。”^①

贾二强认为，五通神与佛教神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五通神其实就是佛教五通神明在不断民间化的过程中被民众改造而成为的民间神祇，它虽然不被佛门和官府认可，却在民间传播甚广。^②所以，这样看来洞山存在着五通庙也就并不奇怪了。此外，在仰山栖隐寺四周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民间信仰“按嘉定志祠庙，有南岳行祠在仰山孚惠行宫之侧，祠右昭烈行祠，在报恩光孝寺之东庑……李枢密陪祠，在仰山。”^③

由此，我们看到，禅宗在宜春传播的同时，道教和诸多民间信仰也与其共时、历时并存，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信仰地域特色，虽则有的民间信仰已经消逝不存了，但是禅宗却传盛千年不衰，持续至今。佛教借助民间信仰交融发展，深入民间社会，无论是佛教的民间化还是民间信仰的佛教化，都值得我们去关注。下面即以沩仰宗与仰山神为例展开探讨禅宗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3.3 禅宗与民间信仰的冲突、糅合：以沩仰宗为例

宋元以降，佛教与民间信仰逐步结合发展。有研究表明，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存在着仪式上和观念上的互动关系：佛教呈现出民间化的倾向，民间信仰也向佛教采借某些内容。^④在考察宜春禅宗与宜春地区民间信仰的关系时，笔者发现，禅宗在宜春的传播就巧妙地借助了当地民间信仰的影响力，获得了民众的信仰心理认同而成功进行了信仰引导。

仰山神是宜春地区普遍受祭的民间信仰之一。仰山，坐落于宜春市袁州区洪江乡，属于武功山脉一支，其主峰脉集云峰高达 1034 米，仰山神信仰即发源于此，史载“距袁城南五十里，山曰大仰，形胜奇峭，其神最灵。传所谓名山大川，

^① (宋)王炎：《五显灵应集序》。四库全书刊本。

^②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46—357 页。

^③ 民国二十九年《宜春县志》卷 13，《祠庙》。

^④ 林美容：《台湾观音信仰的主要形态——兼论民间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民间佛教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能出云雨以利一方者欤。山之颠有潭，神实宅之，孚惠二王是也。旧庙在獭径潭之上。”^①



图片六：古庙村孚惠古庙外景（笔者摄于 2016 年 1 月）

关于仰山神的记载最早见述于南唐时期朱恂的《仰山庙记》“神姓萧氏，仲曰大分，其季曰隆，不知何许人也。”“汉文之世而立于山阿”^②，若按照此说，仰山神即为萧姓二兄弟，其发源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文帝时期。至唐代，关于仰山神的传说逐渐丰富起来，仰山神信仰也开始兴盛：

古老相传：昔有邑人徐潘，在县东十里浦村，从扬州行舟还，至彭蠡湖大孤石，见一人称萧大分，一人称萧陆，云居宜春县南仰山石桥，求与同载，徐潘许之。至浦村东一百步告别而去，期后相寻至石桥，必须大唤，叔季应相见。往来既数，宴会之次，大分告曰：“君欲雨，即为雨；晴亦如之。”徐潘因曰：“欲得田土。”信宿之间，发大水，推山荡竹，俄而平高就下，出田五顷，今浦村西徐田是也。潘怪之，遂默志其处，乃见二龙。自此遂绝，石桥亦断。后亢阳，斋洁祷祈必应。^③

在这则传说中，虽然萧氏二兄弟的名字与朱恂记载略有不同，但足以说明的是，仰山神其实就是一个“祷无不应”的龙神，其因为具有“或淖高原为田，或助官

^① (清)袁锡光辑：《袁州汉后七代集略》。道光元年寻根书屋本。

^② (宋)无名氏：《宝刻类编》卷 7，《重修仰山庙记》(朱恂撰)。钦定四库全书本。

^③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198 页。

军弥盜，御灾捍患……迄今水旱疾疫之祷辄响应”^①的法能而受到宜春地区民众的普遍信仰和庙祀。唐时，在宜春县、分宜县、萍乡县等地都建有仰山庙；到了南宋时期，仰山神散播的信仰范围不断扩大，全国已经修建了多处仰山行祠。“逮我宋，受命悉主百神，遇国有大庆，必加封赐……境有水旱、螟螣、疾疫、兵火祷之辄应，故民戴神赐永永无穷已。自大江以西家有其像，饮食必祭。”^②至少说明，在唐宋时期，仰山神就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信仰功能，成为宜春地区最为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

唐元和十五年（810），被贬至宜春为刺史的韩愈因为到城隍庙求雨不灵，便亲自率领官僚转而到仰山庙祈雨，前后撰有两篇祭文，其一曰：

维年月日，袁州刺史韩愈谨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谷将尽，人将无以为命，神亦将无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于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悯。以时赐雨，使获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饮食。谨告。^③

从措辞来看，韩愈的祈祷真诚而恳切，不日，果然天降大雨，于是他又率众诣仰山庙致谢，并撰有《谢雨仰山文》以表达敬意。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之所以选择去向“地方神祇”仰山神祈雨，不只是因为“国家神祇”城隍神的求雨不灵，更因为仰山神虽然还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神祇”的体系范围之内，但是其在民间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引起官方的注意了。

以致到了明清时期，宜春地方官员关于求雨之事都必去仰山庙，也对仰山神进行庙祀：

惟神发迹显灵肇于汉代，功德昭著，纪于唐朝。累口褒荣贵极王爵，宜春之民事神如父，而神之于民爱之如子。凡水旱札瘥之灾，祈之无不弥息。呜呼，盛哉！仰山既为一周之镇，而神实斯民之所蕲响也。某被命郡符假守兹土，视事伊始，伏谒灵祠，进瞻庙貌，清酌藻饌、心洁形庶感格。惟神聪明正直，愿垂降鉴雨泽，无愆疫疠不作，岁以有年，人不失职，是惟神之赐也。^④

随着仰山神在民间影响力的增强，唐时官方意识就开始向内扩散。“天佑间，赐爵‘通侯’，叔大分积封‘祐德显烈福善定济王’，季隆积封‘敷德威仁英显

^①（元）程钜夫：《雪楼集》卷6. 《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禅寺碑》. 欽定四库全书本。

^②（元）吴师道：《敬乡录》卷10, 《仰山庙记》. 欽定四库全书本。

^③（唐）韩愈：《韩昌黎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6页。

^④康熙九年《袁州府志》卷14, 《艺文》。

康济王’，庙号‘孚惠’。考妣王妃皆五字封，二妃与公夫妇皆八字封，赐予典册，于兹为盛。”^①仰山神成为了合法神祇。

当仰山神已经成为“本土香火”得到民众普遍信奉之时，“他乡之神”禅宗开始传入宜春。唐会昌年间（841-846），慧寂禅师从湖南沩山寻游至宜春仰山，在此开山传法，创立了“沩仰宗”。关于慧寂到仰山传法的最初情况，宋时张商英在《仰山庙记》中这样记述：

会昌元年，寂捧锡而来，寻涧而入，夜憩大樾，泊然假寐。有二白衣进曰：“深山险绝，师当何往？”寂曰：“吾欲卜庵于此。”白衣曰：“我山神也，愿以此山施师。”寂曰：“汝能发欢喜心、广大心、无障碍分别心，则吾受汝施。”白衣曰：“诺！”即指集云峰下，曰：“庵基莫吉于此。”居数月，神来告曰：“陋旅据水上游，恐污饮漱。”遂徙居下流五里。三年四月十三日，神又来言曰：“师净侣日盛，咫尺共住，势非所安，请徙居中途，且以族四方参学为一顿之地。”是夕，大风雨拔木。黎明，庙已建于堵田。

寂之将灭也，神泣别曰：“法恩深厚，未知所获。”寂曰：“吾师沩山以正月八日去寂，汝能为吾营斋，吾事毕矣。”于是城中火，神于空中具述其事。太守再拜，许之，火乃灭。遂于是日斋僧于庙。席地而坐，威灵恐怖，众莫测。神言曰：“何不造僧堂，击键锥，如丛林之制？”众又从之。^②

上述记载中的“二白衣”显然就是仰山神“萧氏二兄弟”，他们就栖身于仰山之下獭径潭旁的仰山庙，在慧寂未到之前，仰山大片范围内的领地都为他们所掌控。但是，在一个外来客的面前，他们却表现出充分的热情和友好，不但施山给慧寂，还主动把仰山庙迁移到了更远处的堵田，在慧寂圆寂之时，更是以受教者的心态感慨恩情。这种反常的情形自然是张商英等人的虚构之词。据张商英在文末所述，《仰山庙记》是应太平兴国寺（即栖隐寺）主持了元和尚所请而撰写，其目的性便不言而喻，再查宋以前史籍，均无“仰山神施山逊庙”故事的记载。显然，这当是了元等人为了弘扬禅法而做的努力罢了。

而且，为了使故事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真实性，文末还要自圆其说道“而二萧乃与惠寂老相植于旷莽岑寂之间，悦其风，乐其说，不爱其宫室居处之安、溪山形胜之美，委而去之，无少靳心。”^③总之，把仰山神和慧寂禅师的关系塑造得越亲密，越能使人信其说而对慧寂禅产生敬慕之意。类似这样的刻意塑造还不止一处，又如：

^① (清)袁锡光辑：《袁州汉后七代集略》。道光元年寻根书屋本。

^② 雍正十年《江西通志》卷124，《艺文》。

^③ 雍正十年《江西通志》卷124，《艺文》。

师（普庵）一日至泉边树下禅定良久。有一神出现，身长八尺余，红发绀面而启师曰：“小神奉上帝敕，守护此地五百年，直待普庵僧。汝何僧敢擅坐此？”师云：“某即普庵也。”神遂合掌礼拜曰：“敢不奉献，遂建道场。誓愿皈依，同积神功。”^①

当然，禅宗并非只是做文字说教的努力，他们还积极把仰山神纳入到栖隐寺的祭祀范围之内，给予对等的祠祀祭典“固合祠于师之室，封秩必俱”^②。关于慧寂与仰山神的故事，在仰山一带也流传着大致相同的传说：慧寂从湖南沩山来到仰山，想要在集云峰下开辟道场，但是损害了仰山神的利益，于是二者展开了斗法，约定输者离开仰山。仰山神告诉慧寂：“地可以给你，但是只能用袈裟来圈定大小，袈裟能覆盖多少土地我就让出多少土地。”结果，慧寂解下袈裟一挥，袈裟越变越大罩住了整个仰山，仰山就这样成为了慧寂的地盘，仰山神只好认输搬移到了不远处的另一个山头。现在，离仰山不远处的古庙村的确还有仰山庙遗址的存在，俗称“古庙”。

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把禅宗和当地民间信仰——仰山神联系在了一起。“他乡之神”沩仰宗于唐中后期开始在宜春传法，后来因为渐渐脱离世俗，发展到宋时已经呈衰落之势，为了重振禅风，依附当地民众信仰已久的仰山神是其勃发的主要途径。仰山神信仰不仅具有合法性，还拥有大批信徒，是值得结合借助的力量。当然，效果也是显著的，宜春民众在修建孚惠新祠时“争辇土石，培展台基，首营正殿五间，后列沩仰二禅师暨王之父子。”^③

宋时，佛教与民间信仰结合的趋势越加明显，一些有影响力的民间神甚至开始成为佛教寺庙的供奉。通常，一种新的信仰体系想要成功植入某地，必须与本土旧有信仰进行一番力量上的角逐。禅宗传入宜春之际，正是仰山神信仰方兴未艾之时，禅宗还不足以将“本土香火”取而代之。所以，禅宗选择了依附和借助仰山神之力来赢得民众的信仰心理认同感，并依此获得信众。虚构仰山神献地一说，并非只是为了争夺土地占有权，而是为争取信众而做的最大努力。对于禅宗与仰山神的结合，利益也并不是单方面的，所谓“神得师而化乃弘，师得神而道益彰”^④“二神萧姓，释迦之来，实有灵响，逊山为寺，又能阴相默佑，招致檀施。以至于今，迦之道愈高，山之神益灵，山之名日以著。”^⑤仰山神所掌握的

^① 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6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92页。

^②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6.《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禅寺碑》.钦定四库全书本。

^③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59.《袁州宜春台孚惠新祠记》.钦定四库全书本。

^④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6.《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禅寺碑》.钦定四库全书本。

^⑤ (宋)楼钥：《攻瑰集》卷57.《仰山太平兴国禅寺记》.钦定四库全书本。

广阔信仰市场为禅宗带来了众多信徒，禅宗依托仰山神的友好关系在宜春地区确立了信仰地位，得以立足发展；相同，仰山神信仰也因禅宗的日益闻名而延续下来，没有完全消失在历史之中。

笔者在走访宜春洪江乡古庙村时发现，如今孚惠古庙（即仰山庙）所受香火要略盛于栖隐寺，仰山一带信众更愿前往仰山庙拜佛祈愿，栖隐寺所接待的信众和捐款也主要来自于外市外省。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自然与建国后几次重大活动对栖隐寺所造成的重创有关，这期间栖隐寺主体建筑基本被毁，佛教活动全面停止，虽则2011年又重新恢复了法场并更加宏伟壮观，但是历史的隔断效果还在持续。另一个原因则是，仰山庙在与佛教的融合中发生了巨大转变，它已经不再祭祀仰山神而是供奉佛教神灵：如来佛祖和观音菩萨。而且，庙内主要事务也由僧人管理，远近前来烧香的信众也都是来拜佛祈福，已少有人知晓仰山神的典故。所以，即使栖隐寺香火冷淡，也并不能说明禅宗在仰山地区失去了信仰权威；即使仰山庙香火旺盛，也不足以认为是仰山神信仰的胜利。可以说，两种信仰的高度相融是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

第4章 禅宗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禅宗在宜春地区地化的建构过程中，与地方社会进行了密切的互动。地方政府、士绅、大家族成为禅宗传播的推力，他们积极支持禅宗的发展：捐赠并资助寺院的修建、复续宜春禅宗法脉。但同时，禅宗与世俗社会的土地之争、与官府的赋税纠缠又是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正是加速宜春禅宗世俗化的导向性因素。而其主观建构的诸多灵验故事，又从另一个角度回现了宜春地方社会经济开发、生态变化的动态历程。

4.1 士绅、家族与禅宗：信仰传播中的引力及推力

唐中后期，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先后在宜春形成并传播，其创寺所在地仰山、黄檗山、洞山因此被称之为宜春禅宗“三大祖庭”。三大宗派的传法以及三大祖庭的修缮需要依靠足够的支持力量和经济来源，而士大夫和地方官员、士绅作为沟通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中间体，成为禅宗传播的重要推力。

裴休，大中年间（847—858）任宰相，是唐代士大夫中佞佛的代表之一，史载他“断肉食，屏奢欲，斋居焚香诵经，习歌呗为乐”^①，俨然一幅离居禅修者的形象。其实，最可传道的是他与临济宗宗师黄檗希运的深厚交情：

（希运）后居洪州大安寺，海众奔凑。裴相国休镇宛陵，建大禅苑请师说法。以师酷爱旧山，还以黄檗名之。又请师至郡，以所解一篇示师。师接置于座，略不披阅。良久云：“会么。”公云：“未测。”师云：“若便恁么会得，犹较些子。若也形于纸墨，何有吾宗。”……师亦无喜色。自尔，黄檗门风盛于江表矣。
②

会昌二年（842），正值灭佛高涨时期，裴休特请希运至南昌龙兴寺“旦夕问道”，保护了黄檗禅的传播；大中二年（848），他又于宛陵任上延请希运至开元寺“旦夕受法”。《传心法要》、《景德传灯录》中多有关于裴休与希运往来酬对的记载。

此外，士大夫韦宙、钟传、杨行密亦大力护持着宜春禅宗事务。大中十三年（859），江西观察使韦宙上奏唐宣宗赐慧寂所建寺庙为“栖隐寺”；唐末，割据军阀钟传在坐镇江西三十年间亦大力维护佛教的发展，他为宜春各禅院铸造佛

^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94页。

^②（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222页。

像、兴建寺宇，召请道全回洞山续接法脉，礼遇仰山光涌禅师，史载“洪帅南平钟王闻其名若禅师家麟凤，无有肩其威德者，遂遣使迎止于府下。使者至，师不起”^①；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亦捐资扩建洞山庙宇。

可以说，宜春禅宗的盛化，与官僚士大夫的尊崇有着直接关联。此外，宜春当地精英阶层也一直关注支持着禅宗的发展，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三祖庭的修建就是以官绅为主导，官府与士绅是宜春禅宗依赖的两股重要力量。

宜春三祖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是三祖庭寺庙的兴建、毁灭、重建、修缮的动态历时演变。作为三大宗派的传播中心，庙宇的修建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究其原因，首先与统治者对禅宗的推崇与否有关，其次归结于人为力量或自然灾害对寺庙所造成的破坏，诸如兵祸、火灾等等。其中，火灾是最为主要原因，如栖隐寺两次重大毁灭都缘于火灾，一次在宋嘉定年间（1208-1224），一次在元大德年间（1297-1307）：

寺兴于唐会昌之元，至皇朝太宗皇帝赐以“太平兴国禅寺”之额，仍赐御书，栋宇之盛，甲于江右。自迦至今，凡三十有七代矣。嘉定元年闰四月三日，不戒于火，延燔殿堂楼阁，三百余楹，尽为煨烬，兹岂有数耶？太守寺正余公谓一郡倚此山为命，当有以兴起之。亟捐金钱三百万，首建法堂及二王之殿；户部尚书赵公为建僧堂三门，且为之主盟；知隆兴府待制赵公前后施钱亦三百万，作佛殿；住山清公率其徒持钵四远，闻者乐施，不数月，佛殿、丈室、香积廊庑尽还旧观，而焕然一新，则大过之。^②

可以看出，袁州太守对沩仰宗的传法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而他与户部尚书、隆兴知府的巨额捐助则成为栖隐寺重建的主要经费来源，栖隐寺才得以恢复旧观。因为史籍记载有限，关于栖隐寺更多的修建历程，我们难知其详。但是，普利寺和黄檗寺不断修建的细节却被记载于史籍中，诸如：

明中叶，寺（黄檗寺）圮；崇祯己巳，南昌文学甘维理、副使朱以仪捐构，延释常愚及炤通兴复之。先是，普同墖基并四周山林，俱属熊汝德私产。汝德因以施于本寺，乃重修葺。^③

崇祯二年（1629），黄檗寺又进行了一次修建，地方官员甘维理、朱以仪介入到了寺庙的修缮事务之中，并延请高僧复兴黄檗法脉；地方乡绅熊汝德也把家产无

^① 《宜春禅宗志》编纂委员会编：《宜春禅宗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② (宋) 楼钥：《攻瑰集》卷57. 《仰山太平兴国禅寺记》. 钦定四库全书本。

^③ 道光四年《新昌县志》卷6，《寺观》。

偿捐与黄檗寺。另外：

洞山普利禅寺，在三十都。名新丰洞。唐大中时，良价禅师募雷衡地建广福寺，后更名公德禅寺、崇先隆报禅寺。胡提举俊孚为铸洪钟。元末皆毁于兵，寺基久废。明万历间丈量入版籍。崇正中，举人戴国士得其产，逐释净聪与其徒智度重兴复焉。^①



图片七：宋时雷四十三娘子为普利寺捐建的逢渠桥（笔者摄于2016年4月）

普利寺在元末曾一度毁于兵祸，到明时寺产都被官府划入到官方财产中，明末才由举人戴国士将所得寺产捐出重建普利寺，并延请高僧净聪复兴洞山法脉，净聪也被称之为“洞山中兴第一祖”。其实，若没有戴国士的力量支持，一切都是虚妄。关于戴国士的信息，《永历实录》《江西通志》有记载：

时有戴国士者，字初士，江西南昌人。中天启辛酉乡试第一。颇有文誉，善结纳为声望。解学龙巡抚江西时，降礼与交。学龙以荐黄道周被逮，国士经营其间，因以清流自标榜，驰书四方，迎送宾客，日不暇给，时称其家为东林茶馆。相传其缄书纏日用面五升。南昌陷，国士降于（清），为辰沅道兵备副使，已见江西反正，湖南恢复，陈友龙兵且压沅，遂举沅州归顺。^②

初，益王起兵建昌，泰来欲从之。同邑按察使漆嘉祉、举人戴国士持不可。已而新昌破，国士出降，泰来恶之。会上高举人曹志明等兵起，泰来与相结，复

^① 道光四年《新昌县志》卷6，《寺观》。

^② （清）王夫之：《永历实录》。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第169页。

上高、新昌、宁州，杀国士妻子，遂取万载。^①

也就是说，以清流而著称的士绅戴国士在清军攻打到南昌时，竟然舍义投降清军，因此被大家所不耻。而他最终的结局也十分凄惨，顺治五年（1648），被革职流放辽东，最后抑郁寡欢病歿于铁岭。需要指出来的是，戴国士实为宜丰人，而并非南昌人。戴国士是否有佛教信仰，我们殊难考证，但足以说明的是，他除热衷于政治权力外，还把地方事务作为己任，关注着普利寺的营建和洞山法脉的恢复。当地官员和士绅努力介入到宜春禅宗事务中，并成为三祖庭发展的依靠力量，他们甚至自觉形成一种组织来维系寺院的发展，如《靖安县志》载：

于是捐俸倡率，诸绅士随力醵金为助，共得银若干两，谕乡约某董其事。用价若干，就庵之左右置田七亩有奇，以便耕种。复给僧银，使治田具，又用价买地一区、山一片为种茶采薪之地。更虑其取于田者有限，而修葺庵亭，日用零杂之费有未给也。复以所余之银采置租石，俾僧岁取其税，以佐不逮。^②

士绅所捐银两以“董事”责任制的方式进行管理支配，用于寺庵的修整、日常生活开支，更为了维持寺院经济的长期运作而为其置办田地收取租税，可见士绅对当地禅宗事务的介入之深。

与此同时，地方家族也已经参与进来，当然信众对寺庙的捐赠行为一直都存在，但是大家族大规模隔代捐建寺庙的现象却为数不多，笔者走访宜丰时，发现一个特别例案：

且福润公暄，法号天霖汪老爷，祖居新昌县太平乡二十八都，池源人也。敕任广西浔州府事，署印九载，年八十有二而致仕还归山，恩孚黎民，欲塑像以祀之，亦罕闻异事也。今将创立功绩于后：梵王大殿一重，藏殿一重，禅堂一所，清风亭一所，钟鼓楼一所，恩荣匾一面，大雄宝殿匾二面。以上俱属天霖创建，并未募化。天霖像系大明天顺八年秋月塑，像在寺供奉。惟观音堂，在大明嘉靖庚子岁旦，僧黄光祖等募化，池溪本泰公裔孙志高、志刚、同族志瑞捐金助银买材，命匠鼎建。又塑观音玉像于堂中正殿。志坚等万助礼佛大嫩石二口，各长八尺，阔二尺，府主陈以其清风飒飒，水月溶溶，纤尘不到，万籁无声，俨若西方境界，于是题其堂曰“静虚堂”。又至万历六年，僧黄光祖复化汪君，重修其堂，增一番光彩，种万劫良缘。又万历二十八年，僧吴庆湖再募，重新勒注石铭，记鸿功于不朽，彰善德于无疆。迄今年久，椽桁朽坏，门墙壁倾。仰叩贤良，培先

^① (清)张廷玉等修：《明史》卷278，《列传》。钦定四库全书本。

^② 同治九年《靖安县志》卷13，《艺文》。

人之因果，布后世之津梁。福有攸归，庆泽绵绵，螽斯蛰蛰。谨记。

明崇祯元年夏月，募化僧庆湖徒孙梅崇贤、徐富清。

池溪裔孙汪灿字亮侯眷于萃英山房。^①

关于汪煊，《高安县志》也有一则记载“福润禅师，字天霖，新昌池溪汪氏子，住持筠西洞山古刹。永乐癸卯，授郡都纲。适广西洵州府署有妖为祟，御史潜溟荐为洵州知府，而妖始遁。历官九载，致仕还山，重建寺宇。”^②景泰间（1450-1457），宜丰池溪人汪煊退职后回到洞山，捐资修复普利寺，先后建成梵王殿、藏殿、禅堂、清风亭、钟鼓楼，作为回报，普利寺僧在庙内塑像以祀汪煊；到了嘉靖十九年（1540）汪氏后裔又应洞山寺募化，捐资修建观音堂。此外，万历六年（1578）和万历二十八年（1600）又分别捐修一次。到崇祯元年（1628）汪氏后裔眷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普利寺亦几临坍塌，急需修复，但是这次汪氏并没有承担起捐修的使命，究其原因，大概是汪氏家族因衰落而丧失了经济能力。可见，对于普利寺的修建，汪氏家族是不遗余力的。



图片八：洞山普利寺藏经阁（笔者摄于2016年4月）

卜正民从宗亲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晚明时期士绅对寺院的捐赠行为，认为以宗亲关系为基础的代代捐赠实际上是为了祖先提供祈祷的宗教礼仪的需要。^③汪氏家族对普利寺的这种捐赠行为无非也是出于这一点，他们共同的祖先汪煊就被普利寺塑像供奉。此外，他们之所以几代都乐此不疲地进行捐赠，也是其自身作为地

^① 宜丰县花桥乡池源村《汪氏族谱》，民国刊本。

^② 同治十年《高安县志》卷28，《仙释》。

^③ (加) 卜正民著；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方士绅所产生的责任感和身份感催动的，踊跃参与地方事务，有助于提高或巩固已有的地方影响力，“它是一个人向其他精英成员显示其宗教和艺术才能，并表示与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人社会存在距离的一次机会。”^①寺院成为一个由精英们构建的公共权力空间。

上高县况氏家族对多宝寺的捐资也表明，家族世代对寺庙的捐修不仅是因为缅怀祖先的功绩而不敢中废，实际上也是在地区操控一寺庙话语权的表现：

寺地名鸡公岭，寺则并自唐，而废于元。我先世遂家于此，暨远祖浙江运粮使铭远公度其地隘不足聚族，居谋徙而他。其犹子之子文五郎清修洁行，慕老子高尚，又喜事弥勒、禅释之理，是一是二，颇得其宗，适有高僧平山丐其地，仍建为寺，遂慨捐之，且助以金。于是，子孙世继，凡寺葺垣宇、供佛像、饭僧徒，皆我况氏是赖。^②

况氏先祖在鸡公岭废寺旧址上卜宅居住，后考虑到地形狭隘不足以聚族而迁居他处，到文五郎则慨然捐地建寺，于是况氏家族世世代代对多宝寺“朽则增修，饥则置田”，费心良多。虽则况氏认为之所以要请地方官员刘丙写下这篇《重修多宝寺记》是缘于“而邑志惟曰：站基道人大塘况文五郎主管。记其略也。夫志之详略于一寺何足较计，即寺之有无，于我族何关轻重，而所以不忍弃者，余泽存焉耳。”^③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因念祖先殷德而世代以捐修多宝寺为使命是况氏家族致力于多宝寺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况氏又之所以要详申邑志对于家族世捐多宝寺这一事实记载过略，无非是要告诉邑民，况氏家族不仅对多宝寺占有绝对优先捐助的权力，其对于地方事务也是积极热情的，对地方社会的良好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刘丙在文末会说：“乃叙次其词而记之，使后之人克家象贤，皆能继继绳绳如此于一寺，则况氏之族其可量乎哉！”^④

宜春地方大家族世代捐修寺院的情况在明清时期不止这两例，因之个性并不显著，兹不赘述。

明清时期，儒家（地方士绅）与佛教的互动更加频繁，精英阶层对佛教的热忱程度与唐宋相比不仅丝毫未减，更有着新的进展，官宦富足人家愿意将大笔钱财捐赠给寺庙并致力于建造家族寺庙，且以能否论佛作为品行修养、身份贵贱的标判。到了清初，更多文人和遗民为了效忠于前明而入寺削发为僧，并以此躲避清政权的迫害，寺院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文人“俱乐部”。寺僧也积极融入文人群

^① (加) 卜正民著；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② 同治九年《上高县志》卷11，《艺文》。

^③ 同治九年《上高县志》卷11，《艺文》。

^④ 同治九年《上高县志》卷11，《艺文》。

体之中，如“克文，号雪印，天宁寺僧。博通经史。尝与梁石门、刘山阴、彭匏庵、金雪崖结为诗社。”^①晚明士绅张岱还自责到“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不成，学农学圃俱不成。”^②在他看来，领悟不到佛义也是他自觉人生“失败”的一点。总之，佛教日益与地方社会融合，地方精英对佛教也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热情和超前的关照。

三大祖庭的形成也正契合于此，它们的动态历时性演变就是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果。虽然由于史籍记载不足，我们难以从一个非常全面的角度来看待宜春地方精英对禅宗的鲜明态度或某些离合关系。但是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官僚士大夫还是宜春官员、地方士绅或地方大家族，他们都支持着禅宗在宜春的弘法和三大祖庭寺院的修建，是三大祖庭得以复兴、持续发展的经济来源和保护力量，成为禅宗在宜春传播的重要推力。

4.2 禅农、禅茶与禅宗：禅院庄园地主经济的形成

“禅农并重”与“禅茶一味”是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两个文化标识，禅宗与农业、茶叶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独到的文化旨趣，即于禅修之外特别注重农业生产和茶业发展。

唐中晚期，禅宗在《百丈清规》的体制下逐渐发展起以种植业、养殖业、林牧业为主，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禅院小农经济，这在禅宗公案中多有体现：

开垦荒田。一日谓众曰：“你为我开田，我为汝说大义。”僧众开田竟，师晚间上堂。僧问：“开田已竟，请师说大义。”师下禅床，行三步，展手两畔，以目视天地，云：“大义田即今存矣。”^③

水稻种植。师谓仰山：“何处来？”仰曰：“田中来。”师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势。^④

蔬菜种植。师入园取菜次，师画圆相，围却一株，语众云：“辄不得动著这个。”众不敢动。少顷，师复来，见菜犹在……师铲草次，有座主来参，值师锄草，忽见一条蛇，师以锄便饋。^⑤

牛畜养殖。沩山同师牧牛次，沩曰：“此中还有菩萨也无？”师曰：“有。”^⑥一日，在厨作务次，祖问：“作甚么？”曰：“牧牛。”祖曰：“作么生牧牛？”

^① 同治九年《清江县志》卷十，《仙释》。

^② (明) 张岱著；云告点校：《琅嬛文集》卷5，《自为墓志铭》。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99页。

^③ (宋) 释道元：《景德传灯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99页。

^④ (宋) 普济编；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23页。

^⑤ (宋) 释道元：《景德传灯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120页。

^⑥ (宋) 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30页。

曰：“一回入草去，募鼻拽将回。”祖曰：“子真牧牛。”^①

茶叶生产。普请摘茶，师谓仰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请现本形相见。”仰山撼茶树。^②

林木栽植。师与黄檗栽杉，黄檗曰：“深山里栽许多树作么？”师曰：“一与后人作古记，二与山门作标榜。”道了，以䦆头打地三下。^③

从上述史籍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禅僧们在禅修之外为了满足自我消费，必须完成足量的农事劳作，他们以禅院为单位统一进行经济生产，涉及到水稻、蔬菜、茶叶等农作物的种植，也有养殖业、林牧业的发展，精耕细作，自给自足，他们所生产的农产品仅供禅僧内部消费，属于简单的小农经济。

在“禅农并重”并依靠农业自力更生的理念背景下，宜春几乎每个禅宗寺院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产，诸如栖隐寺、黄檗寺、普利寺三大祖庭发展到鼎盛时期，其山田面积皆在千亩以上。此外，各小禅院也相应拥有能够维持生计的足量田产。

而至于其田地来源，大致分为四类^④：其一是通过开垦荒地而得，这种情况大致存在于唐中后期禅宗初创时期，如《百丈清规》和许多禅宗公案里就有关于禅僧开田的记载。其二是由地方乡绅捐施，如樟树新兴寺“时与里士杨君正望游，正望因为予言，绕寺田八十余亩，多其先世松云所施。松云，宋处士，以财甲里中。”^⑤其三则由朝廷赏赐，如宜丰资福寺“僖禅师，肃宗第十四子，从南阳忠国师出家。后居逍遙山，赐田甚广，为建资福禅寺。”^⑥其四则源于寺僧从外购买，如樟树西竺禅院“(住持)鉴公复自捐资，续买余姓之田，筑基而扩佛宇……国朝康熙戊午冬，有遂光和尚者，鉴公之落发孙也，得法于新昌之洞山。睹其殿宇倾颓，感怀旧迹，因解己囊，买田数亩，再扩其基。”^⑦

有研究表明^⑧，与唐朝相比，宋时寺院田产的来源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一就是皇室赏赐减少，寺田主要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的捐施；其二则是寺院田地买卖更加频繁。宜春禅院寺田的来源也在唐宋之间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寺田从最初的自行开垦变为唐宋以后以士绅的频繁捐施、从外购买为主。

唐宋之后，随着禅院土地资源、流动资金的渐渐积累，禅院经济形态发生了

^①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60页。

^② (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142页。

^③ (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206页。

^④ 许怀林认为唐代江西寺院的田产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朝廷官府的赏赐，二是官贵富有人家的施舍。陈必昌认为唐代寺院田产来源于：1、国家法定授田；2、朝廷赏赐或私人赠与；3、寺院僧人的开发；4、寺院购买。(详见许怀林：《十世纪前佛教在江西的传播》。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陈必昌：《唐宋寺院田产来源的变化与影响》。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宜春禅宗志》编纂委员会：《宜春禅宗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65页。

^⑥ 同治十一年《新昌县志》卷6，《寺观》。

^⑦ 《宜春禅宗志》编纂委员会：《宜春禅宗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46页。

^⑧ 陈必昌：《唐宋寺院田产来源的变化与影响》。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重大转型。首先是禅院土地经营模式的改变，寺院拥有如此大规模的田地，自然不完全由僧人耕种，大量田地是以租赁的方式由周围村庄佃农租种，寺院向其收取一定的租粮以维持收入。笔者采访宜春东南村村长得知，民国前期，栖隐寺已无僧人居住，但仰山一代还住着几户看管田地的佃农，倘若不出所料，极有可能就是曾经为栖隐寺耕种的佃户，只是那时寺产已被当地乡绅所占有。元代德辉所编《敕修百丈清规》里即有“庄主”一节专述宋元时期禅院庄田租税的管理情况。虽则《敕修百丈清规》里少部分内容是对怀海《百丈清规》的复制，但是也有部分是宋元后世依时事增补的，如“诸庄监收”一节即表明是发生在宋元之间的经济形态“《古规》初无庄主监收，近代方立此名。”^①笔者推测，“庄主”一则大部分内容也应是宋后增补的。所以，我们仍可从《敕修百丈清规》中去探析唐宋之后宜春禅院经济形态的转变。

寺田变为由佃农租种后，禅僧的基本事务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每日“普请”开田耕种劳作，而是“视田界至，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些少事故，随时消弭，事关大体，申寺定夺。”^②禅院的田地管理模式变为由佃农耕种，僧人坐收地租、监督佃农劳作。关于租佃收取、农事安排也有相应规定：

盖耕种有佃，提督则有甲干。收租之时，自有监收僧行。此外纵有输纳、修圩、俵粮等项，只临时分委勤旧、知事，限期使办，事毕旋归。^③

在这里，收租之事由“监收僧”负责，输纳、修圩、俵粮等事务则临时委托给“勤旧、知事”办理。可见，此时上层组织的建构也因经济形态的转变而相应得到调整。宋元之后，庄园经济的运作事项涉及很多，其职位设置也越加丰富起来，诸如：

副寺：掌常住金谷、钱帛、米麦出入，随时上历，收管支用。令库子每日具收支若干，签定飞单呈方丈，谓之日单。或十日一次结算，谓之旬单。一月一结，一年通结，有无见管，谓之日黄总簿。^④

典座：物料调和，检束局务。护惜常住，不得暴殄。训众行者循守规矩，行益、普请不得怠慢。抚恤园夫，栽种及时，均俵同利。^⑤

^①（元）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②（元）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③（元）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④（元）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⑤（元）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直岁：田园庄舍，碾磨碓坊，头匹舟车，火烛盜贼，巡护防警。差拨使令，赏罚惟当，并宜公勤，劳逸必均。如大修造，则添人同掌之。^①

园主：不惮勤苦，以身率先。栽种菜蔬，及时灌溉。供给堂厨，毋使缺乏。^②

磨主：兼主碓坊米面，供众极有关系。须择有道心人，暗晓春磨等事者充之。^③

从这些职务的设置及其职责的划分中，我们不难想象宋元之世宜春禅院庄园地主经济的规模之大和完善之程度。唐中后期因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废除，取而代之的则是两税法的施行。两税法后，国家对土地的控制逐渐放松，土地私有越来越普遍。到了宋代，封建租佃关系得到进一步确立，禅院不但拥有大量田产，还占有适量劳动力，如“碓坊”“菜园”“田园”“园夫”“磨主”的记载就足以说明问题。

可以说，自宋开始，大量田地的获得使宜春寺院的农事生产出现了租佃制的经营模式，寺院成为一个拥有大量田产和适量劳动力的小庄园，寺僧转变为依靠收取地租为业的新式地主，这种禅院庄园地主经济既受到封建土地制度庄佃制的影响，也属于封建地主经济的一部分。

在禅宗主张的“禅农并重”理念中，茶叶种植也是农事生产的一部分，“饭后三碗茶”的禅宗家风显示了茶与禅宗的渊源。

宜春适宜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丘陵地形给茶叶种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宜春自古生产茶叶，这在史籍中多有记载：“（丰城）茶，山乡处处有之，出孤山密岭者佳。”^④“《茶谱》云：袁界桥，其名甚著，今称仰山稠平、木平者佳，稠平尤号绝品。”^⑤

袁州仰山、宜丰黄檗山所产茶叶历来著名，文人多有诗文盛赞，如南宋理学家张栻所作《定叟弟频寄黄檗仰山新芽，尝口占小诗，适灾患无聊，又不得遣寄，今日方能写此》^⑥：

瘴雨昏昏梅子黄，午窗归梦一绳床。

年，第 105 页。

^① (元) 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05 页。

^② (元) 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06 页。

^③ (元) 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07 页。

^④ 同治十二年《丰城县志》卷 2，《土产》。

^⑤ 光绪七年《江西通志》卷 49，《物产》。

^⑥ (南宋) 张栻：《张栻集 二》. 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第 533 页。

江南云腴忽到眼，中有吾家棠棣香。

集云峰顶风霜饱，黄檗洲前水石清。
不入贡仓供玉食，只应山泽擅高名。

第一首诗中所提到的“江南云腴”指的就是仰山茶，诗人正在做着回乡的梦，弟弟寄的茶叶就到了，清香之味更加深了诗人的思乡之情；第二首诗中则提到虽然仰山茶没有和黄檗茶一样被列为贡品，但是它在宜春地方却享有高名。可见，仰山茶、黄檗茶在宋代士大夫中的知名度了。



图片九：仰山栖隐寺茶园（笔者摄于 2015 年 12 月）

仰山茶“宋时，称袁州茶为绿叶金片”其种类有“稠平”“木平”多种。仰山沩仰宗自创立之初就与茶叶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其时间可追溯至晚唐时期。慧寂修法过程中就有与灵佑禅师采茶探讨禅理的公案：

普请摘茶，师谓仰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请现本形相见。”仰山撼茶树。师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仰山云：“未申和尚如何？”师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师云：“放子二十棒。”^①

而在栖隐寺的寺产中，有一部分即为茶园，现在仰山下还有两块茶园为栖隐寺所有。茶叶除供寺僧消费外，还向外销售，其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笔者在走访栖隐寺时，得知茶叶生产也是寺院资金的一项重要来源。

茶以寺名，黄檗茶也依黄檗寺而名，寺僧在寺院山前种植茶叶，采摘加工后

^① (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142页。

用寺旁虎跑泉水泡饮，香浓醇正、沁人心脾。根据《瑞州府志》记载，黄檗茶在唐宣宗时就已经被列为贡品。苏辙谪任高安时，专到黄檗山寻访，并留有诗文“黄檗春芽大麦粗，倾山倒谷采无余。只疑残卉阳和尽，尚有幽花霰雪初。耿耿清香崖菊似，依依秀色岭梅如。经冬结子犹堪种，一亩荒园试把锄。”^①由于黄檗茶产量较少，而士大夫又相互推崇，于是寺僧和茶户便用其他地方所产茶叶来冒名顶替黄檗茶：

江西瑞州黄檗茶，号绝品，士大夫颇以相饷。所产甚微，寺僧园户竟取他山茶，冒其名以眩好事者。黄鲁直家在双井，其自言如此。^②

寺僧和茶户以假乱真的社会现象背后说明的实际情况是，宋时黄檗茶已声名日高、销售紧俏。此时，黄檗寺和栖隐寺都已经形成了一条以茶叶种植、采摘、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成为寺院经济生产的重要一环，并延续至今，现在仍销往长沙、武汉、广州等地。

《百丈清规》及诸多禅宗公案也表明，宜春禅宗在传法初期就注重茶叶种植，但是在宋以前，禅院茶叶只是单纯地满足寺僧的自我消费；到了宋时，禅院茶叶的生产和销售也逐步规范化、市场化、经济化，大面积的茶叶种植和销售也预示着禅院庄园商品经济的形成。不仅如此，茶叶生产也加速了士大夫与禅宗的融合，使禅宗的文化意趣和精神特质有了玄理式的转型。

综上所述，禅农、禅茶对宜春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禅农、禅茶为主导形成的禅院庄园地主经济，不仅恩惠于宜春禅宗甚至中国南禅的长远发展，也促成了禅宗内部精神文化内核的转变。随着禅院地主经济和世俗地主经济的相互交融，禅宗的世俗化进程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加快，禅宗与官府的赋税纠纷、与土民的土地之争就是两例佐证。

4.3 官府、土民与禅宗：赋税纠纷及土地权的争夺

《敕修百丈清规》指出，在禅院庄园形成之后，禅宗开始出现凋弊百出的情况：

近时丛林，凋弊百出，而庄中尤甚。略举其三：诸方通害，初争庄职，安能遍及？构怨住持，上下不睦，一也。一充其职，离寺相远，靡所不为。致争起讼，供众钱粮，尽皆耗费，复积逋负，以累于后。因而纪纲不振，庄佃生侮，租课不

^① (宋)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1页。

^② (宋) 朱彧：《萍州可谈》。钦定四库全书本。

还，其弊二也。纵使老成能事充之，而州县应酬，吏胥管干、乡都役、邻里富豪，皆合追陪。既启其端，稍有不及，便生衅隙。虽不明支，而巧立除破，公私无益。故庄中之费，或半于寺，其弊三也。^①

列举的三大弊端都涉及到“庄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首先，由于禅院职务增多导致禅僧争执不止而上下不和睦，且众僧耗费钱粮造成财务空缺；其次，禅院与佃户的关系处理不周激发矛盾，庄佃拒交租税；最后，在与州县胥吏、富豪的周旋中倘若不加注意也极易产生问题。总之，宋之后，禅院与官府、佃农、乡豪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首先，官府与寺院在土地关系上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大多数情况下，寺院财产享有赋税豁免权，僧人可以法内自行开种土地、发展庄园商品经济而不受官府的盘剥，但是在某些特殊时期，随着国家财政开支的扩充以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发生，寺院经济也要被地方官府课以重税，如百丈寺就曾经因为课税过重而几临僧散寺废的局面：

（百丈寺）原有遗租七百亩，着输官粮八石。后以丈量裁多，僧遂散而寺废焉。及至冯侯清查邑中旧隐新垦之田，令其升科以抵补寺之荒田。又选寺之发僧顶充百丈哨精兵二名，即将兵饷对支本寺条银一十七两八钱。申详院司道府，永为定额。官免追征之烦，僧免比较之苦，得以供佛祝圣、祈寿酬恩，此忠君爱国之兼至，而良法美意之悉到者。续署不一，寺兵之饷未照对支，僧遂逋粮逃亡者多，公私共受累矣。

予自莅兹土也，田亩之利病悉心兴除焉。及目击寺山之耸拔、租田之硗荒、僧众之贫逋，恻然轸念，思为调停之术。有僧名佛慈者，且以词诉困也。乃邑佐谓照额对支之为便。予行之，而僧其感庆甦息也。^②

唐宋时期，百丈寺共有田地千余亩；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已经大不如前，仅有七百亩土地的租粮，官府向其课税粮八石。此后，由于官府田地丈量过多而课税较重，以致僧逃寺废。知县冯挺清查土地，为减轻百丈寺的赋税负担，特制定一例，从寺中挑选两位僧人充当百丈哨兵，可得兵饷十七两八钱。这样，才使得百丈寺避免了渐入困顿的局面。但是后来，官僧两者在兵饷和赋税两方面又产生了矛盾：官府兵饷迟迟未予支付，寺院无法缴纳税粮。直至王倬然到任奉新，百丈寺仍然是田荒僧穷，僧人经常向官府诉苦。

^① (元)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② 释本焕、释顿雄主修：《百丈山志》。奉新：江西大雄山百丈禅寺，2010年，第312页。

到了顺治年间，为扩充国赋，官府又胡乱将百丈寺田不管荒熟一概认定为熟田（熟田，即指常年耕种的田地），加重了百丈寺的税额征收。洪其清通过走访，为百丈寺检得下田九十三亩，又根据前明冯侯僧兵抵荒的规制，选两名僧人为垛夫，充兑其余税额：

奉新之百丈寺，自唐迄今，千有余年矣。历考其兴废，多因田赋不均者。何也，盖山高则风刚，气寒则水冷。壤既不同，则亦宜异调剂。乏人，名山削色矣。

余佐筠阳，闻其胜概，颇怀策杖之思。以今夏承乏兹土，适丈量告竣，归户期迫。寺僧正观遂有以荒升熟之控，而以《百丈山志》及万历年间抵荒增兵之详文为据。先是，顺治四年，正观报有新塔蛇形等土墩共粮十有五石，经今十年，俱免征派，寺累少甦。今公正一概升熟，意虽为国赋足额，而不知挤寺僧于颠也。且山深人寡，赋重僧逃，将恐现在成熟数项亦将委之溪壤，足额不几折额乎？

余因访之舆论，佥曰：健康之误遗可抵也。于是果得下田九十三亩，补粮五石八斗。又仿原百丈僧兵遗规，以垛夫二名令辨发僧顶充塘防外界，计每年工食一十四两零，亦可兑其余之九石二斗。庶乎，积荒可除，世外缁流得以享我皇清浩荡之化日矣。^①

洪其清在碑记文末说道“得无吏胥舞文、豪强兼并，以僧为远可欺、弱可食，而指遗荒以兴戎，指兑支以润私者乎。”指出了官府对寺院田产的压榨之实、厉害之程度及两者利益之权衡。我们在考量一寺之兴废的时候，往往思考得更多的因素是战祸、火患等自然灾害，很少看到官府对寺庙赋税控制的松弛力度也会决定一寺之兴废。但从这两篇碑记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百丈寺千年以来的兴衰更替绝大部分是因为田赋的重创所致。而且，联系明清以来的史实亦可推测，宜春禅宗寺院在此时大部分颓废不兴的原因也绕不开官府重税的压制。所以，明代程应龙在《重修慧力禅寺记》中指出：

盛则名僧辈出，默证佛性，大演教宗，禅心诗思，雅重名流，最下犹能谨守寺物，无负国赋，以是冠盖云集，士庶会游，松筠枫柏夹道连城；衰则弃教蔑戒，为世厌薄，轮蹄稀至，逋负日多，质山鬻树，逃散以去。寺所兴颓亦由于此。^②

由此可见，有无负于国赋的确是导致寺之兴颓的一方面原因，有则“质山鬻树，逃散以去”，无则“冠盖云集，士庶会游”，前后相差之大，甚为悬殊。于是，我们不得不疑惑，为何明清之际官府会加重对寺院赋税的征收呢？查据史实得

^① 释本焕、释顿雄主修：《百丈山志》. 奉新：江西大雄山百丈禅寺，2010年，第313页。

^② 顺治二年《清江县志》卷8，《艺文》。

知，明清时期，南昌、袁州、瑞州三府成为江西官田重赋区，明政府对其所征之税要高出以往之三倍，史载：

元至正末，伪汉陈友谅窃据南昌、瑞州、袁州三郡数年，地少用繁，横征兵饷，南郡除武宁为生身之地不加派外，加南、新等七州县及袁、瑞二府较宋元旧额浮三倍。自明太祖定乱归一统，意谓上膺天命，如日之升，而三郡以理学节义之乡，冥然为渔家子抗拒，是以忿不减赋。当时固有从龙之彦，三百年非无忠直之臣，未闻为民哀吁，或谓三郡有以自取。然友谅方拥重兵，彫敝之民心心倪倪，孰能弗受其迫胁与？^①

关于重赋形成的原因，有研究认为^②，是朱元璋对陈友谅统治过的“敌区”进行政治打击的结果，“友亮当元末窃据隆兴横敛以给军，加南昌、瑞州、袁州民赋三倍”^③，当时袁州府田每亩征收税粮高达一斗六升七八合，而同时期的新喻县和安福县则每亩只征收九升三合、七升三合，比较之下差异甚大。^④重赋状况的形成，对宜春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袁州之民甚至倒拆房屋，变男鬻女。年复一年，民力殆尽，逃亡接踵，田地抛荒，钱粮墮误，地方不胜困敝。”^⑤其实，民不聊生、田地荒芜的凋敝之状也是这一时期许多禅院的真实写照，置于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为何官府会对百丈寺屡屡施以重税的原因了，也不难理解重赋之能造成百丈寺屡屡颓废的现象了。

所以，有鉴于此，寺庙之间对于田地和赋税的态度也是谨慎而微的，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干系到寺庙的长远发展，如宜春仰山范围内六个禅院的僧人就田地、税粮问题自主达成合约：

立合约

僧人六禅等，缘因本年届期编审，奉示：凡有田亩，毋许诡寄。蒙通图十递，允在南隅一图图尾另立僧户输粮，具稟县主庄爷批准在案。是以请同通坊长议定，所有催趲差役不得干及僧人。倘奉照粮差役，僧人自管。每年钱粮南宋，照限自封投柜，不致逋欠愆期。在后倘能继置田业，仍从收归僧户。在后僧人不得包蔽别庵，如有此情，任从图递执约鸣公，僧人自干了讫。今恐天凭，立合约二纸，各收一纸存照。

^① 同治十年《新建县志》卷 11，《田赋》。

^② 相关研究成果可见：林枫《明代南昌、袁州、瑞州三府的官田重赋问题》、范金民《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郑克晟《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及廖云德《明清时期江西重赋问题与地方社会：以南昌、袁州、瑞州三府为中心》等论文。

^③ 光绪七年《江西通志》卷 83，《田赋》。

^④ 施由明：《明清江西社会经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0 页。

^⑤ 同治十一年《萍乡县志》卷 3，《田赋》。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僧一堂、中根、小因、维达、度念、广也。^①

其次，官府与寺院在赋税上的利益纠缠值得我们注意，而地方土豪、乡民对禅院寺产的觊觎也是不容忽视的，诸如：

逍遙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几盡。前長老文因訴縣，十得一二，可以居眾矣，而眾未集。

^②

宋建炎間，寇毀之。僧徒入山，後依神祠居者二百年。延祐甲寅，南昌寶華院普通來主寺。眾屋欲壓，田質于豪。通傾己囊償之，暫圖興復。^③

有古廟，游人疲倦者可暫為郵舍。其入寺渡小江亦同。寺中田園甲鄉，于今什不存一，蓋盡入尋常百姓家耳。^④

臨江府東關外舊有禪林寺，故老云唐初創也。然寺廢如故，寺舊載常住田八十石，鄉豪牟而有之。^⑤

向之號為名剎勝地者，至今徒見山空而景淒。幸覺靈不昧，真性長存，歷七百余年而坟墓猶在。奈被棚人铲削，碑碣頽廢。^⑥

可见，早在五代时期，土豪、乡民对禅院寺田侵占的现象就已经发生，一直到明清时期依然存在。这里需要注意到的是，“棚人”也参与到了对寺产的倾夺之中。明清之际，社会战乱使得大批闽西、赣南流民涌入宜春，这些移民在宜春进行土地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土著居民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被统称之为“客民”“棚民”。据同治《袁州府志》载“宜春、分宜原編棚民人丁一百八十七丁，食盐课一百一十四口。”^⑦“棚民”初到宜春，想要与土民在土地争夺上获利并非易事，而侵占无主之寺产恐怕要简单得多。

通常，一寺院因宗派衰微或遇兵乱而荒废之后，年岁过久寺产便为乡民所私有，但等到僧人归来重整寺庙，土地之争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僧人若有财力则可通过购买的方式重新赎回旧有寺产。虽则在明清时期，朝廷对寺庙土地的管理甚为严格，而明太祖也曾下令“天下僧、道的田土，法不许买。僧穷寺穷，常

^① 《宜春禅宗志》编纂委员会：《宜春禅宗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91页。

^② (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43页。

^③ (元)释大䜣：《蒲室集》卷11，《龙兴路靖安县双林大中禅寺碑铭有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1页。

^④ 同治九年《重修上高县志》卷11，《艺文》。

^⑤ 顺治二年《清江县志》卷8，《艺文》。

^⑥ 《宜春禅宗志》编纂委员会：《宜春禅宗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48页。

^⑦ 同治十三年《袁州府志》卷9，《户口》。

住田土，法不许卖”^①。但是，逆法之事在地方却是常态，寺院土地及其他财产的买卖在各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大多数情况下，僧人并没有赎买的经济能力，若亦没有如戴国士那样将所得寺产无偿捐回寺院的士绅，那么，就只能投诉于官府了：

东来庵，建城坊东关外。旧名观音堂。明万历间，邑举人袁汝祝建，后兵毁。清康熙戊子，僧晓云偕邑庠张问达、易观国、龙学勲、龙韬等募坊众重修，僧文贤、静泰醵资生息置产，有碑。乾隆辛巳，袁贤七兄弟同僧圆明更募重建。咸丰年间，渐圮，又被土人侵蚀庵产，会内后裔举人潘绍岳等控县，清出契据，于同治二年募化重修，择僧住持，以会内租息为香火资，复旧观焉。^②

该寺庵的资产经营模式是以士绅组织起来的“会”来运作，说明，士绅还以“首事”为领导的“会”参与对寺产的管理。而寺产被土人侵夺后，也是由“会”内士绅潘绍岳向县府控诉才得以追回。这里，士绅成为了寺院的代理人和发言人。士绅之所以积极异常，或许是因为僧人不便于参手俗世之争，也或许是因为寺产本就是士绅所捐，士绅总因一种责任感而踊跃起来。再举一例：

祝圣寺，在五十三都狮子林。嘉庆十二年，叶应麟捐银估产，转施僧参孙住持。道光五年，寺火，产卖。经应麟孙叶清控，奉知州杨咏齰断，赎入寺，永禁典卖。八年，修复禅院。迄今称丛林焉。^③

其实，在倾占寺产事件发生之前，寺院田产往往就会寻求官府的庇护，如“(水月寺)嘉庆间，僧普庆等置有香火田一百五十三桶，额租十九年，以田契六纸呈县存案，徐乐山批示勒石。”^④那么，官府对于寺院的财产之争是持何种态度呢。从一些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官府是支持寺院对寺产的所有权的，而下面一则诉讼案也有助于我们看待无主庙产在家族与官府之间是如何被处理的：

县主张 堂断

审讯得口埠墟地方向有水府庙一所，何姓基地，何人建造，岁年远湮，无从查考。该处谌、陈、罗三姓，人烟独多，每年各人赴庙祭祀，并无争阻。嘉庆丙辰年续修邑志，陈、罗二姓以水府庙坐落伊等住处贴近，作为陈、罗二姓所建，

^① (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 上》。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② 民国二十九年《万载县志》卷2，《寺观》。

^③ 同治十二年《义宁州志》卷11，《寺观》。

^④ 同治十年《宜春县志》卷2，《寺观》。

增入新志。嗣经谌德忠等以栽种霸庙等情出控。兹经集审查姓地邻，均称该庙历系公众奉祀，未知何人建造，且查水府庙由来已久，康熙辛亥、乾隆己亥两次修志，并未载入。今次修志，忽然添出，并注陈、罗二姓所造字样，自应铲除，以杜混淆，庶免争端。该庙仍照旧断为公庙，不论远近，居民听其赴庙祭祀，彼此各无争阻滋事。至该处桐坑桥，谌姓称系伊祖所建，已有碑记，陈、罗并未与争，无庸置议。

嘉庆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审结。^①

这是宜丰县《谌氏家谱》上记载的一件非常普通的诉讼案，案中所指“水府庙”因年岁久远而成无主之所。于是，该处陈、罗二姓家族便利用续修方志的机会占有为已有，谌姓家族以谌德忠为代表向县衙控告陈、罗二姓。县衙依据实情，将水府庙判为公庙，许所有乡民前往祭祀。这则案件中，水府庙成为三大家族利益的争端点，谌氏之所以乐于在家谱里记下这段公案，恐怕也是为私利计。官府否认了陈、罗二姓对水府庙的霸占，并不认为一寺庙之来源无可考据就可归于某一方，它应该属于全民共有。这样的仲裁从侧面来说有利于僧人向土豪、乡民索要寺产的控诉。

经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禅院庄园地主经济发展到明清时期，与地方社会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官府加大了对寺院赋税的征收力度，导致部分寺院处于荒废的境地，最为典型的案例则是百丈寺在明清时期的兴衰交替；另一方面，当寺院荒芜后，寺产被土民和棚民瓜分殆尽，等到僧人归来重整寺院，两者不断产生土地之争，在寺院与地方乡民进行土地争夺的博弈中，士绅成为寺院的代理人和发言人，官府对于僧人向乡民索回寺产的控诉也是持支持态度的。

4.4 灵验故事所见的地方社会：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

一种信仰能够产生诸多灵验故事，不仅表现出其在地方所受的推崇程度，也反映了该地区民众通过神灵来诉求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种种现实需求，这些灵验故事正反映了一时代社会变迁的真实面貌。

禅宗在唐中后期作为外来宗教进入宜春传法，在传法初期就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百丈怀海）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随众听法。一日众退，唯老人不去。师问：“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问：

^① 宜丰县档案馆藏《谌氏家谱》，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某对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贵脱野狐身。”师曰：“汝问。”老人曰：“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师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礼曰：“某已脱野狐身，住在山后。敢乞依亡僧津送。”师令维那白樵告众，食后送亡僧。大众聚议，一众皆安，涅槃堂又无病人，何故如是？食后师领众至山后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①

《五灯会元》里记载的这则公案就是后来“野狐禅”典故的来源。随众听法的老者因为说了妄语，而被罚以“野狐身”，五百年后因怀海的一句话而开悟才得以脱离。这则故事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百丈怀海在弘法之初就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当时，随怀海修法而出众有记录者就多达30人，其中有黄檗希运、沩山灵佑、五峰常观等高僧。也正是因为有众多追随者，宜春禅宗才得以迅速传播开来。



图片十：黄檗寺虎跑泉（图片来自 <http://image.baidu.com>）

当然，传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可估量的，禅宗初创者常常选择在偏僻幽深的山林里修建寺院，首先所要克服的就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虽则史籍中较少记载禅僧们筚路蓝缕的艰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灵验故事来了解大概：

有一回，希运在正殿召集大小和尚宣讲佛法。忽然有只吊睛白额猛虎，青天白日从山上跑下，闯入大殿，碰倒香案，把大小和尚们吓得乱作一团。希运不慌不忙，闭上眼睛，口中念念咒词，用手一指，那倒在地上的香案，变成一块大石，那猛虎被大石压在下面，一动也不动。从此老虎就在大殿大石下，每天听希运讲

^① (宋)普济著；苏渊雷校点：《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2页。

经诵课，时间久了，那猛虎也被感化了。^①

观察使裴休访之（潭州华林善觉禅师），问曰：“还有侍者否？”师曰：“有一两个，只是不可见客。”裴曰：“在什么处？”师乃唤大空、小空，时二虎自庵后而出。裴睹之惊悸。师语二白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②

希运以讲经的形式驯服猛虎，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可信度。更加难以信服的是，希运圆寂后，猛虎从大石下窜出，撞死在石头上，虎血化成清泉从石下流出，成为了“虎跑泉”。众所周知的是，古时深山多猛兽，希运在黄檗山开山传法，偶遇老虎应该是常事，这则故事似乎告诉了我们希运在黄檗山弘法的艰难历程。与老虎等猛兽搏斗，并仅靠法威而降服猛虎的事例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

是山峭绝，复无人烟。猿猱为伍，橡栗充食。经于五七载，绝无来者。师自念言，我本住持，为利益于人，既绝往还，自善何济？即舍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见蛇虎狼豺，交横在路。师曰：“汝等诸兽，不用拦吾行路。吾若于此山有缘，汝等各自散去；吾若无缘，汝等不用动。吾从路过，一任汝喫。”言讫，虫虎四散而去。师乃回庵。^③

乾道元年八月望夜，长者刘汝明、巡检丁骥，伫立间，望见南岭上毫光微天，知师定隐於此。次日追寻，斫山讨路，径至南岩。师坐处，但见龙吟虎啸，震动山谷，二长者及从人皆生惊怖。师乃曰：畜生可化身来，休惊吾檀越。遂化作二仙童来，即今师前侍立龙虎二仙是也。^④

这两则事例也发生在唐宋时期，它直白地告诉我们，在“绝无来者”的深山老林里，老虎是禅师们面临的麻烦之一，如禅宗公案中所记载的“百丈日问师（希运）：‘什么去处来？’曰：‘大雄山下采菌子来。’百丈曰：‘还见大虫么？’师便作虎声，百丈拈斧作斫势，师即打百丈一掴，百丈吟吟大笑便归。”^⑤这类记载并不是虚构的怪诞之辞，其也有真实性存在。传统时代，虎患是影响一个地区社会生活的不良因素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人口逐增、山区开发加速，环境遭到破坏，虎患在南方地区盛行，这在很多地方文献中有记载，宜春也出现过不少虎患问题，这从各地的《驱虎文》和《杂志》中可见一斑：

盖闻潮阳鳄为患，昌黎来而南徙；九江虎为灾，宋均至而东渡。阳虽刺史之

^① 刘国庆主编：《黄岗镇志》。宜春：宜春市同茂印务有限公司，2014年，第178页。

^② (宋)普济著；苏渊雷校点：《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3页。

^③ (宋)普济著；苏渊雷校点：《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21页。

^④ 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6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91页。

^⑤ (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145页。

德，而阴实城隍之功。璨奉朝廷牧民之寄，神膺国家显佑之封。猛虎在县东十里许伤人，非惟璨之德不足以驱猛兽，抑且神之灵不足以庇生民，阴阳之职，皆不称矣。今者谒神，特与神议。若用神兵驱之，或隐遁山林，或远避东渡，乞赐阴阴三爻；若用猎户捕之，使粉身碎骨，或剖腹诣街，乞赐阳阳三爻。神其有灵，愿赐昭报。谨告。^①

比者猛虎昼出择肉当路，郡县伤噬至数十人，岂吏实不德使然与？神之食于兹土，固为民捍灾御患者也。^②

靖安袁姓人，能化虎为淫为盗。久之，父闻而伺其出，覆盂水而研令牌，遂不能返形。后有见虎前一足，乃人手者，曰：“此袁某也。”众射杀之。呜呼，一念之恶，化为异类，书传所载可为猛省而况学术以求之乎。^③

虎患成灾，到了实在难以消除的时候便只好请求神灵的帮助。因此，虎也成为古人欲先杀之而后快的恶兽，为非作歹之人就常常被冠以猛虎凶煞的坏形象。同时，古人也认为，虎是“山兽之君”是山神的化身，它能感应人间道德的善恶而驯服于神明。^④于是，老虎成功被捕之后，人们会感恩神灵的荫功，试看施闰章在清江县（今樟树）所作《获虎谢神文》：

施子作文驱虎之二日，清江县南十里，有虎在原，忽坠深谷，土人杀之以献，吏民咸欢谓神赐。乃荐虎肉，修以牲醴而告之曰：“告神捕虎，曾不三日，不田斯获，繄岂人力？事有适然，敢贪天功，神不可度，感而遂通。山民孔艰，莫敢宁处，去暴务尽，俾歌乐土。尚飨！”^⑤

所以，除去这些故事的神秘性，希运和沩山灵佑等禅师在林薮中频频遇到老虎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信事，而仅凭诵经、言语说教就能感化老虎显然是人们在主观意识上所做的努力罢了。对于“虎患”问题的处理，世俗世界采取的是捕杀和道德说教的手段，而禅宗则是以信仰的法威来镇服。

同样，在仰山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慧寂来到集云峰下时，眼前荆棘遍布、前方无路，正不知往何处走的时候，一只水獭从山中窜出，指引着慧寂涉过一条小溪，来到了一片开阔的空地，慧寂就在此结庐弘法。后来，人们在小溪上修建了一座小石桥，就叫“獭径桥”。

^① 同治十一年《万载县志》卷 29，《艺文》。

^② (清)施闰章著；何庆善、杨应芹校点：《施愚山集》。合肥：黄山书社，1992 年，第 463 页。

^③ 同治九年《靖安县志》卷 16，《杂志》。

^④ 黄志繁：《山兽之君》、虎患与道德教化——侧重于明清南方地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 年。

^⑤ (清)施闰章著；何庆善，杨应芹点校：《施愚山集》。合肥：黄山书社，1992 年，第 464 页。

仰山在唐宋时期还是人迹罕至的偏僻之所，野兽相杂其间，张商英在《仰山庙记》中感慨道“呜呼，兹山介于南方偏僻之所，蛇蟠之都，虎豹猿狐之所庐，魑魅魍魉之所窟。宅蔽以荆榛，限以峻绝，樵夫牧子望崖而返，马蹄车辙不与人间世通者，莫知其几千万年。”^①同时期的苏辙在被贬官至高安后也同样描述道“高安郡本豫章之属邑，居溪山之间，四方舟车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然以其险且远也，士之行乎当时者，不至于其间。”^②与老虎、水獭、豺狼等猛兽搏斗，是高僧们在深山中弘法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问题之一。



图片十一：仰山栖隐寺獭径桥（笔者摄于 2015 年 12 月）

禅宗在创立之初，为了摆脱寄身于律宗的尴尬境地、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百丈怀海大力倡导“农禅”宗风，禅院逐渐发展起以种植业、养殖业、林牧业为主，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禅院小农经济。禅僧们在禅修之外为了满足自我消费，必须在山区进行经济开发，他们以禅院为单位统一进行经济生产，涉及垦荒造田、开山植木、茶叶种植、牲畜养殖。唐末宋初，正值禅宗走向鼎盛的时期，前来宜春修法人数的增多、禅院在山区经济开发速度的加快不可避免对宜春山区原始生态产生不良影响，封闭的生态环境遭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人虎之间的距离缩小，频频出现“虎遇”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同时，在宜丰县洞山流传着“良价袈裟圈地”的故事。良价来到洞山，向当地士绅募集山地，一位雷老爷问良价要多少土地，良价说：“我的袈裟能够罩住的土地就够了。”雷老爷看其袈裟并没有多大，于是慷慨答应。良价叫人把他袈裟的丝线都抽出来，经纬相接后罩住了五里以内的地方，于是这些土地都归良价所有。但是，事实却是：

^① 雍正十年《江西通志》卷 124，《艺文》。

^② (宋)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503 页。

雷衡，太平乡人。咸通中，悟本禅师良价驻锡洞山，衡以环山腴田施之创寺，为亩三千有奇。九世孙新，字鼎臣，乡里推长者，号曰“慈悲居士”。新子就，字存道，苏文定公常期以远到，后以三釜不及亲，遂无仕意。妻蔡氏孕，一夕，家人梦洞山僧永孚来，已而生子，时夜二鼓。次日访问，正永孚坐化时也，因名曰孚。登进士第，上寿而终。子孝友，官至参知政事。自衡以来十一世，未尝讼人于官，时以为积善之报。^①

雷衡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但是土地并非良价用袈裟圈来的，而是雷衡将三千亩土地主动捐赠给良价创寺的。

袈裟圈地的故事还不止这一处。据传言，沩仰宗慧寂也曾向仰山神袈裟圈地，同样，临济宗希运也向唐僖宗袈裟圈地。^②为什么三大宗派中都非常巧合地出现此类故事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正反映了宜春禅宗与以土地关系为象征符号的地方社会的密切互动。

到了宋代，关于宜春禅宗的灵验故事逐渐多了起来，这尤以普庵禅师为甚。普庵禅师，宜春袁州人，临济宗第十三世子孙，住持慈化寺，具有大神通力，史载：“师入涅后，济人无量。四方水旱疾疫，随叩而应。”^③关于他的灵验故事，有记载曰：

邑之信士二十余人，因旱，三步一拜叩师（普庵）求雨。师曰：“可去大仰山求。”众曰：“免使我等往返，乞赐救济。”师曰：“这里雨小。大仰寺明日斋罢，于僧堂前候众僧出堂，第四员僧袈裟角上有红相者，就礼拜，问他求雨。”众如师言，到彼礼拜。其僧不允，众苦告，僧不得已，乃于寮前砚池内得水少许，与众持回。洒后三日，黑雨倾盆，田池并涨。众乃具香信拜谢师，请问仰山是何圣僧，有此灵感，师曰：“即龙树医王菩萨也。”众辞谢而还。^④

水旱灾害是唐宋时期宜春最主要自然灾害。笔者通过对史籍资料的粗略统计，以唐宋为例，宜春各地区共发生水灾累计总次数为 32 次，旱灾为 13 次，其他自然灾害（包括饥荒、冰雹、蝗虫等）为 9 次。^⑤

^① 道光四年《新昌县志》卷 25，《说林》。

^② “慧寂袈裟圈地”的传说是笔者在仰山栖隐寺采访东南村村长所得；“良价袈裟圈地”“希运袈裟圈地”的故事则是在宜丰县图书馆查据存档资料所得。

^③ 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 67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第 413 页。

^④ 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 67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第 405 页。

^⑤ 其他辅助资料为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南昌：江西省农牧渔业厅印刷厂，1988 年。

频仍的水旱灾害成为农业生产的限制性因素，自然无可抗拒，人为干预又无法突破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向神灵寻求心理上的满足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显然，上述记载的“龙树医王菩萨”即迎合了民众急切求雨的心理，被人为赋予了降雨救旱的神奇法能，是应现实而产生的，又如：

直至理宗嘉熙元年丁酉，大旱，祷雨无应。诏天下祀典未封谥及先有封谥者，重加封谥。由是，江西漕丞履斋吴公潜，以师道行奏闻。上见“普庵”二字，即雷鸣雨降。天颜大悦，遂下其奏。不数日，天下同奏是日得雨。遂封“寂感禅师”，塔曰“定光”。封谥至今不绝云。^①

官方求雨无果后也不得不考虑要重新封祀诸神作为求雨的依托，而值得玩味的是，不买官方求雨账的雨神一见“普庵”名号便立马普降甘霖。这不仅反映了普庵禅师在宜春甚至全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也反映出人们想要消除水旱灾害的迫切心理，或许也可以间接说明水旱灾害在宜春乃至全国都是难以克服的问题。

流传下来的《普祖灵验记》共记载了四十余则灵验故事，其灵验内容无非就是展现普庵凭法力帮助乡民消灾除害的神奇。我们会发现，能消除水旱疾疫似乎成为了一种神灵灵验与否的“公式化”准则，任何一种神祇只要受到人们的广泛祠祀，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如何能降雨消灾的文字记载，例如龙母信仰、许真君信仰、曹江孝女信仰、仰山神信仰等等，随举一例即可见到这种程序化的叠加描述。为什么各地神祇的灵验故事都如此相似呢？笔者认为，因为这些祈愿是传统社会最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而又不容易人为操控的共灾，灵验故事的诉求所反映出来的正是处于当时的地方社会生态环境的真实面貌。

综上，唐宋时期，禅宗“虎遇”问题的频频发生和人们向禅宗消灾祈愿的增多，反映出在这一时期随着宜春人口激增和经济开发的加速，宜春地方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历史变迁。

此外，仔细去考察这些灵验故事发生的时间，其大致集中在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元代至明清时期几乎不存在此类故事的流传。这正说明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到了宋朝，宜春禅宗逐渐与世俗社会融合，在当地越来越有影响力，得到人们强烈的精神寄托和普遍推崇。而这似乎又正好映证了宜春禅宗的发展历程：萌芽于唐，鼎盛于宋，式微于宋后期，衰落于元，沉寂于明清。

^① 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6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13页。

第5章 结语

中国宗教并不同于西方宗教的单纯，中国的各种宗教和信仰都浸润于中国社会权力、社会秩序之中。^①杜赞奇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即通过一种“文化网络”模式控制地方社会，宗教就属于这一“文化网络”，它成为国家权力深入底层社会的渠道之一。^②郑振满提出，我们在研究任何中国社会史问题的时候，都不要忽视这些研究对象背后存在着一个无处不在的“国家”，地域社会的变化往往与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变动联系在一起。^③

禅宗在宜春的发展历程表明，不断与国家权力、地方社会进行密切互动并自我调适，是其得以落地生根的根本原因。其“上”至国家的种种赐封，这种赐封行为的屡屡发生，既是国家权力通过禅宗对地方的张力介入，也是地方经由禅宗向国家权力的引力主动靠齐。同时，其也“下”及与地方官府、土民的利益纠纷，与官府的赋税纠缠、与土民的土地之争就是两例佐证。而禅宗自身建构的诸多灵验故事不但映证了禅宗与宜春地方社会的积极互动，更展现了唐宋时期宜春地区经济开发、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也正是立足于宜春优越的土地资源、地形结构，禅僧发展为拥有大量地产并以收取地租为业的新式地主阶层，以茶叶种植、生产、销售为链条的禅院庄园地主经济与世俗经济的互动加速了禅宗的世俗化进程，也促成了禅宗精神文化内涵的转型。

此外，禅宗与宜春民间信仰的互动也不可忽视。早在“他乡之神”——禅宗传入之前，宜春就已经存在着诸多“本土香火”：许真君信仰、仰山神信仰、城隍神信仰等等。禅宗与道教、仰山神等民间信仰在宜春交融发展，许多道观常常被整合为禅院，沩仰宗更是在传播之初就成功借助仰山神的信仰辐射逐步扩展，而仰山神信仰也因依附禅宗得以延续至今。它所呈现的，不是大传统、小传统为争夺信仰圈而进行的矛盾化解，而是两者和谐、共融、胶着于同一信仰空间。

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三派从唐宋历经千年发展至今，过程十分曲折。从历时性来看，宜春禅宗以两条路线同时向外传播，一是以省外路线在河北、湖北、湖南、福建等地传播，二是以省内路线在九江、庐山、南昌、吉安等地扩散。其传播路径则呈现出“回旋式”的图景，也就是以宜春为中点，虽整个历史时期都在向省外、海外广泛传播，但时时又折回江西甚至宜春这个重心。所以，禅宗遍布中国的局面最终也奠定了栖隐寺、黄檗寺、普利寺为禅宗“三大祖庭”的这个

^① 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③ 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共识。从共时性来看，三大宗派之间联系紧密，三派法嗣不仅混杂而居共传禅法，还托付衣钵越派传嗣。

禅宗在宜春落地生根，蓬勃发展，首先得益于宜春幽僻的地理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经济优势；其次，禅宗传播者在弘法过程中建构了一整套灵验故事，促进了信仰拓展；再次，宜春地方官府、士绅、大家族推动了禅宗在宜春地区的弘法；最后，禅宗巧妙地与宜春当地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民众的信仰心理认同感。正是在这多重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下，禅宗在宜春能够扎根发展，延续千年而佛灯不灭，并扬名海内外。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足以得出的结论是，禅宗在宜春寻求立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正是其与地方社会密切互动在“地化”的磨合过程，理解了这一层面，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禅宗文化与宜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长远关系。

致 谢

时间如跳丸，茫然又老去了三年光阴，明知可还是想问，青春都去哪儿了？从 2010 年进入大学到而今，就这样猛地走过了七年，光阴好像从来没有吝惜过我们的怀恋，因为我们越回头想念，光阴的翅膀扇动地越快，细数下来，毕竟，七年啊。

三年前，我把本科论文的焦点放在了《红楼梦》中佛教寺庙文化的探析上，巧合的是，两年后导师张芳霖教授给我的硕士毕业论题竟是江西宜春禅宗研究。于是，我又紧接着那时的兴趣，开始了与佛教神明的“沟通”。所不同的是，那时是用文学的视角去看待寺庙对小说文本中故事情节和关键人物的链接作用，现在是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去考量佛教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但相同的是，我依然对自己抱着难以预料的期待，只望不负导师的嘱咐和自己的付出。可是，想要完全契合于二者，又谈何容易。

首先，文本资料上的不足是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题，为此，我曾四次跑去宜春档案馆、图书馆、寺院、村庄查找文本史料，虽收获不大，却采集到一些口述传说，也亲临见闻了一些在字间所缺失的东西，有的直接促成了本论文某些篇章的框架雏形。

2016 年 5 月 15 日，我作为国家汉办第十五届汉语教师志愿者，被派往泰国曼谷 Minprasatwitaya School 任教十个月。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境外生活中，我每天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要在闲暇时间整理从国内下载过来的资料，得空就动笔写写论文，所幸在出国前，我就已经完成一部分，剩下的就靠每日的字字积累，那真是一个痛苦却能够得到精神满足的过程。可工作后才发现，环境变了心境也变了，看书成为了需要逼着自己下狠心、靠制定任务书来完成的事情，写论文也全没有了大畅淋漓、一鼓作气的快感，有关学习的事情都变成了挤牙膏的磨蹭。

所幸，论文最终还是完成了，可是有没有达到导师的要求呢，我想还差得远。在这三年学习中，对学术较少关注、没有给予浓郁的热忱是最大的可悲和遗憾。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张芳霖教授，她对我这样一个无学术慧根的笨学生从未放弃。若说我对学术研究尚有一些兴趣，这全得益于张老师的牵引。张老师时刻叮嘱我们要关注学术前沿，要多看多想培养问题意识。我曾经因为资料的匮乏而有了放弃的打算，但是张老师一直嘱咐我要把它做好，还好我并没有半途而废。在泰国工作的日子，张老师也正在香港访学，对于我的邮件“轰炸”，张老师总是及时回复给我理清思路。而两年前之所以意投张老师门下，就是缘于对张老师学识的景仰和对她所研究领域的浓厚兴趣。此时，我想我真是忝列师门！

南大三年学习中，廖艳彬教授既是同门大师兄，也是我学业上的第二位领路人。研一下学期开始我就曾无数次“厚颜无耻”地找廖老师帮我修改论文，到后来，每三周必找廖老师一次成为了我的例行之事，他虽则工作忙碌无暇，但对我们的麻烦总是来则不拒，一一给予详复。感谢廖老师，他宽善待人的态度和刻苦学术的精神也将影响我的一生。还有，历史系罗桂林教授，也常常是被我麻烦的对象之一，罗老师和善健谈、学术功底深，论文前期的写作过程中曾请教过他不少，感谢罗老师对我的教导。同样，感谢历史系其他给我引路的老师们：袁礼华

教授、黄志繁教授、宋三平教授、吴小卫教授、杨捷教授、邹锦良教授、余永和教授，谢谢他们！

另外，还要感谢南昌大学哲学系习细平教授，是他帮我联系宜春栖隐寺大正法师给我的田野考察以诸多方便；感谢日本爱媛大学邢东风教授，他曾来南昌大学做过禅宗讲座，我趁机通过邮件请教过他，他对我的论文构思和资料补充给予了建设性意见。

在曼谷工作的日子，为了补充论文资料也时时麻烦我的同学陈娜、王凯、杨金鹏、黄喆安琪，也是他们，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给我关心和鼓励，我也得以熬过那段文化休克的挫折期，谢谢他们的温存和不倦的帮助。在南大两年多的学习中，我还遇到了一群学习与生活俱乐的朋友，他们是室友姜涛、同门：陈晨、夏敏慧、汤晓良、范静、段蓝宇、田野，国内突发的琐事也麻烦他们不少，谢谢他们的帮助。以及所有历史系的同学们，不管以后是否能相见，都说一声再见吧。

写到此处，我欣戚杂陈，懵然不知所言。走到而今这一步，却是三年前的我所万万预料不到的，能进南昌大学历史系领学受教，我已是知足不已，期间更有幸通过国家汉办考试派往泰国担任汉语教师，所想都在努力之下实现了，我也该为自己的所做说一声谢谢，谢谢曾不放弃的执拗，和心中尚存不死给理想所留的一股蛮气。

可想想，谢来谢去，最该沉谢的是我缄默不语的母亲，为着我和妹妹的学业，整日做着卑辛沉重的劳事，不叹一声生活之苦，只是埋头把她所有的好都给了我们兄妹。还有，给天国的父亲也说一声谢谢，我所做的种种，大半也是为着他的遗愿，倘若天地之间真有通灵，他看到今日的我也该会有满意的微笑，不再愁眉我的毫无出息了吧。只是，生我为我者，而今事事都与他无关了。

说了这么多也拖延不了时间的脚步，我也等着回国的日子，与我的大学生涯说一声再见。

搁笔，窗外已是月光微微，总算消去了暑天的酷热。故园前湖该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睡吧，相思安稳今夜梦，明日好渡江湖。

袁坤
2017年3月
泰国曼谷新民学校

参考文献

一、正史、地方志、族谱

- [1]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 [2] (元) 脱脱等. 宋史[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年。
- [3] (清) 张廷玉等. 明史[Z]. 钦定四库全书本。
- [4] (清) 陈廷枚, 杨应珪. 袁州府志[Z]. 嘉庆八年刊本。
- [5] (清) 施闰章. 袁州府志[Z]. 康熙九年刊本。
- [6] (清) 谢旻. 江西通志[Z]. 雍正十年刊本。
- [7] (清) 刘坤一. 江西通志[Z]. 光绪七年刊本。
- [8] (清) 江为龙. 宜春县志[Z]. 康熙四十七年刊本。
- [9] (清) 路青云. 宜春县志[Z]. 同治十年刊本。
- [10] (清) 程国观. 宜春县志[Z]. 道光三年刊本。
- [11] (清) 朱庆萼. 新昌县志[Z]. 同治十一年刊本。
- [12] (清) 曾锡龄, 谭梦骞. 新昌县志[Z]. 道光四年刊本。
- [13] (清) 吕懋先. 奉新县志[Z]. 同治十一年刊本。
- [14] (清) 潘懿, 胡湛. 清江县志[Z]. 同治九年刊本。
- [15] (清) 秦镛. 清江县志[Z]. 顺治二年刊本。
- [17] (清) 徐家瀛. 靖安县志[Z]. 同治九年刊本。
- [18] (清) 金第, 杜绍斌. 万载县志[Z]. 同治十一年刊本。
- [19] (清) 龙赓言. 万载县志[Z]. 民国二十九年刊本。
- [20] (清) 刘启泰. 上高县志[Z]. 康熙十二年刊本。
- [21] (清) 冯兰森修; 陈卿云纂. 重修上高县志[Z]. 同治九年刊本。
- [22] (清) 王家杰. 丰城县志[Z]. 同治十二年刊本。
- [23] (清) 承霈. 新建县志[Z]. 同治十年刊本。
- [24] (清) 锡荣, 王明璠. 萍乡县志[Z]. 同治十一年刊本。
- [25] (清) 王维新. 义宁州志[Z]. 同治十二年刊本。
- [26] (清) 张鹏注等修; 熊松之等纂. 高安县志[Z]. 清同治十年刊本影印.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9 年。
- [27] (民国) 胡思敬. 盐城县志[Z]. 民国六年刊本。
- [28] 王德全主编, 宜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西省宜春市志[Z].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1990 年。
- [29] 姚行先主编, 江西省宜丰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宜丰县志[Z]. 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89 年。
- [30] 刘国庆主编. 黄岗镇志[Z]. 宜春: 宜春市同茂印务有限公司, 2014 年。
- [31] 释本焕、释顿雄主修. 百丈山志[Z]. 奉新: 江西大雄山百丈禅寺, 2010 年。
- [32] 宜丰县档案馆藏. 谌氏家谱[Z]. 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 [33] 宜丰县花桥乡池源村. 汪氏族谱[Z]. 民国刊本。

二、文集笔记

- [1] (唐) 韩愈. 韩昌黎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 [2] (唐) 封演. 封氏闻见记[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
- [3] (宋) 苏辙著, 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栾城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 [4] (宋) 范成大. 骥齋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 (宋) 范成大. 石湖诗集[M]. 四部丛刊景清爱汝堂本。
- [6] (宋) 楼钥. 玫瑰集[M]. 欽定四库全书本。
- [7] (宋) 王炎. 五显灵应集序[M]. 欽定四库全书本。
- [8] (宋) 周必大. 文忠集[M]. 欽定四库全书本。
- [9] (宋) 朱彧. 萍州可谈[M]. 欽定四库全书本。
- [10] (宋) 张栻. 张栻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年。
- [11] (宋) 无名氏. 宝刻类编[M]. 欽定四库全书本。
- [12] (元) 吴师道. 敬乡录[M]. 欽定四库全书本。
- [13] (元) 释大士. 蒲室集[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 [14] (元) 程钜夫. 雪楼集[M]. 欽定四库全书本。
- [15] (明) 张岱著, 云告校点. 琅嬛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年。
- [16] (清) 袁锡光辑. 袁州汉后七代集略[M]. 道光元年寻根书屋本。
- [17] (清) 王夫之. 永历实录[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2 年。
- [18] (清) 施闰章著, 何庆善、杨应芹校点. 施愚山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2 年。
- [19] (清) 董浩等编. 全唐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 [20] (民国) 胡思敬辑. 袁州二唐人集[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
- [21] (日) 圆仁著, 顾承甫、何泉达校点.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三、其他古籍资料

- [1] (唐) 净觉. 楞伽师资记[M].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石峻、楼宇烈等编)第2卷第4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
- [2] (南唐) 静、筠禅僧编, 张华点校. 祖堂集[M].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 [3] (宋) 乐史撰, 王文楚等校点.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年。
- [4] (宋) 释道元. 景德传灯录[M]. 成都: 成都古籍书店, 2000 年。
- [5] (宋) 普济撰, 苏渊雷校点. 五灯会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年。
- [6] (宋) 赞宁撰, 范祥雍校点. 宋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 [7] (宋) 宋敏求编, 洪丕谟等校点. 唐大诏令集[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2 年。
- [8] (元) 德辉编, 李继武校点. 敕修百丈清规[M].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 [9] (明) 葛寅亮. 金陵梵刹志[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1 年。
- [10] (明)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 商务印书出版社, 1937 年。
- [11] (清) 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M]. 清雍正铜活字本。
- [12] (明) 佚名. 群书集成事渊海[M]. 明弘治十八年贾性刻本。
- [13] 说类[M]. 明刻本。
- [14] (清) 聂先编撰, 心善整理. 续指月录[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5 年。

[15] (明) 无愠: 山庵杂录. 佛光大藏经[M]. 台湾: 佛光出版社, 1994 年。

四、今人专著

- [1] (德) 马克斯·韦伯著, 康乐等译. 中国的宗教[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 [2] (美) 韩书瑞著, 朱修春译. 北京: 寺庙与城市生活[M]. 台北: 稻乡出版社, 2014 年。
- [3] (美) 韦斯蒂. 中国大众宗教[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 [4] (美) 欧大年著, 刘心勇等译. 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 [5] (美) 韩森著, 包伟民译. 变迁之神: 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6] (美) 杜赞奇著, 王福明译. 文化、权利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7] (美) 韩明士. 道与庶道: 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 [8] (法) 谢和耐著, 耿升译. 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 [9] (加) 卜正民著, 张华译.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 [10] (荷兰) 许里和. 佛教征服中国[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11] (英) 王斯福. 帝国的隐喻[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 [12] (日) 铃木大拙. 禅与生活[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
- [13] (日) 池田大作. 社会与宗教[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14] 郑振满、陈春声主编.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15] 郑振满.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 [16]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年。
- [17] 赵世瑜. 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
- [18]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 [19] 葛兆光. 禅宗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 [20] 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 [21]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历史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22] 庄孔韶. 银翅: 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
- [23] 任继愈. 中国佛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 [24] 杜继文、魏道儒. 中国禅宗通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 [25] 魏道儒. 宋代禅宗文化[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 [26] 谭伟伦主编. 民间佛教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年。
- [27] 黎明中主编. 江西禅宗文化[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 [28] 段晓华、刘松来. 红土·禅床: 江西禅宗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 [29] 邢东风. 禅悟之道: 南宗禅学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 [30] 黄敏枝. 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M]. 台北: 台湾天一出版社, 1970 年。
- [31] 陈金凤. 宜丰禅史[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 年。
- [32] 皮庆生.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 [33] 陈正祥. 中国地理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
- [34] 李向平. 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 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 [35] 贾二强. 唐宋民间信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 [36] 顾伟康. 禅宗: 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0 年。
- [37] 胡少仁. 洞山禅林[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 [38] 韩溥. 江西佛教史[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 年。
- [39] 宜春禅宗志编纂委员会. 宜春禅宗志[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年。
- [40] 吴立民主编. 禅宗宗派源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 [41] 蓝吉富编. 禅宗全书[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
- [42] 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 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M]. 南昌: 江西省农牧渔业厅印刷厂, 1988 年。
- [43] 江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江西省宗教志[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 [44] 施由明. 明清江西社会经济[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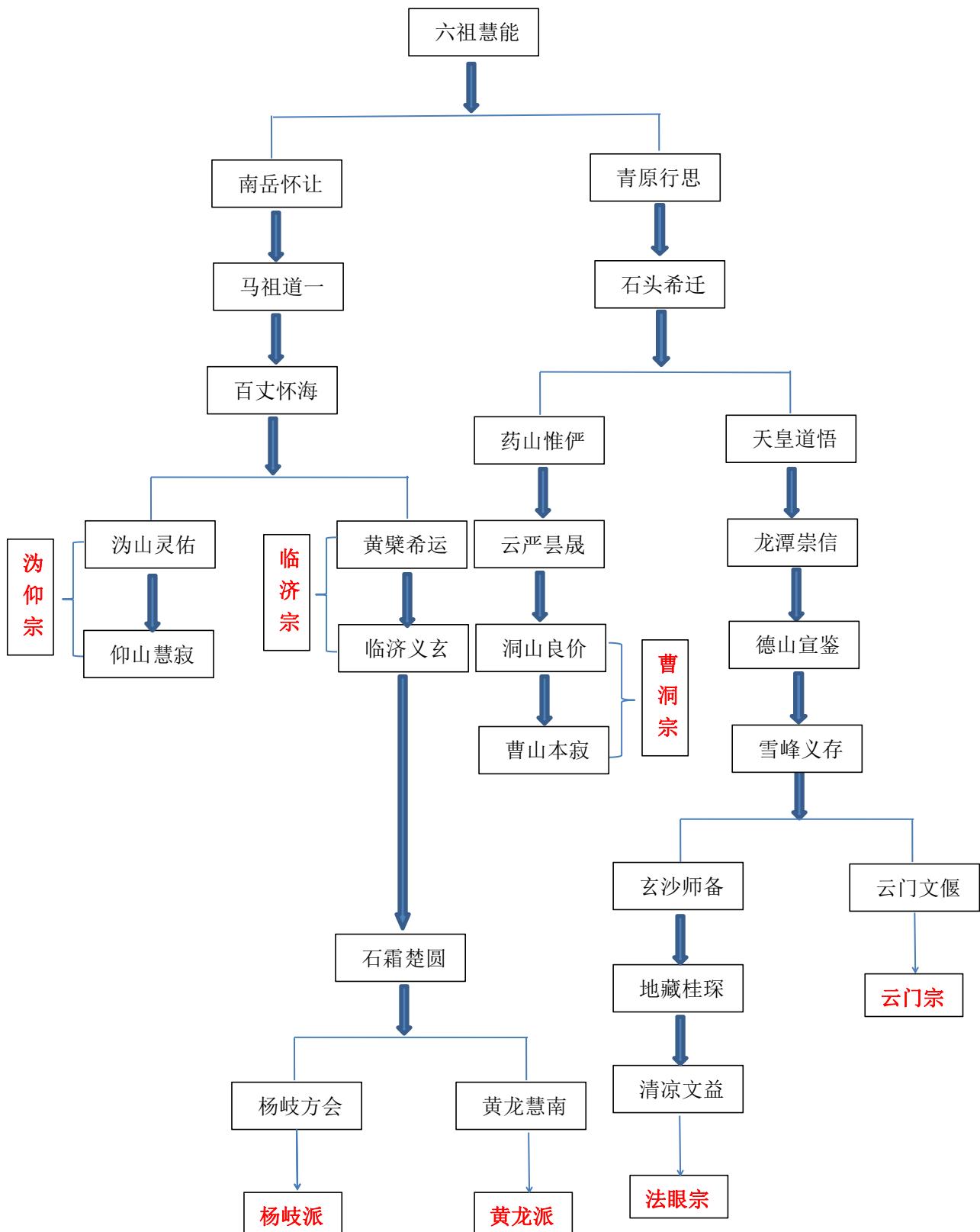
五、学术论文

- [1] 赵世瑜. 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6 期。
- [2] 陈春声. 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J]. 史学月刊, 2001 年。
- [3] 陈春声. 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J]. 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 1994 年。
- [4] 陈春声. 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J]. 清史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 [5] 刘志伟. 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 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J]. 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 1994 年。
- [6] 刘志伟. 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J]. 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 1994 年。
- [7] 许怀林. 十世纪前佛教在江西的传播[J]. 江西师院学报, 1983 年第 4 期。
- [8] 黄志繁. “山兽之君”、虎患与道德教化——侧重于明清南方地区[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06 年。
- [9] 廖艳彬, 肖育琼. 明清赣江中游地区的水旱灾害、社会矛盾及民众信仰探析[J]. 地方文化研究, 2013 第 1 期。
- [10] 超茶英. 曹洞宗——一笔丰厚的赣文化遗产[J]. 南昌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2 期。
- [11] 巩丽君. 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J]. 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年。
- [12] 张映雪. 明代吉安府佛教与士绅[J]. 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年。
- [13] 施梅芳. 唐代江西寺院经济探析[J].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年。
- [14] 黄熙蓉. 清代江西书院与禅宗寺院教学比较研究——基于学规与清规的视野[J]. 江西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年。

- [16] 黄利娜唐. 末五代江西经济开发[J]. 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年。
- [17] 刘忠. 江西佛教寺庙经济状况的剖析(1949.10—今)[J].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年。
- [18] 林宏. 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J].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年。
- [19] 李立民, 习罡华. 江西与农禅的关系[J]. 农业考古, 2009 年第 6 期。
- [20] 龚国光. 佛教禅宗在江西的繁衍及民族文化特征[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6 期。
- [21] 林枫. 明代南昌、袁州、瑞州三府的官田重赋问题[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 年第 2 期。
- [22] 范金民. 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J]. 中国农史, 1995 年第 3 期。
- [23] 郑克晟. 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J]. 南开学报, 2001 年第 6 期。
- [24] 廖云德. 明清时期江西重赋问题与地方社会: 以南昌、袁州、瑞州三府为中心[J].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年。
- [25] 陈必昌. 唐宋寺院田产来源的变化与影响[J]. 民俗研究, 2008 年第 3 期。
- [26] 张弓. 唐代禅林经济简论[J]. 学术月刊, 1987 年第 9 期。
- [27] 周奇. 唐代国家对寺院经济的控制——以寺院土地为例[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5 年第 1 期。
- [28] 王建光. 禅宗农业的形成与发展[J]. 中国农史, 2005 年第 4 期。
- [29] 刘小平. 《百丈清规》与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变迁[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 年第 2 期。
- [30] 吴雯, 陈荣庆. 宜春禅宗[J]. 华夏文化, 2006 年第 3 期。
- [31] 刘泽亮. 黄檗禅学与裴休、李忱[J]. 湖北京大学学报, 1997 年第 4 期。
- [32] 刘泽亮. 士大夫与禅宗[J]. 佛学研究, 1998 年第 6 期。
- [33] 王启祥. 宜春梯田[J]. 中国水土保持, 1986 年第 7 期。

附录一 禅宗五家七宗表



附录二 宜春各地区寺庵表

(注：“其他”一栏只收录禅院与国家、地方互动的相关资料)

表1：袁州区寺庵表（录自同治十年《宜春县志》）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报恩寺	城东门内	唐天授	不详	唐天授初，名“重兴”；宋乾明后，叠改“崇宁万寿”；政和间，额“天宁”，又改“神霄宫”；绍圣间，赐今额。
2	楞伽寺	武庙后	不详	不详	本邑陈氏施田六十余亩。
3	水月寺	不详	不详	不详	(嘉庆)十九年，以田契六纸呈县存案，徐乐山批示勒石。
4	泗洲寺	东门外	唐高宗时	不详	
5	珠泉寺	城南	明万历庚申	知府黄鸣乔	国朝康熙间，知府胡希圣重修，创建我亭。置有田十六亩三分，永供香火，咸丰六年逆毁。
6	国泰寺	城西门外官圳 弦后	不详	不详	唐黄颇曾读书其中。
7	湖冈古寺	城南湖冈台	宋	契嵩禅师	仁宗朝赐紫额其寺，曰“明教”，岁久圮坏。横塘袁忠毅家捐资改建禅林及藏经阁、兰若寺，置香火田十五亩并铜瓶等物。康熙间，知府顾岱施饭僧田五十亩。道光二年，知县程国光饬差明田产入志，僧俗永不得卖。
8	邓峰寺	城南二十五里 邓尖峰			昔邓表修炼道场。明，袁忠毅公捐买前后山场、田土，上建白云庵，下建狮子庵。施僧供奉香火，永禁盗卖。
9	瑞庆寺	城南六十五里	唐贞观	不详	
10	太平兴国寺	城南集云峰大 仰山下	唐会昌	慧寂	慧寂禅师修真处，唐会昌赐名“栖隐”。宋改今额。唐宋赐经御书碑碣甚多，俱毁，仅存元程鉅夫撰碑记。
11	慈化寺	城北石里乡南 泉山	不详	不详	

12	天台寺	城西荐里乡大 岭	不详	不详	乾隆八年，重修，五递 公置香火田，麻子湾二百七 十五把，天井江二百二十五 把。
13	锡嘏寺	善和乡横塘蒲 塘坑	清康熙初	袁克英等	康熙初，袁克英等建， 并前后左右山场田土。今属 起涛芳泰等业。雍正己酉， 振铎、起涛等重修。乾隆壬 午，方杏等复修。嘉庆庚午， 锡光等修前栋。
14	狮山寺	荐里乡中溪狮 子山	宋	不详	
15	吉林寺	城西四十里	清康熙初	知府于嗣 昌，邑绅梁 佳植、张潜	乾隆、嘉庆、道光间， 李一元暨子应斗、孙溶、曾 孙佩璠俱讲学于此。其西读 书堂及西村义勇祠并田产， 一元与门人梁珍倡置。
16	显灵山 寺	城南集云乡	不详	不详	属九加南二图九甲张姓 业。置有香火田。
17	兴化寺	城南木平山	不详	不详	
18	接善寺	城南七十里五 家背	不详	程懋修	有田土山场供香火。
19	庆福寺	城南五十里凤 冈太平庵下	清乾隆甲辰	僧林岩等	
20	金华山 寺	城南四十五里	不详	不详	嘉庆二十五年，樟树下 何姓倡修。
21	保赤寺	城南学院考棚 后	不详	知府于嗣昌	乾隆甲戌，知府杨、协 镇陈捐买松树下田四亩。咸 丰六年毁。
22	化成岩 寺	城北化成岩	不详	不详	即李卫公读书处。知府 李春芳题额“赞化裁成”。 乾隆二十六年，同知杨应瑶 重建清音阁，祀李卫公。嘉 庆庚辰，寺僧募建关帝殿， 东增敬业堂，西增面壁轩， 额园曰“介园”。道光元年， 知府隆泰于山门外建报安 亭。旧有香火田，因碑残产 荡，仅存石山下田六亩。嘉 庆间，僧慈惠、善安赎回十 一亩。
23	芙蓉山 寺	城东五十里	明	僧古默	
24	古竹山	城东五十里	不详	不详	

寺					
25	长龙寺	城东五十五里 大岭	清康熙	僧慈度	
26	西林寺	城南下集云峰 东庄	不详	僧旭慈	
27	集云寺	城南集云峰	明万历庚申	僧云谷与其 孙旭慈	
28	宝珠寺	城南集云峰大 仰山左	清康熙乙酉	僧青云	
29	祥隆寺	城南集云峰下	清雍正乙卯	僧访山	
30	太平山 寺	城西南八十里 集云乡	明崇祯	僧定空	
31	广利寺	南源	唐	道明禅师	明季，被民倾占。
32	护国寺	城西九十里荐 里乡	不详	不详	片三图五递公置香火田 三百把。
33	万福寺	城西荐外乡福 上图巨田	不详	李姓	置有香火田三百把。
34	斌兴殿	荐外乡十九福 图良田	明	僧某	辛卯，胡桂芳等倡图复 建正殿及两厢房。图有香火 田土。
35	石牛寺	荐外乡柘桑下 再兴一图	明	不详	道光间，李英斗等复修， 加建六息轩于寺后，东翼以 有口数楹。
36	神山寺	城东三十里	不详	不详	
37	金沙寺	荐外乡大沙塘	不详	不详	
38	绍金山 寺	荐外乡西村	不详	不详	道光初，欧阳文明等重 建。
39	石云寺	城北	不详	不详	易在元、何体仁、易焕 丰等捐资重建。
40	月光寺	石外乡徐潭村	不详	黄姓	乾隆间，黄与寺僧募修， 得捐买田若干，永供香火， 不得变卖。
41	崇胜寺	袁山门外	唐	不详	宋太平兴国中，敕赐“林 乐堂”，黄庭坚书“方丈”。 明嘉靖间，知府张任改建化 成岩之东。
42	大仰寺	城南五十五里 仰山东庄	不详	不详	
43	长峰寺	化南乡泉塘	明崇祯	不详	易姓捐置田产四十亩。
44	莲花寺	善和乡长乐	不详	不详	
45	莲花寺	石外乡利田	不详	不详	
46	无垢寺	善和乡社江背	不详	不详	李姓业。
47	聚龙寺	城南朱楼充	清康熙壬午	僧旭鉴	
48	能仁寺	荐外乡竹亭	清嘉庆	何姓	

49	金竺寺	化南乡大塘下	清康熙元年	陈、钟二姓
50	宝神山 寺	城北七十五里 八角亭	不详	不详
51	永兴寺	荐外乡南塘	不详	不详
52	筠溪寺	荐外乡福上图 竹亭	不详	不详
53	石门山 寺	集云乡润富岭	不详	不详
54	华藏寺	化南乡塘源充	不详	不详
55	天花寺	城东下浦市	不详	不详
56	景福寺	化南乡	不详	不详
57	天鹅山 寺	城东五十里	不详	不详
58	竺云寺	城西南三十里	不详	不详
59	栖云寺	城南绛桥屋背	不详	不详
60	翠筠寺	古庙大龙山	不详	不详
61	竺影寺	城南六十里	不详	不详
62	菩提寺	城南六十里下 务德江	不详	不详
63	兴隆寺	城南六十里	不详	不详
64	寿昌寺	信义乡渥江	不详	不详
65	大觉寺	善和乡梅村台 上	不详	不详
66	天龙寺	石里乡天龙岩	不详	不详
67	祥云寺	城南六十里	不详	不详
68	盘龙寺	城北东七十里	不详	不详
69	万年寺	石外乡利田	不详	不详
70	永镇寺	修仁乡仙源	不详	不详
71	湖塘寺	善和乡归德一 图	不详	不详
72	正觉寺	城北五十里黄 鳅图	不详	不详
73	碧云寺	荐里乡汉坑	不详	不详
74	隐龙寺	集云乡古庙	不详	不详
75	积善庵	集云乡	不详	不详
76	月明寺	信义乡大山背	不详	不详
77	元福寺	泉水岭润福	不详	夏天锡
78	瑞龙山 寺	城东五十里	不详	不详
79	西林庵	城内西北隅	不详	知府解经达 今将南门内宜阳书院移 改作三官殿。
80	瑶金殿	宜春台左三义 祠下	不详	唐彭祖师示寂处。咸丰 六年发逆毁。同治元年合邑 僧众复建。

81	观音庵	西门外古大庙后	不详	不详	邑人刘培彰、徐观咸、钟毓川、刘祥攀俱捐有田亩。今毁。
82	碧云庵	石外乡泽陂头	不详	不详	易姓业，置田五百把。
83	碧云庵	善和乡横塘	不详	不详	袁银九兄弟业。
84	太平庵	集云乡	明万历	僧某	
85	长芦庵	城南三十五里	不详	不详	康熙间知府于嗣昌额题“无为而成”，知县王光烈额题“宏开不二”。
86	慈云庵	集云乡新坊	不详	不详	
87	南源庵	城西石外乡塘下	不详	阳、刘二姓	各捐有田土，阳姓与庵近，一切凭据故交刘姓族长轮收。
88	三教庵	西门外滩下	不详	易禹十	
89	福龙庵	城西荐里乡小龙源	不详	不详	
90	仁寿庵	彬江龙头山	不详	不详	
91	万福庵	西门外滩下社稷坛北	不详	不详	
92	香山庵	城西八十里	不详	不详	
93	法华庵	荐外乡沙田	不详	不详	
94	文殊庵	东柄山	不详	不详	属府学管。
95	兴祖庵	荐里乡高岭	不详	不详	刘姓业。
96	道圆庵	荐外乡弯坑	不详	不详	福中图业。
97	圆通庵	信义乡	不详	不详	
98	圆通庵	石里乡	不详	不详	
99	听讼庵	城北八角亭	不详	不详	
100	东华庵	荐里乡段家坊	不详	不详	片六图业。
101	万福庵	石外乡三角山	不详	枫林彭姓	
102	回龙庵	荐外乡黄沙	不详	甘姓	
103	兴隆庵	集云乡涧富	不详	邹汝富	
104	静觉庵	化北乡槎溪北坛	不详	不详	
105	保丰庵	城东诏仁乡上窑	不详	不详	
106	普福庵	城西荐里乡洗面塘	不详	不详	
107	营里古庵	修仁乡	不详	刘光元	
108	石庵	城西南三十里	不详	僧正脉	
109	白云庵	城西南台山内	不详	不详	
110	海会庵	石外乡	明	不详	
111	三元庵	善和乡韩塘	不详	不详	
112	石古庵	善和乡横塘	不详	不详	袁振煦业。

113	地藏庵	西门内	不详	不详	
114	福慧庵	修仁乡中凌下	不详	不详	
115	会龙庵	化南乡	不详	不详	
116	清泉庵	修仁乡中凌	不详	不详	
117	华严庵	石里乡	不详	不详	
118	齐云庵	修仁乡牛凌	不详	不详	
119	圆觉庵	石里乡	不详	不详	
120	新月庵	石里乡	不详	不详	
121	大塘庵	信义乡上石	不详	不详	
122	柞木塘庵	善和乡韩塘	不详	不详	
123	万古庵	荐外乡	不详	不详	
124	瑞龙庵	集云乡大岭	不详	不详	
125	东林庵	石外乡	不详	不详	
126	柏子庵	东门外	不详	不详	
127	回云庵	荐外乡山塘	不详	不详	
128	月山庵	荐外乡柘桑	不详	刘姓	
129	普觉庵	荐外乡西村河北	不详	不详	
130	西竺庵	信义乡虎狼桥	不详	不详	
131	碧云庵	石外乡塘下	不详	不详	易学佩捐田三十把。
132	普济院	宜春台左	不详	不详	宋绍兴初为孚惠二王行祠。淳熙间，改建台西，祀慧寂禅师。庆元己未毁，州守李訢重建，置有田十六亩五分。
133	明惠院	城西	清	邑绅张潜	康熙四十五年，知府葛继孔给示，永禁采煤。
134	集福院	城西修仁乡潭下	不详	不详	
135	定光院	修仁乡温汤	不详	不详	
136	龙安院	修仁乡贾溪			
137	净居院	荐里乡片二图江东			
138	永安院	城北善和乡荆桥	唐		
139	净因院	城北五十里化北乡			
140	精进院	善和乡洄江上			今圮，改为观。
141	定安院	善和乡	唐	不详	万历辛卯毁于火；四十六年，横塘袁业泗、继咸等重建，置香火田三十五亩并山地塘土。乾隆丁未，袁姓复修。

表2：丰城市寺庵表（录自同治十二年《丰城县志》）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寿昌寺	治东	唐	马祖道一	邑人潘清隐施，僧闻修募修。
2	正法寺	治东	晋	南塔涌禅师	邑人傅士华施地，知县何士锦同邑绅创师表堂。
3	白云庵	东门内城隅	不详	不详	明罗洪先寓此，今废。
4	西禅寺	城西	唐	不详	
5	南禅寺	登仙门外	不详	不详	
6	竹林庵	登仙门外杨柳湖侧	不详	不详	
7	华严堂	大东门外沙白亭	不详	不详	
8	连珠寺	小北门外	不详	邑人杨、范、蒋三姓公建	后移建城隍庙内左侧。
9	广慧庵	折桂门外	不详	不详	
10	青云庵	登仙门外	不详	不详	
11	能仁寺	斗门外	不详	不详	
12	白衣庵	斗门外	不详	不详	
13	龙沂庵	登仙乡	不详	不详	上有斗姥阁。
14	梵慧寺	北湖	唐	马祖道一	
15	苏山寺	剑池乡十五都	不详	不详	
16	资善寺	二坊曾家山	唐	马祖道一	
17	青果寺	长安乡蒋家楼	不详	不详	
18	大明寺	大坑蒋家楼	不详	不详	
19	瀑水寺	二坊大街	不详	甘姓	
20	寿圣院	长宁乡	宋祥符间	不详	
21	圣乘院	龙门山西	不详	不详	
22	定慧寺	下蓝溪	不详	不详	祀晋时本乡女仙。
23	连珠寺	长宁乡四十都	宋	东湖邹伯宗	
24	元贞寺	流溪	不详	不详	
25	北屏庵	广丰乡五十六都	不详	杨姓	
26	白云寺	广丰乡	不详	不详	
27	楮山寺	广丰乡	不详	不详	
28	石滩寺	石滩桥侧	不详	不详	
29	七宝寺	龙门	不详	不详	
30	靖氛寺	故县	不详	熊明璞	
31	圆觉寺	正信乡	不详	不详	
32	云中寺	不详	不详	不详	
33	龙泽智	楮山度院	宋	僧广照	
34	林泉寺	归德乡	不详	不详	
35	镇龙庵	落鹭口	不详	李大岐	

36	永福寺	长乐乡	不详	不详	
37	金华院	金华山巅	不详	不详	
38	大陂庆	六十四都一图	不详	不详	明英康齐先生曾讲学其中。
39	普惠寺	茅园嘴	不详	不详	
40	西来山	治西大安渡口	明正德	李概	原为李概之父李裕享堂。
41	宣妙寺	株林桥头	不详	不详	
42	方广寺	赤岗	不详	不详	
43	无为寺	兴仁乡塘坊	唐	不详	
44	华严寺	兴仁乡	唐	马祖道一	
45	清潭寺	兴仁乡清潭岭	不详	僧枯木募下	
46	莲花寺	一在槎煖，一在西乡莲花桥	不详	不详	
47	香杜寺	宣风乡	宋	僧叨霞	
48	正悟寺	宣风乡	不详	不详	
49	法忍寺	曲江	不详	不详	
50	海慧寺	感山	宋	僧云卧	
51	水草园	宣风乡枣犁冈	不详	唐金星	雍正间，知县高岑与僧牍如结松莲诗社于此。
52	香社院	宣风乡	宋	不详	
53	海觉院	龙雾洲	不详	不详	东有睢阳庙，西为文昌阁。
54	慧灯寺	宣风乡	唐	马祖道一	
55	凝福寺	七坊奇峰山	不详	不详	
56	回龙寺	八坊南溪里	不详	不详	
57	正觉寺	枫树下	不详	不详	
58	益龙庵	兴仁乡吴山里	不详	不详	
59	洛伽古刹	洛伽山	不详	不详	
60	定明寺	长丰乡	唐	马祖道一	
61	金凤寺	九坊归德乡坪塘围	不详	公建	
62	普照院	长丰乡	不详	不详	
63	正宗寺	归德乡	宋	僧空庵	
64	净住寺	归德乡	唐	马祖道一	明进士吴道南曾读书其中。
65	近鹤寺	归德乡	不详	不详	
66	莲池寺	归德乡飞凤山	不详	不详	
67	三圣寺	小华山巅	不详	不详	

表3：上高县寺庵表（录自同治九年《上高县志》）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九峰崇福禅寺	县西五十里末山麓	唐	钟传	唐钟传故宅，舍宅为寺。唐昭宗赐额“宏济”。宋运副将蒋之奇、袁守阮阅、明邹文庄公守益讲学于此。
2	蒙山圣济禅寺	县南三十里善塘村	唐	道明禅师	宋治平元年赐额。嘉庆十五年，知县刘丙祷雨蒙山，见院宇颓败，命僧募修，且设位以祀蒙山之神。
3	普济寺	县北十里沙溪武泉山	不详	日东禅师	原为东晋皇甫将军宅。唐初赐“武泉院”额。会昌中废。光启三年，南平王钟传以钱二百万委僧令严创建，未几又火。唐保太中，僧义羲再建。
4	净居寺	县西四十五里之白土	隋开皇九年	不详	唐小释迦法嗣绍兴道场。
5	多宝寺	城东北四十里县界中	不详	不详	
6	田南寺	县东五里之潭步	不详	不详	
7	宝严寺	县北五里之黄山	不详	不详	
8	禅慧寺	城南六十里	不详	不详	
9	定林寺	县北二十里之清源	不详	不详	
10	多宝寺	县西东岳行宫旁	唐大顺	僧铁牛	元延祐庚申迁县治后，地售况氏。至正甲午，寺遭兵毁。
11	崇宁寺	河南案东关	唐大顺	青衣道者	元毁于兵。康熙时，道人李伯通掌其籍。咸丰间毁于窜匪。
12	慈光寺	县西三十里茶源村	唐大顺	僧中山	
13	广利寺	县西六十里之石虬渡	唐大顺	僧中峰	元毁于兵。明洪武甲寅，僧中立重建。潘太史述祖曾读书于此。
14	香山寺	县西八十里浮楼岭东麓永平团	唐大顺	僧大机	
15	圆光寺	县东二十里修仁团	唐大顺	僧镜明	宋赐额。
16	金地寺	县南四十里之唐良团	唐大顺	僧姑林	宋治平元年赐额。元时兵毁。明洪武间，僧本性募建堂宇五间。

17	广法寺	县南二十里 之上港村	唐大顺	僧本源	宋治平元年赐额。元至正壬辰兵毁。明洪武甲寅，僧无相重修。
18	苍冈法忍寺	县西南二十 五里蟠村	唐	小释迦法嗣 派下僧宗明	宋淳化三年重建。寺左圣井，许旌阳插剑成井处；右五显庙。
19	清涟寺	县西二十里 河西南源	明天启二年	沙门妙静募 建	明季为窝寇所毁。顺治辛卯，本里欧阳氏重修。
20	回澜寺	河西湾溪	不详	不详	
21	文觉寺	县东南五里	不详	不详	寺东为诞登书院，又东为大观塔。
22	云衣寺	深村严塘	不详	胡浚捐资建	
23	青莲寺	崇本团洋田 金家洲	不详	不详	
24	翠谷寺	唐良楼下	不详	不详	
25	金铃寺	举子团云台 山	不详	不详	祀仙姑，遇旱祷有应。
26	云谷寺	县东三十里 辛义中团	清康熙三十 七年	僧三沐购饶 姓地创建	
27	上定林寺	县西南七十 里之末山	不详	不详	
28	鹫岭寺	县西四十里 之龙冈	不详	不详	
29	福源院	县北十五里 之曲礼	不详	不详	宋治平元年赐额。
30	禅寂院	县南三十里 之黄塘	不详	不详	宋治平元年赐今额。
31	宝云院	县南三十里 之麦折宝云 山	不详	不详	宋治平元年赐额；嘉熙庚子更为“宝云庵”。
32	普润院	县西十里之 章冈山	不详	不详	宋治平元年赐今额。
33	资国院	县北二十里 之周村	不详	不详	宋治平元年赐额。
34	永乐院	县东四十里 之冯村	不详	不详	宋治平赐额。
35	栖真院	县西七十里 箬坑	不详	不详	有唐天复元年钟传所铸铜佛。
36	云岩禅院	县西八十里 之东陂	不详	不详	
37	宝界院	县西八十里 之仙姑桥	不详	不详	
38	悟宗院	县北四十里	不详	不详	
39	方广院	在县西五十	唐天佑	钟传	宋建炎兵毁。

里润溪泉上					
40	罗汉院	胜果寺侧	不详	不详	
41	开善禅院	上蔡门外龙化山	不详	不详	
42	禅寂院	县南孝友坊	唐	不详	宋时改额。既废，后复重修，仍曰南禅寺。
43	布金院	县河南	不详	不详	今为风云雷雨坛。
44	无为院	县西三十里之舍溪	唐大顺	僧真道	宋治平间赐额。
45	安国院	劳松团石陂	唐大顺	僧大琮	宋太平兴国八年赐今额。元兵毁。明僧如庵重建法堂。
46	瑞山禅院	县东三十里辛义下团	清康熙丙午	不详	
47	寿圣院	县西八十里螺田	不详	不详	宋治平元年赐额。
48	常安院	县南三十里左村	不详	不详	
49	栖隐院	县西四十里之大石村	唐	不详	
50	延福院	县西七十里视山	唐光启	不详	
51	普照院	县西六十里井头	唐	不详	宋治平间赐额，今废。
52	证道院	县北十五里横江村	唐大顺	僧徽禅师	今废。寺有田地归并崇宁寺。
53	兴福院	县西三十里港南	唐	不详	宋赐额，今废。
54	普慈院	县西四十五里密村	唐	不详	宋治平中赐额，今废。
55	内宫院	集贤坊	不详	不详	旧有寺产甚多，今废。
56	戒香院	县西四十里之上蓝	不详	不详	
57	华严庵	县东鵠鹚洲	不详	诸缘和尚	云居寺派诸缘和尚由北京万佛堂到此开山。明万历时，首山和尚住持，敕封华严禅庵。孝安陈太后赐袈裟一领，流金铜佛一尊。
58	龙泉地藏庵	县治东尉界团龙口山下	不详	不详	僧恒音自九华来，募化修葺，捐衣钵赀，置香灯田十亩。
59	镜山庵	县旭屏门外中镜山之巅	不详	不详	
60	莲池庵	县招敖门外	不详	不详	

敖山之阳				
61	西来庵	县末华门外	不详	僧修学
62	祝圣庵	河西湾溪	不详	不详
63	水月庵	县河南亭口	不详	不详
64	普静庵	县河南下	不详	不详
65	通源庵	里陂侧	不详	邑候王耘
66	慧定庵	斜口仓曹祠 后	明万历丙辰	僧冰湖
67	九子庵	仁里钟家渡 口	不详	不详
68	末山地 藏庵	九峰寺之右 里许	清顺治四年	僧鲁生
69	环水庵	县西六十里 东溪	不详	不详
70	定慧庵	县治八十里 山枣渡	明万历	黄门
				国朝顺治六年，举人江廷魁同乡人重修。
71	广济庵	广安团	不详	不详
72	福寿庵	下京陂	不详	不详
73	馥莲庵	县南二十五 里珑塘	不详	不详
74	万福庵	蒙安下团流 陂	不详	不详
75	石龙庵	县西南十五 里观音洞口	不详	不详
				嘉庆戊辰，知县刘丙捐廉，仍令住持僧募资重修。里中助修各姓勒有碑。
76	普济庵	北里团	不详	不详
77	蒙山天 晓庵	不详	不详	曹颜
				知县刘而介赠之额曰“德重名山”。
78	竹林庵	唐良天岭	不详	不详
79	罗月庵	唐良富溪林 竹	不详	不详
80	灵峰庵	县三十里之 杭头灵峰山 下	不详	庠生晏煜
81	种松庵	杭头	不详	不详
				里人晏扬勋守父茔，建庵其侧。
82	太平庵	义城下团栎 港	不详	不详
83	回澜庵	全安上端溪	不详	不详
84	大士庵	田北关帝阁 左	不详	不详
85	北辰庵	正全安团富 港	不详	不详
86	九龙庵	界埠	不详	不详

87	双龙庵	西团水口	不详	不详
88	广福庵	县东四十五里良田	唐	寿禅师

表4：奉新县寺庵表（录自同治十一年《奉新县志》）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敕建百丈寺	县西一百三十里	唐大历	邑人甘贞	唐宣宗赐额“大智寿圣禅寺”。康熙间，南昌知府叶舟重建。雍正十二年奉旨敕修，内府颁图改造，费币七千余金。咸丰六年，粤匪踞寺十余日，毁佛像及僧房。
2	百丈普显寺	不详	不详	不详	奉化乡监生彭茂捐田租拾伍石。
3	大宝胜轮塔院	百丈寺西大雄峰下	大	不详	塔殿毁于宋。
4	宝云寺	北门外	梁太清元年	不详	元季毁。洪武初，僧性空海重建。国朝嘉庆己卯，僧体荣置买平桶租五十七石有零，僧晓能、同登会善信置买早晚租四十石。咸丰四年毁于兵。同治年间，住持僧德本重修后，重并续置田租二十四石零。
5	延恩寺	县治东门内	不详	不详	咸丰元年，邑进士赖以立捐修；四年，毁于兵。原置田租归宝云寺住持德本经收。同治八年，德本将历年余费添置田租二十一石三斗余。
6	三元殿	县治北门外	不详	不详	
7	准提庵	县治东门外	不详	不详	
8	云端院	冯川桥之南	不详	知县冯挺	明知县冯挺建桥成，创院于桥之南以镇之，给租赡僧。
9	中沙庵	冯水之南	不详	不详	旧雷坛是也。前祀元帝，后建佛殿，左莳修竹数亩，构亭其下。仍出田二十五亩为瞻僧费。
10	惠安寺	县治西	宋祥符间	不详	
11	竹林院	从善乡	唐光化间	不详	
12	龙头山寺	从善乡	不详	不详	
13	永镇寺	从善乡	不详	不详	

14	天乙山	从善乡 寺	不详	不详	祀真武，极灵。红巾贼起，司李胡道亨，祷神而应。后贼灭，乃镌“神威永靖”额以表之。
15	白衣庵	从善乡 郑洲 河北	不详	不详	
16	观音阁	从善乡 顾溪	不详	不详	
17	祥云庵	健康乡 三溪	不详	不详	
18	法济寺	健康乡 横岭 山	不详	不详	
19	尊胜院	同安乡	宋崇宁间	不详	明崇祯间，邑人胡一供修创前殿。
20	幽谷院	同安乡	明洪武	不详	
21	长寿院	同安乡	不详	不详	
22	正宗寺	同安乡	不详	不详	
23	惠明院	同安乡	不详	不详	
24	道济院	同安乡	不详	不详	
25	滋福庵	同安乡	不详	不详	
26	天帝寺	同安乡	不详	不详	
27	枥榔庵	同安乡	不详	不详	
28	隆教寺	奉新乡	宋祥符	僧如琏	按碑载南枥王珣国施地九泉，王振清重修。乾隆三十四年，邹朴裔重修罗汉堂一重。嘉庆二十五年，僧乘舟建亭，邓鹤龄捐送大桶租五石。
29	钟山院	奉新乡	不详	不详	
30	崇法院	奉新乡	不详	不详	
31	镇城院	奉新乡 五步 城	不详	不详	
32	宝藏院	奉新乡黄城		不详	宋大中祥符间赐额。内有绿篛阁，名人多题咏。
33	翠竹寺	奉新乡	明	不详	
34	临池院	奉新乡	不详	不详	
35	白云寺	南乡虬峰	汉建安	不详	左为虬王殿，祀汉刘繇，右为禅堂，后有观音阁。咸丰十一年，被贼焚毁。同治六年，本邑封职许献琛等复于故址募缘重修。
36	梵安院	南乡	不详	不详	
37	圆通院	南乡水埠头 左侧	不详	不详	
38	水月庵	南乡随湖	不详	不详	一在石湖。
39	显教寺	北乡六都	不详	不详	即帅氏龙泉书院地。咸

					丰十一年兵燹无存。同治七年，帅姓醵钱重修，计砖屋二所，均绕以群房。元末，帅元济屯兵于此，捍卫乡里。有田租七十余石。道光年间，帅清芬堂助寺前聂家垅田十七亩，为香灯费。
40	海智院	北乡	不详	不详	
41	信善院	北乡	不详	不详	
42	太平寺	北乡	不详	不详	
43	圆通寺	北乡 峨眉洲 右	不详	不详	
44	龙潭寺	北乡	不详	不详	
45	回龙寺	北乡 峨眉洲 左	不详	不详	
46	灵光院	新安乡	唐光化	不详	宣和御笔赐额。
47	舍利院	新安乡	不详	不详	
48	达观院	新安乡	不详	不详	
49	黄龙庵	新安乡	不详	不详	
50	兴慈院	新安乡	不详	不详	
51	西竺寺	新安乡	不详	不详	
52	西来寺	新安乡	不详	不详	
53	兴隆寺	新安乡妙岭	不详	不详	封职严述祖全弟、封职述曾捐助田租一十四石五斗大。
54	白云寺	新安乡雄岭 围	不详	众修	
55	定惠禅院	新安乡	梁天监二年	不详	
56	岩头禅院	新兴乡	唐	不详	元末毁于兵。
57	金相寺	新兴乡小城	不详	不详	宋治平中赐今额。
58	成觉院	新兴乡	不详	不详	故县邹节卿重修，捐租一百二十五石。
59	宝莲院	新兴乡越王 山顶	宋嘉定	富溪刘氏	西江安抚使真德秀立今名；国朝乾隆癸未、庚子，嘉庆辛未，道光壬午刘氏重建。
60	证果院	新兴乡	不详	不详	
61	耕香院	新兴乡	清顺治十三 年	僧敏	
62	鹿野寺	新兴乡	明崇祯	不详	国初僧逸如复构地开创。
63	栖云庵	新兴乡	不详	生员谌时泰	捐田租五十余石，又竹

木山一大嶂。

64	碧莲寺	新兴乡故县	不详	不详	
65	文殊院	新兴乡	不详	不详	
66	芥纳寺	新兴乡张坊	不详	不详	
67	山口院	法城乡车坪	不详	不详	
		之东			
68	普济院	法城乡田南	不详	不详	
69	崇果院	法城乡	宋咸平	不详	
70	跃龙庵	法城乡水口	不详	不详	
71	宝文庵	法城乡	不详	不详	嘉庆五年，南同涂以文 裔重修。
72	昙智院	法城乡	不详	不详	
73	安福院	法城乡	不详	不详	
74	延恩院	法城乡东琴	不详	不详	
		山			
75	仙枣庵	法城乡渣村	不详	不详	
		起凤山			
76	永福寺	法城乡	不详	不详	
77	白云寺	法城乡	不详	不详	
78	祖师殿	一在法城鸟	不详	不详	
		龙山，一在从			
		善乡河南一			
		在新兴乡游			
		乐莲花山。			
79	普化院	进城乡小雄	不详	不详	
		山			
80	漱莲庵	进城乡阴村	不详	不详	
81	白水寺	进城乡	不详	不详	
82	普通庵	进城乡	元泰定	不详	
83	皇佛院	进城乡	不详	不详	
84	大觉院	进城乡罗坊	明洪武	僧志满	佛座后有一石洞，每遇 天气晴爽，有岚气涌出，云 亘数十丈，土人以为科名先 兆。
85	阐化院	进城乡	嘉靖初	不详	
86	大善堂	进城乡罗坊	不详	不详	
87	安澜寺	进城乡竹埠	不详	不详	
88	洁庵	进城乡竹埠	不详	不详	
89	三元殿	进城乡竹埠	不详	不详	
90	北台寺	进城乡罗坊	不详	不详	
91	罗源庵	进城乡田源	不详	不详	嘉庆十年移建竹溪。
92	主山寺	进城乡大桥	不详	不详	僧揆盛置田租一百六 石，山场六大嶂。僧青莲续 置田租三百七十石二斗五
		围			

					升、苗竹山五大嶂。僧参来置田租三十二石，大杂树山二大嶂。
93	芝山庵	进城乡蓝田	不详	罗光孚	
94	慈云寺	进城乡治城	不详	彭瑞麟母涂氏	
95	紫云庵	进城乡蓝田	不详	罗兴楫	
96	普安院	奉化乡	唐乾符	不详	元季毁。国朝康熙初重建。
97	九仙寿圣禅院	奉化乡九仙山	不详	不详	唐时有僧梵云驻锡于此赐号“大历禅院”。宋治平三年赐今额。今废。
98	崇因院	奉化乡宝岳山	明正统	普化院僧汪圆勉	
99	戒德院	奉化乡密岩山	明景泰四年	普化院僧圆勉、觉瑛、觉证全	万历三十二年，里人彭祥仲修。国朝乾隆二十四年，同知蔡鸿才创建后殿。
100	回澜寺	奉化乡横石桥	不详	不详	
101	福胜院	奉化乡	不详	不详	
102	龙岩寺	奉化乡小桃源	不详	职员刘应谦	
103	广福院	奉化乡横石桥	不详	不详	
104	昙慧院	奉化乡	不详	不详	旧传刘道成修炼之所。
105	寒溪院	奉化乡甘坊	不详	不详	
106	金湖院	奉化乡富溪	不详	不详	
107	白云庵	奉化乡晏嶂山	不详	不详	刘道成成仙之地。
108	仙姑庵	奉化乡甘坊西二十里下平港	不详	彭嘉庠	(彭嘉庠)并置随庵山田。
109	水竹庵	奉化乡石溪	不详	蔡学圃	
110	崇觉院	奉化乡	不详	不详	
111	牛石庵	奉化乡上村	不详	不详	相传牛石慧修道处。罗、李、蔡、戴四姓各捐钱一百五十千文重修。
112	乔庆寺	奉化乡甘坊大宛山	不详	不详	彭复斋捐置田租一百二十石五斗，又苗竹、茶、桐山四嶂。
113	竹香寺	奉化乡石溪围	不详	蔡巨川、蔡松十、周荣若、周茂祖、张文相	置晚田租四十九石，及庄场一所，又苗竹杂山一大片。

114	文澜寺	奉化乡甘坊	不详	不详
115	涵碧寺	奉化乡石溪	不详	不详
116	吉祥寺	奉化乡横石 桥	不详	不详
117	古基寺	奉化乡古基 山	不详	不详
118	独孤庵	奉化乡桃源	不详	不详
119	云峰寺	奉化乡云峰 山	不详	不详
120	善法寺	奉化乡小溪	不详	封员蔡东山
121	龙沙庵	奉化乡富溪 水口	不详	不详
122	三峰寺	奉化乡	不详	蔡贻孙
123	清远寺	奉化乡石溪 围	不详	蔡贻孙 蔡松十捐助晚田租二十 石零二斗五升，又苗竹杂山 一大嶂。
124	天静庵	奉化乡	不详	蔡贻孙
125	海慧院	不详	唐乾符	不详

表5：靖安县寺庵表（录自同治九年《靖安县志》）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双林寺	县北五里绣 谷山下	东晋	西域沙门竺 昙	唐柳公权书门扁曰“大 中双林禅寺”。
2	延庆寺	县西北八十 里忠夏都	梁天监	不详	
3	宝峰寺	县北四十里 大梓都石门 山	不详	不详	
4	龙门寺	县西北八十 里忠夏都	唐	马祖	
5	法药寺	县东二百步	不详	不详	唐贞元中马祖来游时， 县多疫，于寺后凿井，置药 井中，饮者无不获愈，故以 此得名。
6	云阳寺	县西九十里 南源都	唐	不详	
7	黄龙寺	县南五里许	不详	不详	元季毁于兵。
8	曹溪寺	县北二十里 大梓都	不详	不详	六祖曾建茅庵于此，故 名。
9	九仙寺	县西一百里 南源都	明永乐九年	不详	
10	金沙寺	县城半里金 沙洲	明万历二十 年	僧性郎	
11	般若寺	象湖都	不详	不详	

12	安圣寺	富仁都古港	不详	不详	
13	佑圣寺	棠棣都	不详	不详	
14	长灵寺	县北二十里 熊仙都	清康熙十年	僧宏旭	
15	西传寺	县北四十里 大梓都	明崇祯十一年	僧道宝	
16	善法院	县东十一里 东江都	不详	不详	
17	宝月院	县北三十里 象湖都	唐	不详	
18	报身院	县西八十里 南源都	宋	不详	
19	善业院	县东北二十 五里追里都	不详	不详	
20	书堂庵	县西三十里 新兴都	唐	马祖道一	宋舒公平、明王文成与 舒柏并讲学于此。邑人士多 下榻于此。正德庚午毁。
21	驯龙庵	县南半里	清康熙十四 年	僧若昙	
22	护龙庵	距县半里	明万历己酉	僧机缘	
23	太平庵	县西五十里 富仁都	明万历	僧性郎	
24	古田庵	县南十里东 江都	不详	不详	
25	青莲庵	县西二十里 棠棣都	明崇祯九年	僧明虚	
26	跃龙庵	县东南十里 夏陂都	明崇祯二年	僧素白	
27	长坑庵	县西北六十 里巢坑都	不详	不详	明万历二十七年，僧瑞 云募建茶庵。
28	金华庵	县西七十里 南源都	明万历	僧天衢	
29	永庆庵	县北二十里 熊仙都	明崇祯七年	僧隆文	
30	虬龙庵	县南十里东 江都	明崇祯十二 年	僧若昙	
31	古灵庵	县西六十里 忠夏都	不详	不详	
32	仙锋庵	县西北六十 里塘埠	明隆庆二年	僧惠空	
33	石霞庵	县北二十里 熊仙都	不详	不详	
34	上林庵	县西三里厢 都	明成化十六 年	僧普圆	

35	天福庵	县南十八里 夏陂都	清康熙十年	僧中印	
36	解桥庵	县南十里夏 陂都	明万历	僧大海	
37	天竺庵	县西八十里 南源	明弘治	僧檀空	
38	寻仙庵	县西南源都 龙头坳白云 峰下	不详	不详	
39	云雷庵	县西棠棣都	明正德	僧净心	
40	香象庵	县西南源都 当归湖	不详	不详	
41	黄茅岭庵	县西六十里 忠夏都	不详	不详	
42	鸣风庵	县西三十里 棠棣都桃源 白水洞口	不详	不详	洞距庵二里许，有泉最灵，祈雨辄应。置有田产，以资行人茶水。乾隆癸丑年，庵与田俱被水冲废。
43	传薪庵	山口黄泥坑	不详	不详	
44	柏木庵	北石马	不详	不详	
45	毓秀庵	县南石马八 里	不详	不详	

表 6：万载县寺庵表（录自同治十一年《万载县志》）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广济寺	西门外锦衣坊	不详	道士涂道	宋政和三年改万寿宫； 靖康元年更名广报观。清康熙三十六年，宋瑞洪与僧某改为寺，额曰“西屏山”。
2	翠岩寺	北关外翠岩亭后	不详	彭颢	康熙中，三元众监生辛受中、庠生朱文光等修整。 雍正三年，众复助香火田。
3	开化寺	西门外	清康熙庚辰	僧镜圆	众置田亩。咸丰四年兵毁。郭功泽倡捐重修左厢。
4	胜果寺	一区石岐	宋开宝二年	僧东岩	
5	月光寺	二区峰顶山巅	不详	不详	昔时马祖道场也。
6	九峰寺	不详	不详	不详	明成化甲午，龙邦重建殿宇、佛像，更今名。其西塔、殿宇三件，则成化癸巳，举人晏清建。因塔旁井泉清冽，遇旱应祷，遂建殿为乡人祈报所。
7	棋盘山	二区绍江	不详	不详	庠生汪映皓重建并置产，后

	寺				
					遭回禄，产亦殆尽。嘉庆壬申，贡生郭树芝建寺造像，捐置田山，付僧其兹住持。
8	惠济寺	二区岭东	清康熙壬子	不详	
9	横源寺	二区桥墩	不详	不详	
10	兴隆寺	二区田北	清顺治	龙姓	
11	蟠龙寺	二区上 镰冲 洪塘坑	清康熙	鲍莱子子孙	有香火田产。
12	云隐寺	二区小石笏	清乾隆二年	僧雷隐	
13	福泉寺	二区柴田 塘 仔尾	清乾隆壬午	僧若余	
14	宝峰寺	二区四都	不详	欧阳孟江	道光辛卯，其子孙重建。
15	天福寺	二区谷源 槽 下	不详	南昌龚仲庚	
16	万寿寺	二区银山左	不详	不详	嘉庆丙寅，周泰兴后裔重修，助有田产。
17	金绳寺	三区仙居桥	不详	不详	
18	圆善寺	三区潭埠 鱼 鳞滩	不详	不详	倡首者欧阳荣成、刘元万等。
19	能仁寺	三区源头	不详	不详	
20	高峰寺	三区东坑 上 庵	不详	不详	乾隆己卯，王星元后裔重修。
21	万福寺	东坑下庵	不详	不详	
22	金莲寺	三区南北岸	清嘉庆乙亥	合乡募建	
23	东山寺	四区白水	不详	不详	嘉庆己卯，欧阳六房重修。
24	遇龙山 寺	四区	清康熙辛丑	僧念真	并置香火田。
25	法界寺	四区圳上	不详	不详	道光壬午，伏龙山僧悟透承买重建，易今名。
26	嵩林山 寺	四区严芫	清康熙甲戌	僧元静	并置田。
27	静修寺	四区茶坑	清康熙乙未	竺装寺僧悵 赞	
28	回龙寺	四区下石岩	清道光壬午	伏龙山僧悟透	
29	陆云寺	四区白水	不详	不详	乾隆三年，乡众重建。
30	碧云寺	白水岭	清嘉庆辛未	欧阳族众	并葺茶亭。
31	铁林山 寺	四区株木桥	不详	乡众募建	
32	中峰寺	四区高洞	不详	不详	
33	宝积寺	四区广洞 株 岭冲	不详	不详	
34	南觉寺	四区浩石	不详	易钊和、廷	置有田。

				辉等捐建
35	真空寺	四区仙源	不详	院僧募建
36	长兴寺	四区五神岭	不详	不详
37	福昌寺	五区谢山	不详	不详 仲初飞升处，因名岭曰“上升”。旧有福昌院，道士周兴龄以仙迹闻，诏改灵应观。明宣德十年，乡人葺观宇。清康熙丙寅，新昌五峰寺僧昭睦、佛喜、至山募缘重建，装塑佛像，改观为寺，复福昌名。白良敖昌六捐有田亩。
38	钟灵寺	五区白良	明永乐二年	袁、李二姓创建 清康熙元年，邑庠袁秀也、李周士等倡修，易名集贤庵；庚寅，袁维周、李则修、袁维汉、李瑞吉率众置香火田，增建下栋，改今名。
39	长兴寺	五区水坑巢	元至元十年	僧朴庵 长史谭尝肄业于是。道光丙申，僧学空募三、七两图绅民捐修。同治二年，寺圮；五年、九年，两图迭次捐资重建。
40	竹隐寺	五区荷陂岭 庙背	不详	喻万启、典七 有香火田。道光间募众重建。
41	法安寺	六区布溪	宋	不详 清康熙甲戌，僧已灵募高、刘、何、甘四姓重修。高、刘捐有田地，四姓又将百子灯众银买田资香火。
42	大悲寺	六区小浒	宋	彭姓 旁有半草山房。
43	大智寺	六区湖溪	不详	不详 康熙辛未，李姓重建。
44	万祝寺	六区黄皮岭 北	不详	不详
45	长青寺	六区小浒	不详	段姓
46	伏虎寺	六区漳源	不详	宋舜爵
47	回龙寺	漳源	不详	宋昕
48	回龙寺	杭桥	不详	游德圃
49	福临寺	六区淳溪	不详	李姓
50	聚云寺	淳溪	不详	李姓
51	竹隐寺	淳溪	不详	不详
52	永兴寺	淳溪	不详	李子泰
53	永兴寺	黎源谷皮山 麓	不详	不详
54	碧云寺	六区高村	不详	不详
55	紫云寺	六区东会	不详	不详

56	光梵寺	严田	唐	断涤禅师	
57	清华寺	白水泉	不详	一图众建	
58	悞慎寺	五区银田	不详	不详	嘉庆丁丑，欧阳瑞山、瑞怀重修。
59	静安院	县治东北一 百步	唐武德八年	不详	正德间，宋一本母辛氏捐建观音阁。雍正十年，辛通改建山门。乾隆间毁，移佛像于关帝庙后，今与武庙互易。咸丰五年，佛像兵毁。同治七年募修。
60	庄严院	小南门四百 步	宋建炎四年	僧觉义	清乾隆间，周文魁后裔捐修上栋，郭汉臣募建下栋，更名“七宝山”，略移旧址。
61	安德院	一区泉陂	宋开宝四年	僧惟实	元季遭兵燹。
62	宝丰寺	二区高田	宋大中祥符 五年	僧楚圆	成化六年，真溪重建。 清顺治戊戌，海晏因废基复构；嘉庆丙寅，欧阳孟江偕僧永盛重修。郭子吉子孙建书院于旁。
63	广仁院	二区黄江	宋建炎元年	僧正规	
64	云岩院	二区澜源头	明永乐	僧智有	邑人龙尧道捐建东廊。
65	惠林院	三区南源江	唐咸亨三年	僧妙应	
66	广严院	三区铁山界	唐天宝二年	僧如珉	
67	澄寂院	三区山田坑	唐太和五年	僧停山	
68	保安院	三区青布	宋开宝二年	僧介庵	
69	三学院	四区万寿山	唐贞元十年	僧大智	
70	净学院	四区白杨山	宋太宗	僧法顺	山水竹木，迥非尘境，古称袁州七佛地之一。元大德五年，僧文灿见重成宗，敕赐今名。后分二寺，一曹洞派，庚子毁，乙卯岂凡募建；一临济派，同毁，壬午克彰复建。
71	光梵院	四区苏溪	宋宣和二年	僧岂然	
72	明觉院	五区云峰岭	唐贞观	不详	道光二年，上栋焚毁。 次年，十九都图众捐修。
73	崇道院	四区茵菺硚	唐	僧月仙	道光九年，举人欧阳彬等倡捐重修。
74	普城院	五区岐里	唐开元五年	不详	贡生谭经国助修，并建水口石桥。后彭宗植移建虎形山前，捐有田。
75	明寂院	五区云芒山	南唐保大十 一年	不详	
76	明寂院	五区上蓝山	不详	不详	

77	广法院	五区湖源	宋天圣二年	僧妙成	天启元年，性觉募湖溪 李大时重建。
78	光化院	六区严山	唐	断际禅师	
79	观音庵	康乐桥左	元至正间	邑人龙珦	天启时，邑人辛敏道重 修。岁久倾颓，雍正九年， 邑人重建。大唐庵僧自修置 中村田百把，资香火。道光 十四年，修康乐桥首事后裔 重修。
80	观音庵	四区杨姑塘	乾隆	郭山、张有 亮众建	
81	观音庵	中茭羌下街 万寿宫侧	道光甲辰	例贡彭才 礼、耆民黄 日新等倡建	道光十四年，修桥首事 后裔重修，其香火田于道光 三十年经首事后裔收管，为 雇工、灯油、工食之资。
82	观音堂	九仙宫	康熙庚子	稟生巢汝翼 等	
83	观音堂	皂山关帝殿 后	不详	不详	
84	观音堂	县署内	不详	不详	因华光祠改建成。咸丰 五年兵毁，同治八年修复。
85	观音阁	二区谷源	不详	僧法朗	
86	东来阁	建成坊东关 外	明万历	邑举人袁汝 柷	后兵毁。清康熙戊子， 僧晓云偕邑庠张问达、易观 国、龙学慤、龙韬等募坊众 重修；僧文贤、静泰醵赀生 息置产，有碑。乾隆辛巳， 袁贤七兄弟同僧圆明更募重 建。咸丰年间，渐圮，又被 土人侵蚀庵产，会内后裔举 人潘绍岳等控县，清出契据， 于同治二年募化重修，择僧 住持，以会内租息为香火资， 复旧观焉。
87	普济庵	大北门外	明万历	辛康四	后，辛贵德同僧兴来募 化重建。嘉庆辛未，主事辛 文彬奉藏佛付僧供养。
88	不二庵	邑南门外	明	郭汝泰	
89	半云庵	西门外陈家 山	清顺治	龙伟儒仪三 众	
90	净土庵	龙河门外	清康熙六年	僧募建	乾隆间毁。嘉庆间圮， 邑人龙永淑裔先后捐修。
91	祝泰庵	邑北一里	不详	不详	
92	普惠庵	二区洞口	不详	郭汝泰	

93	大唐庵	二区谷源	不详	不详	明天启中，江督袁继咸肄业于是，题曰“大唐古刹”，因名。
94	紫盖山庵	二区	不详	不详	谢仲初修真处。国朝顺治中贡生袁端招、僧觉中募建，闻仪、辛金寿等倡捐田亩。
95	新庵	二区礼山	明崇祯庚申	邑人辛聊开	国朝顺治戊戌，开子庠生朗建饭堂、修佛殿。乾隆间，开裔重建。
96	灵鹫庵	二区鹤峰	明	邑人郭宏亮	
97	石林庵	二区漕岭	清顺治	僧超慧募建	乾隆间，欧阳、周、杨、邓四姓偕僧清莲重修。道光七年，四姓复偕僧修葺。
98	重庆庵	二区小石笏	不详	邑人郭大护	
99	绿水庵	二区官庄	康熙壬申	僧允中	
	车				
100	翠竹庵	二区大关岭	不详	龙炳若	并捐田山。宋日暄、辛五山、郭鼎玉、高殿瞻、宋续汉等立茶亭，捐有田亩。
	上				
101	会龙庵	二区张家塘	不详	不详	澄塘张翱子孙重建。
102	覆盆庵	二区五云山	清康熙	僧拙林	
103	崇惠庵	二区谷源	不详	不详	
104	兴隆庵	谷源	不详	不详	
105	兴隆庵	四区潭埠后街	不详	不详	
106	谷源庵	二区	不详	胥桥	孙大顺、大化拨产助。
107	三元庵	二区周家市	不详	李姓	
108	西龙庵	二区小石笏	清乾隆二年	僧当隐	
109	积庆庵	二区谷源	杨不详	不详	捐有田亩。
	家湖				
110	翠云庵	二区礼山	不详	辛、胡、龙三姓	
111	圣济庵	二区银山半岭	不详	不详	王晤后裔重修。
112	青云庵	二区南窑	不详	不详	
113	翠龙庵	二区岭东	不详	不详	
114	永泰庵	三区濠田塅	明天启	乡耆丁汝泰同族捐建。	
				丁朝栋捐有田亩，康熙十八年，众又重建三元殿。	

附录

115	冷水庵	三区获富	不详	不详	
116	永兴庵	三区株树潭街后	不详	杨孟明	
117	兴龙庵	三区石塘	不详	不详	乾隆元年，龙仁山祠重建。
118	镇福庵	三区严坪	不详	不详	乾隆中，欧阳升平祠重修。
119	碧云庵	三区路下	清乾隆二年	汤儒林	捐有田亩。
120	回龙庵	三区埢下	不详	不详	
121	秀峰庵	埢下	不详	不详	
122	石庵	四区牟村、龙田之间	不详	不详	明天启间，僧圆空增置僧舍；里人钟孟七等倡置香火田亩。
123	福嵩庵	四区上排江	清康熙三十一年	僧自良	
124	高唐庵	四区箬坪	不详	邑人陈新明、谭白天	
125	龙溪庵	四区花桥凤翔山	清康熙壬子	石庵僧哲林募建	
126	福聚庵	四区庙坑	清康熙癸酉	石庵僧自寿	
127	避尘庵	四区清水潭	不详	不详	
128	聚龙山庵	四区曹头	清康熙甲申	谢山僧昭睦募建	
129	紫云庵	四区潭埠栗火冲	清康熙甲戌	僧碧涛	康熙甲戌，邑庠宋希商捐山。
130	万寿庵	四区花桥茭塘冲	不详	不详	雍正八年，僧灵慧买得并置田产。
131	西竺庵	清水潭枫树冲	不详	杨五九、德四、德七	捐有田山。乾隆壬子，五九等后人重建。
132	西竺庵	白杨	清顺治四年	乡人陈如昱	
133	福慧庵	四区箬坪黄布	不详	陈文英子孙	有田产。
134	清莲庵	四区牛阑厂	不详	戴兴族众	
135	龙慈山庵	四区陂冲	不详	戴兴族众	
136	白云山庵	四区枫梓岭	不详	僧达培	
137	翠荣庵	四区郭山杨姑塘	不详	张锦族	
138	福寿庵	四区猪公井	不详	不详	
139	西源庵	五区太平街	清康熙壬子	僧知善募建	乾隆甲辰、嘉庆庚辰，求玉、其茲相继拓修，遂称胜地。
140	大东山	五区迎中	不详	邑禀生谭中	

	庵		伦	
141	如意庵	五区虎塘源头坑	清康熙壬午僧智善	康熙壬午，鲍莱子捐基址田山；乙未，慧鑑重修，何维烈、如及、幼文共捐香火田。
142	华严庵	五区里源	不详	僧静禅募建
143	紫云庵	五区芳坑岭	不详	邑人杨嘉和
144	西竺庵	五区湖源	清康熙庚申僧不凡	康熙庚申，僧不凡募潘福孙将牙建。
145	海云庵	五区白良	不详	敖奠华 康熙辛丑，其孙举人琏妻袁氏冲构。道光甲申，敖有义后裔重建，原助香火田二百把。
146	朝阳山庵	五区牟村	不详	不详 旧住持某买谭姓地创建。
147	广会山庵	五区南源冲	不详	僧息浪 喻礼也、尔玉捐有田山。
148	聚云庵	五区虎塘源头冲	不详	邑人何士英等 道光乙酉，何涵宇后裔重建。
149	碧云庵	五区谢溪	不详	易圣传
150	石云庵	五区岐里棋子岭	清乾隆庚子	僧智远、石岂
151	秀发庵	五区范塘水口富春桥侧	不详	
152	万寿庵	范塘东坑	不详	廖星 道光丁未，修有田产。
153	白石庵	五区小溪冲	不详	不详
154	永兴庵	五区上菱芜刘家园	不详	不详
155	九华庵	六区皂山	明	通判喻济 时、邑庠之望
156	福隆庵	皂山观音堂后	明	通判喻子良
157	剩沙庵	六区高村凉坑	不详	不详 乾隆癸卯，李姓重修。
158	西竹庵	六区罗城塅	明	周灵馨
159	紫云庵	六区藏溪	不详	喻草池
160	护龙庵	六区塔村水口	不详	简姓
161	余庆庵	六区岐源水口	不详	杨特峰
162	半山庵	六区万祝寺东	不详	不详
163	回龙庵	六区卢洲	不详	不详

164	雨化庵	不详	不详	卢慎凡	(卢慎凡)族人重修。
165	螺蛳庵	后槎乡水口平地	不详	不详	道光十八年，乡人捐资重建上下二进，左有僧舍，右有书院。

表 7：樟树市寺庵表（录自同治九年《清江县志》）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天宁寺	试院左	不详	不详	宋赐额“天宁万寿”，又改报恩光孝。
2	慧力寺	城南二里筠山	不详	不详	
3	石溪龙居院	府学左	不详	不详	
4	广寿寺	城南崇德坊	不详	不详	
5	宝金寺	清江镇	不详	不详	
6	通慧寺	清江镇	不详	不详	
7	南禅寺	清江镇	不详	不详	
8	回龙寺	城东北五里	不详	不详	
9	东山寺	清江镇	不详	不详	
10	新兴寺	永泰市	不详	不详	
11	东林寺	一都	不详	不详	
12	金城寺	二都	唐	广明	
13	莲花寺	三都	晋天福	不详	
14	荆山寺	四都	不详	不详	明朱琏读书其中，罗殿撰、洪先尝寓此，所题二额尚存。
15	见山寺	十一都	不详	不详	萧寺梵音，上湖八景之一。
16	香积寺	十四都中洲	不详	不详	
17	万竹庵	朝天门外	不详	不详	施闰章题额。
18	长生庵	清江镇	不详	不详	
19	鹿野庵	永泰市车埠桥	不详	不详	有观摩堂，郡守张景苍、邑令叶重熙、淦令汪波尝课士会文于此。
20	挹秀庵	十都花澧洲	不详	不详	康熙中，邑解元彭恪尝读书其中，更名挹秀。
21	石城庵	十六都	不详	不详	
22	查林寺	西左团	宋治平	不详	
23	华阳寺	西左团	不详	不详	
24	回龙庵	西左团	不详	不详	
25	白云庵	西左团	不详	不详	
26	竺接庵	西左团	不详	不详	
27	五云庵	西左团	不详	不详	
28	龙溪寺	西成团	唐贞观	不详	

29	光华山 寺	西成团	不详	不详
30	古福山 寺	西成团	唐贞观	不详
31	浒山庵	西成团	不详	不详
32	凤台寺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33	莲花寺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34	中山寺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35	九龙寺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36	神山寺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37	青莲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38	永镇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39	瑞云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0	云龙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1	福隆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2	一佛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3	二教寺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4	青龙寺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5	安阳寺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6	双源寺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7	玉湖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8	金盆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49	镇龙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50	圆明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51	青山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52	碧云庵	南乡下团	不详	不详
53	慈相寺	中洲团	不详	不详
54	隐仙寺	中洲团	五代	不详
55	黄山寺	中洲团	不详	白玉蟾炼丹于此。
	华严庵	中洲团	不详	不详
56	受福寺	永泰团	不详	不详
57	下保寺	永泰团	不详	不详
	莲池庵	永泰团	不详	不详
58	石城寺	店下团	不详	不详
59	上乐寺	店下团	不详	不详
60	峡山寺	店下团	不详	不详
61	大乘庵	店下团	不详	不详
62	回龙庵	店下团	不详	不详
63	胜华庵	店下团	不详	不详
64	回龙庵	芗溪团	不详	不详
65	崇胜庵	芗溪团	不详	不详
66	忠家坊 庵	芗溪团	不详	不详
67	下孤山	芗溪团	不详	不详

庵					
68	赵桥庵	芗溪团	不详	不详	
	大觉寺	程坊团	不详	不详	
	龙居寺	程坊团	不详	不详	
	回龙庵	程坊团	不详	不详	
	新城寺	程坊团	不详	不详	
	西竺庵	程坊团	不详	不详	
	永福庵	观上团	不详	不详	
69	支提庵	大桥团	不详	不详	同治五年，重修。新设保甲局。内有万寿宫、天符庙、文昌宫、关帝殿、观音堂。
70	翠竹庵	大桥团	清乾隆	不详	
71	大田庵	大桥团	不详	不详	
72	兴隆庵	大桥团	不详	不详	
73	水心庵	大桥团	不详	不详	
74	萃瑞庵	大桥团	不详	不详	
75	东土庵	大桥团	不详	不详	有天符庙。
76	观音庵	大桥团	不详	不详	
77	泽仙寺	大桥团	不详	不详	
78	滔三寺	大桥团	不详	不详	
	回龙寺	下北乡团	不详	不详	
79	崇福寺	下北乡团	不详	不详	
80	证真寺	下北乡团	不详	不详	
81	合流寺	下北乡团	不详	不详	
82	中洲寺	下北乡团	不详	不详	
83	香湖庵	下北乡团	不详	不详	
84	雪楼庵	下北乡团	不详	不详	

表 8：高安市寺庵表

(录自(清)张鹏注修,熊松之纂:《高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永寿寺	上二十都	不详	公建	
2	禅那寺	南城鸣凤坊	不详	不详	
3	观音寺	南城高明门内	唐	不详	元末红巾贼至,传言有宝藏,掘发未遂,焚之,仅存二寮。明万历三十四年,邑令卢召僧募缘,铸接引铜佛,建无量殿居之。国朝康熙八年,全寺火,丈六金身亦毁。刘九嶷、胡起龙倡率更铸。十年,知县张文旦捐资,命僧本愚募众兴复之。
4	圆明寺	不详	清康熙八年	僧冰若	乾隆戊寅年,僧觉岸募

					邑人李芝蔚鼎建方丈。
5	灵泉寺	南城连通铺	不详	不详	明住持僧圃诚出谷赈饥，朝廷旌之，现有石碑存寺。
6	兴化寺	南城石桥东	不详	不详	与灵官庙接壁。正殿及毗卢阁，俱本坊徐姓同住持学明创建。
7	栖隐寺	南城靖安门内	不详	不详	康熙八年，郡守刘公登科，捐赀建正殿及两廊、厢房，规制稍宏。
8	南山寺	高明门内	不详	不详	基址佃与民家，杏树犹存。
9	大愚寺	朝阳门外	不详	不详	万历戊申，蜀僧真全住此，辟草莱而成之。田令一甲、冯令大任后先护法，而朱令道行又为捐俸，赎还旧业三十亩。未几，豪右肆侵，赖郡守鲁史力为献决，于是懒云窝之故址亦复。邑绅汪毓珍、营把张有功捐赀买田八工，地十亩，又赎回道人园地三亩。寺旁地五片，乃张氏捐入，共资香火之需。乾隆十三年春，奉旨赐紫，命住洞山普利寺主席野云彻和尚法嗣文达璋禅师，众姓延入方丈，乃同法弟文远质禅师捐资，买回寺背寺旁田十八工，载粮三斗五升。由罗汉会众置买王家园田五工，办额粮七升五合，存寺。
10	洞山寺	钟秀门外	不详	不详	为价禅师行脚憩息之所。山上清风亭，明郡守夏昶建。知府孟公命世、杨公朝公、葛公全忠，同知蒋公允修各捐助。
11	祥云寺	城外七里桥	不详	不详	原乌龟观，后改寺。
12	祥云寺	十二都	不详	不详	原隆真观，康熙五年，司马蒋允公修改额。
13	云居寺	石鼓潭上	不详	不详	康熙七年，僧空生募修正殿，胡起龙倡率新佛像，有诗。
14	寿圣寺	北城外西北隅	不详	吴智讷	
15	净居寺	县西四十里	隋开皇九年	不详	

16	涤尘寺	二十八都	不详	梅姓众建	
17	资寿寺	四都	不详	不详	旧址葛岭下，知州杨彦施山及田，遂迁焉。
18	郑公寺	四都	不详	石溪众立	
19	洪都寺	坎头	不详	不详	
20	多宝寺	石头街	不详	不详	
21	平林寺	五都	不详	不详	范世嘉同僧海昂修。
22	普光寺	六都	唐	不详	
23	远港寺	九都	不详	不详	
24	灵山寺	钧山东北	不详	不详	
25	南青莲	十一都	不详	不详	
	寺				
26	定林寺	十二都上泉墟 临江界	不详	不详	
27	普会寺	十二都兴隆山	清顺治庚寅 年	僧印初、悟 空建	
28	团山寺	三十六都	不详	七保公建	即雷神坛。
29	禅定寺	下坡十二都颖 江	不详	不详	
30	南建山	十三都龙城 寺	不详	敷文正	
31	超果寺	十四都东村	不详	不详	
32	福胜寺	十五都	不详	住持僧广学	
33	东华寺	十六都	不详	僧指月	
34	西隐寺	十六都横江	不详	僧亮成	
35	崇福寺	城南白鹤山	不详	不详	
36	崇福寺	十八都市上	不详	不详	
37	祝圣寺	三十三都三宝 岭	不详	不详	
38	罗佛寺	二十二都罗佛 港	清康熙元年	僧德慧	
39	香林寺	车田	不详	不详	
40	元兴寺	二十五都东山	清康熙八年	不详	
41	万善寺	二十五都李冈	不详	况春起、僧 朗空	
42	戒香寺	三十五都	不详	僧照慧	乾隆四十七年合都重 修。
43	青云寺	三十五都伍桥 何氏水口	不详	不详	乾隆己亥，僧克昌募族 增修。
44	宝福寺	三十都洪城	不详	不详	
45	北青莲	三十都艮山 寺	清顺治初年	僧了一	
46	西乾寺	三十三都	不详	不详	
47	明慧寺	三十二都	不详	合都公建	

48	淡云寺	三十四都	清康熙十年	僧洲淇	
49	米山寺	三十七都	不详	不详	寺粮一石，系都众施产。
50	北建山寺	三十八都	不详	不详	
51	北多宝寺	三十七都米山	不详	寺僧自建	朱文端公、徐春帆太史曾读书与此。
52	资福寺	四十一都	不详	不详	许国锐捐俸倡修，胡起龙助费并新佛像，僧性照募建，寺粮三石。
53	愿山寺	湾头	不详	刘九嶷	
54	碧莲寺	三十都泉水洞	不详	僧省文	田地、屋宇俱系自置。
55	靖忠寺	四十二都龙桥 西里许	不详	不详	
56	圆觉寺	丰乐乡	不详	不详	
57	净因寺	三十七都	不详	化城院法裔 如白	
58	圆通寺	二十九都村前	不详	不详	
59	回澜寺	社山水口	不详	不详	
60	兴隆寺	三十七都	不详	众建	
61	南山寺	四十二都舍前 团乌高山	不详	不详	
62	荷山寺	三十八都	不详	不详	
63	荷山寺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64	龙成寺	二十九都	不详	不详	朱文端读书处。
65	万松古刹	十七都	不详	不详	
66	太平院	朝阳门外	不详	不详	有田粮三石零。康熙初，郡守杨公、朝公捐赀创建，以供雪明和尚。其地四百余丈，周遭筑土垣，树松竹。
67	大愚塔院	懒云窝	清顺治辛丑	不详	
68	明心院	一都	不详	不详	
69	庆云院	二都	不详	溪上梁氏倡建	有粮九亩。
70	海会院	三都	唐	不详	粮五石有零。
71	宝梵院	三都	不详	不详	
72	尝乐院	七都	不详	不详	
73	法宝院	八都澧港	不详	不详	
74	万岁院	十都田西	不详	不详	计粮三石有零。
75	广福院	田西	不详	不详	
76	净慈院	十一都钧山之 西	不详	不详	院中有西涧祠，幸元龙为之记。
77	福胜院	珠湖	不详	不详	康熙五年，召僧觉明建

				佛殿，粮二石九斗。
78	明教院	五十五都白云山	宋	嵩禅师
79	永寿院	辽山水南	不详	不详
80	禅寂院	县后	不详	不详
81	永庆院	太平门外	不详	不详
82	鹫岭院	县西四十里龙岗	不详	不详
83	惠日院	三宝岭下	不详	不详
84	化成院	桑下桥	不详	杨、甘二姓 同僧隐松建
85	瑞相院	三十三都	不详	不详
86	普照院	米岭东	不详	不详
87	南山院	赤土	不详	陈氏施有田产，僧道佃其半。
88	慈云院	治东二十里	不详	不详
89	金峰院	铜溪	不详	不详
90	超果院	调露乡	不详	不详
91	惠灯院	荆田		
92	本觉院	斜桥	不详	不详
93	青莲院	故里塘	不详	不详
94	濯缨庵	不详	不详	不详
95	白衣庵	县学右侧	明崇正	不详
96	修竹庵	府治后	宋	文天祥
97	涤水庵	十三都乐溪	不详	吴季七
98	净土庵	迎恩门外	不详	不详
99	普渡庵	五可桥下	不详	涂良义
100	鳌香庵	三十六都下塘	明万历	僧行惠
101	龙家庵	北城外龙家坑	不详	不详
102	祥云庵	二十二都石鼓潭边	清顺治己亥	僧指源
103	集成庵	十一都	不详	西阳刘建
104	雾灵庵	二十二都高沙	清顺治三年	启明
105	茶坪庵	三十都	不详	舍山自立
106	茶庵	张坊板桥	不详	张昭伟
107	白沙庵	三十五都	清康熙戊申	僧德慧
108	马祖庵	四十都	不详	不详
109	益庵	拱辰门外	清康熙九年	不详 附徐氏书院。
110	礼佛庵	赤土	不详	不详
111	延祚庵	三十都	不详	不详
112	菩提庵	以易山	不详	不详
113	法华庵	十九都晒谷岭西	不详	不详
114	水云庵	十九都花苑渡	不详	僧恭伯

115	洁庵	状元坊	不详	刘九嶷	
116	慈云庵	南城东岳庙侧	不详	不详	
117	清净庵	十六都	不详	冷塘卢姓	
118	圆通庵	南关外	不详	不详	
119	普惠庵	南关外	不详	不详	前有甘露亭，曾大旺建；其山门及关帝像，城上李氏建。计民粮一石。
120	太洪庵	古祖桥	不详	不详	
121	广福庵	舍阳桥之南	不详	不详	
122	西来庵	朝阳门外	清顺治	僧法悟	
123	大慈庵	村前苏溪港侧	不详	僧闻思	
124	白云庵	庵前渡左	清顺治	僧寒岩	计粮一石有零。
125	白云庵	五都琴峰山	不详	不详	有田地及僧房。
126	青莲庵	三十六都	不详	公建	
127	长兴庵	珠湖	不详	僧无瑕	
128	上乘庵	五都龙头山	宋咸淳	不详	
129	西华庵	九都方山	不详	燥冈黄姓	
130	一宿庵	不详	不详	不详	
131	天竺庵	上湖铺	清顺治庚寅	僧宏学	自置田产。
132	中和庵	桂林	清康熙	邹然，僧宏机、若行	
133	西竺庵	七都	不详	不详	
134	栖云庵	五都荷山	清顺治辛卯	僧智和	
135	晋慧庵	平湖	清康熙癸卯	萧镇岳	
136	重润庵	二十九都	不详	不详	
137	护堤庵	二都喻坊堤侧	不详	梁家驹同众姓建	
138	古松庵	附于艾姓昭明祠之旁	不详	不详	艾以增倡首买田十亩，又栎山众助田一亩。
139	水口庵	二都溪上	不详	梁水亭	
140	慈庆庵	二十三都	不详	不详	
141	小林庵	十四都社冈背	不详	南湖邹氏	
142	福胜庵	十二都	不详	埠头杨氏	

表 9：铜鼓县寺庵表
(摘自同治十二年《义宁州志》、1989 年版《铜鼓县志》，南海出版公司)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大智胜院	二十一都	不详	不详	
2	金锡院	二十二都	不详	不详	
3	光相院	二十六都	不详	不详	
4	观心院	二十五都	不详	不详	
5	石相院	二十八都	不详	不详	

6	海藏院	二十八都	不详	不详	
7	万安寺	铜鼓偏西	清雍正	刘姓	
8	莲花庵	二十四都	不详	不详	
9	云峰院	五十三、四都	不详	不详	
10	明山寺	五十五都	元至正四年	不详	嘉靖年间，陈华吾裔、戴彝孙复修，添助山场以资
11	祝圣寺	五十三都狮子林	不详	不详	嘉庆十二年，叶应麟捐银估产，转施僧参孙住持。道光五年，寺火，产卖。经应麟孙叶清控，奉知州杨咏豳断，赎入寺，永禁典卖。八年，修复禅院。迄今称从
12	灵石庵	大塅乡光相村	宋	不详	

表 10：宜丰县寺庵表（录自同治十一年《新昌县志》）

序号	寺名	详细地址	建寺时间	创建者	其他
1	慈慧庵	西关外盐台山麓	明万历丁未	僧慧亮、性玉、性怀	
2	太平山	北关外左	不详	不详	
3	慧度院	平政桥西	宋淳熙	姚德卿	城北耆宿姚德卿施地鼎建。
4	延福寺	南关外	宋治平	僧观德	国朝顺治六年，邑绅漆嘉祉捐资，命僧性定募修。
5	净戒寺	县治北	不详	不详	寺有竹西亭。宋制，每遇圣寿于亭放生，以伸厘祝。庆元六年，知县陶曾于寺别创放生亭。
6	地藏庵	东关外走马冈之右	康熙元年	知县黄运启	国朝康熙元年，知县黄运启为母诵《地藏经》捐资修焉。
7	桂峰庵	县东二里	不详	僧海振	
8	善利庵	县东五里牌	不详	不详	国朝康熙十六年，总督董檄贼，师次于此，捐资一百两重修，勒石。
9	崇文塔寺	县南门外二里一都地方	不详	不详	明天启六年，知县沈希韶率绅士相基创建一级。崇祯四年，合邑绅士增修二级；十三年，邑绅漆嘉祉、吴泰来、陈泰来增修三级。国朝康熙元年，知县黄运启、邑绅毛逵捐助倡率合邑续修四级、五级。康熙五十六年，

					知县唐纪率绅士等捐修二级，于是合尖，后渐圮坏。乾隆四十一年，合邑捐金重修。寺在塔左。（康熙）二十二年，知县吉必兆捐资，僧松裔募修。旧有香火田五十三亩。
10	三峰净 觉禅寺	一都	不详	不详	宋觉范受业之所。
11	宝云寺	二都石门桥	不详	不详	宋觉范静室。
12	准提庵	二都佛子岭	不详	城东蔡氏	
13	仍庵	三都	不详	漆调祚	
14	度门院	三都	不详	不详	龚端曾读书于此，觉范访之。
15	宝福院	三都	不详	僧慧云	
16	景福院	三都	不详	不详	
17	梯云塔	三都藤桥地方	不详	天宝乡三十 一、二、三、 四都公建	下有附青寺。
18	清梵院	四都	不详	不详	同治四年，县宪沈偕合 邑绅士、僧清澈募化重修。
19	此饗庵	五都双峰	不详	不详	邑宦陈泰来舍产，僧行 格重建。
20	崇福庵	五都杨林岭背	不详	僧照盛	
21	宝林院	五都	不详	不详	
22	隆教院	五都	不详	不详	
23	资恩院	五都	不详	不详	
24	源远庵	五都东源水口	不详	不详	
25	离相院	六都	不详	不详	
26	大智寺	六都	不详	不详	
27	报恩寺	六都浪源	不详	不详	嘉庆丁丑年，吴氏重修， 改名汇源庵。
28	圆福庵	七上监	不详	不详	
29	圆明庵	七都石涌水口	不详	不详	
30	青龙庵	七都小港	不详	不详	
31	观音院	七都	不详	不详	
32	香社院	八都	不详	不详	
33	狮子庵	八都	不详	不详	
34	禄苑庵	八都	不详	不详	
35	莲花庵	八都	不详	不详	
36	惠秀庵	八都	不详	不详	
37	鹿苑禅 寺	八都	不详	不详	
38	东山庵	九都	不详	黎氏众建	

39	带庵	九都	不详	宁若思族众	庠生宁若思倡族建。
40	元兴庵	九都石溪	不详	刘姓众建	
41	梵行院	九都	不详	不详	
42	元觉庵	十都	不详	不详	
43	兴隆庵	十都	不详	不详	
44	星振庵	十都	不详	不详	
45	墨林庵	十都墨塘	不详	不详	
46	澄心院	十都夏讲水口	不详	不详	
47	回龙庵	十都庙前	不详	不详	
48	福河院	十都	不详	卢敬甫众建	
49	定慧寺	十一都	不详	不详	
50	青云寺	十一都城上	不详	刘姓	
51	石点庵	十一都楼下	不详	不详	道光辛卯，李袭宗众重修。
52	天竺庵	十一都火溪	不详	李姓	
53	伏龙庵	十一都	不详	不详	
54	西竺寺	十一都荷塘	不详	伍姓	
55	清凉禅寺	十二都	不详	不详	隋九年，将军漆兴公舍宅为寺。（宋）丞相张商英、节度使郭天信奏敕建报恩禅寺，并赐觉范“宝镜圆明”之号。明崇正驾部漆园购址建殿。国朝康熙己酉，明经调祚建藏经阁，延济宗丕穆禅师。
56	崇会庵	十二都	不详	不详	庠生况斌捐基，众建。
57	普渡庵	十二都	不详	邹氏	熊氏捐基，石埠邹氏建。
58	青龙庵	十二都大汾	不详	邹氏	
59	白云庵	十二都下陂	不详	邹性谦	
60	广佑庵	十二都	不详	良冈任氏	
61	蕊珠庵	十二都樟溪	不详	漆氏	
62	石泉庵	十二都湖东	不详	况宇成众建	
63	常乐院	十二都漫溪	不详	漆氏元万	
64	华严院	十二都	不详	不详	
65	百福院	十三都梅溪	不详	不详	
66	大智寺	十三都竹垣里	不详	不详	
67	智门禅寺	十三都	不详	不详	
68	杨柳庵	十三都澄塘	不详	不详	
69	慧照院	十三都	不详	不详	
70	保圣院	十三都	不详	不详	
71	东山寺	十三都澄溪	不详	李氏	
72	彰圣院	十四都	不详	不详	
73	宝相院	十四都	不详	不详	

74	月影寺	十四都赤港	不详	不详
75	钟英寺	十四都柄下	不详	不详
76	广文寺	十五都湾溪	不详	陶氏众建
77	湖山寺	十五都洋湖	不详	众建
78	青龙庵	十五都	不详	不详
79	护国庵	十五都	不详	不详
80	楞严庵	路塘	不详	不详
81	光相院	十六都	不详	不详
82	小洞山	十六都大荷岭	不详	僧普善
83	回龙庵	十七都大岭	不详	不详
84	栖隐院	十七都	不详	不详
85	西来寺	十七都	不详	不详
86	栖月寺	十七都荷舍	不详	李氏
87	祥云寺	十七都荷舍	不详	李氏
88	净云寺	十七都荷舍	不详	李氏
89	香积院	十八都	不详	不详
90	等慈院	十八都	不详	不详
91	崇文院	十八都	不详	不详
92	崇化院	十八都澄溪	不详	龚建
93	永福寺	十八都大山下	不详	王姓
94	湖腾寺	十八都	不详	不详
95	东林寺	十八都东陂	不详	陈姓内族
96	延庆庵	十八都东陂	不详	陈姓内族
97	进龙寺	十九都	不详	高任之
98	观澜寺	二十都讲堂	不详	不详
99	祥云寺	二十都	不详	不详
100	广福寺	二十都西	不详	刘志亨众建
101	聚秀塔 院	二十都西	不详	刘志亨众建
102	普福庵	二十都沙塘水 口	不详	不详
103	柳林庵	二十一都樟洲 下	不详	不详
104	鱼形寺	二十二都	不详	毛伦
105	茶花庵	二十二都	不详	不详
106	利生院	二十二都	不详	不详
107	迦叶院	二十二都	不详	僧省于 嘉庆二十一年，二十二 都众重建。
108	青云寺	二十三都湖城	元延祐	不详 明天启元年，黄英文倡 修。国朝顺治十七年，皇甫 瑞等修葺之，仍旧名。
109	地胜庵	二十三都	不详	不详 监生黄家让督驯懋捐 修。
110	普福寺	二十三都梅墩	不详	不详

水口				
111	永镇寺	二十三都筠山 水口	不详	不详
112	爱莲寺	二十三都洪冈 寺后	不详	不详
113	云兴寺	二十三都	不详	不详
114	广福寺	二十四都	不详	不详
115	福垣寺	二十四都南垣 口松林下	宋	姚文德
116	凝福寺	二十四都楼下 水口	不详	不详
117	净土庵	二十四都小水	不详	姚姓
118	白莲庵	二十四都	不详	僧蕊融
119	吉祥庵	二十四都	明嘉靖	熊姓
120	真如院	二十四都	不详	不详
121	龙泉山 寺	二十四都	不详	万姓众建
122	锦江寺	二十五都坊里 水口	不详	不详
123	福海院	二十六都	不详	不详
124	大狮塔 寺	二十六都石门	不详	毛氏 有唐三藏塔墓显迹，岁 旱祷之即雨。
125	法润清 凉禅寺	二十六都	不详	不详
126	永兴庵	二十七都	不详	僧省吾
127	登仙庵	二十七都	不详	不详
128	化成院	二十七都	不详	不详
129	正觉院	二十七都	不详	不详
130	觉性院	二十七都	不详	不详 正德壬申，盗贼扰境， 县丞朱袞驻兵于此。
131	福兴寺	二十七都同安	不详	张子博支下 建
132	正福寺	二十七都	不详	不详
133	同登寺	二十七都	不详	毛凤勉
134	西竺寺	二十七都	不详	张宗迪
135	清福寺	二十七都	不详	刘子受
136	圆明禅 寺	二十七都	不详	不详
137	莲花寺	二十八都	不详	张端甫众建
138	虎溪庵	二十八都	不详	不详
139	演教院	二十八都	不详	不详
140	南渚寺	二十八都	不详	冷定翁
141	跃龙寺	二十八都	不详	赵姓众建
142	沿溪寺	二十八都	不详	不详

143	东华庵	二十八都	不详	熊姓众建	
144	永福寺	二十八都花桥	不详	邑绅席廷藻	
145	宣梵院	二十九都	不详	张智英	后裔重建
146	天龙庵	二十九都	不详	张姓	
147	培因寺	二十九都同安	不详	张立功	
148	水月寺	二十九都	不详	张宗彦	
149	浮洲寺	二十九都	不详	张氏众建	
150	琴山寺	二十九都	不详	横冈新居	
151	东山寺	二十九都同安	不详	谢氏	张文虹妻谢氏夜梦有妇人借居。次日，一妇人囊盛铜观音叩门求售，遂感梦，建寺以奉铜像。
152	洞山普利禅寺	三十都	唐大中	良价	唐大中时，良价禅师募雷衡地建广福寺。中有新丰、洞云二亭，逢渠桥，考功泉，夜合石诸胜。后更名“功德禅寺”、“崇先隆报禅寺”。胡提举俊孚为铸洪钟。宋真宗、仁宗赐御书飞白草字并经传六十卷。黄庭坚书《新丰吟》，苏辙有与文长老及谢石台诗。元末皆毁于兵，寺基久废。明万历间，丈量入版籍。崇祯中，举人戴国士得其产，逐释净聪与其徒智度重建焉。知府陶履中有记，国朝知府杨仲兴有题咏。
153	荆峰庵	三十都	不详	僧道性	
154	金峰庵	三十都	不详	张崇福	
155	留云堂	三十都洞山之东三里许	清康熙庚申年	禅师已任同徒道元	
156	太子塔寺	三十一都	唐	不详	肃宗第十四子僖禅师出家，从南阳忠国师居此，赐田甚广，有真身塔存焉。
157	资福寺	三十一都洴田岭	唐	肃宗太子僖	距太子塔数里，有白象眠云、曹溪溯古、松关憩锡、僖公石像诸胜，久废。国朝康熙庚申，道昱禅师挂锡逍遙，适毛奎公以资福故址还，遂重兴本寺。
158	云峰山寺	三十一都	唐	不详	唐忠国师偕僖禅师卓锡之所。
159	资寿寺	三十一都	唐	不详	宋苏辙有聪禅师塔碑。
160	太平庵	三十一都路溪	不详	僧德彬	

左					
161	西平院	三十一都	不详	不详	
162	禅悦寺	三十二都枫林	宋淳熙	不详	陈希尚重建，嗣孙文忠 塑修合寺神像。国朝康熙， 嗣孙杰生捐助竹山田种。
163	章山寺	三十三都辛会 山后	不详	僧知枢募建	
164	凤凰庵	三十三都仙人 石上	不详	不详	
165	万福庵	三十三都辛会 山左峰	不详	不详	俗名“仙姑坛”，墨庄 刘姓数次修葺。
166	宏文庵	三十三都	不详	辛会市建	
167	慈寿院	三十三都	不详	不详	
168	竹影寺	三十三都	不详	不详	
169	净慧院	三十四都	不详	不详	
170	祥云寺	三十四都	不详	不详	
171	阳明庵	三十四都	不详	不详	
172	净行院	三十四都	不详	不详	
173	法林院	三十五都	不详	不详	
174	吉祥院	三十六都	不详	不详	
175	戒香院	三十六都	不详	不详	
176	永福院	三十六都	不详	不详	
177	智林寺	三十六都	不详	不详	
178	金地院	三十七都	不详	不详	
179	崇福寺	三十七都塘溪 水口	不详	不详	
180	观平院	三十八都	不详	不详	
181	常寂院	三十八都	不详	不详	
182	广教院	三十八都泉塘	不详	不详	
183	广慧院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184	定光院	三十九都	不详	陈泰来	
185	黄檗寺	四十都	唐	不详	断际禅师希运道场也。 临济宗风遍于海内，实于兹 山得法云。宋绍兴九年，赐 名报恩光孝禅寺，奉徽宗香 火。明中叶，寺圮。崇正己巳， 南昌文学甘维理、副使 朱以仪捐构，延释常愚及照 通兴复之。先是普同塔基并 四周山林俱属熊汝德私产， 汝德因以施于本寺，乃重修 葺，吴甘来作记。
186	福云庵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187	护龙庵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188	伏龙庵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189	金堆庵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190	白云庵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191	西竺庵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192	良缘庵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193	五峰寺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唐大中改曰“普利”， 柳公权书额。宋苏文定书《楞 严标指姚义》十卷，文定夫 人史氏印施，丞相益公周必 大为之跋记刻石。元翰林学 士乔迁书“观音堂”三字， 僧嗣鑫立石。明成化间废为 民产。国朝顺治十三年，邑 庠生熊瑛夫捐赎，迎释济照 修复。与洞山、黄檗称三祖 庭云。
194	白茅庵	三十九都打铁 坳	不详	不详	
195	青莲寺	四十都芭蕉桥	不详	不详	
196	鼓城寺	四十都港口牛 林山尾	明崇正	胡龙成	
197	宝梵院	四十都	不详	不详	
198	集云庵	四十都	不详	不详	
199	福惠庵	四十都	不详	不详	
200	清莲庵	四十都桐木	不详	不详	
201	万寿崇 圣禅寺	四十都	不详	不详	
202	积翠庵	四十都	不详	不详	
203	茅竹庵	四十都湖溪	不详	不详	
204	狮山庵	四十一都	不详	芳塘熊氏	
205	宝积寺	四十一都	不详	不详	
206	惠香院	四十一都	不详	不详	
207	清净庵	三都	不详	不详	
208	天竺寺	五都	不详	邑庠熊维周	旁有书室，颜曰“敬畏 堂”，子孙多肄业于此。
209	西水庵	七都禹村	不详	不详	
210	复兴寺	七都塔坑	不详	卢勇忠	孙长金重修。
211	东林寺	三十九都潮溪	不详	不详	
212	金莲庵	三十九都	不详	不详	
213	万福庵	城隍庙内左侧	不详	不详	
214	金峰寺	西桥背长人岭 下	清嘉庆十四 年	蔡仲堪	
215	钟圣寺	四都太平岭	不详	不详	
216	田南庵	四都柴源水口	不详	陈氏众建	

217	高台寺	四都双丫尖	不详	陈泰采	其围寺山田，乾隆七年 钟继芳、红芳兄弟承买，仍 助本寺。
218	茶溪庵	五都龙溪屋后	不详	吴氏众建	
219	朝阳庵	九都	不详	宁氏众建	
220	西竺庵	十都照溪	不详	伍氏众建	
221	种福寺	二十七都	不详	张煦成	
222	女修庵	二十九都	不详	张曜日	
223	普济庵	二十九都燕堦	不详	张宽甫	
224	洞云庵	三十都	不详	张谦	立有田租四十三石以供 香火。
225	凤山寺	三十一都萧姓 水口			
226	藻龙庵	三十二都龙冈	不详	邹文裔	南门水口
227	溪云山 寺	四十一都芳塘 水口			
228	观音堂	三十二都下石 桥		合乡众建	
229	岫青寺	三十六都鹤溪	不详	徐氏众建	
230	福因寺	二十一都柏树	清乾隆十九 年	不详	
231	祥云寺	二十都	不详	胡姓众建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信仰与地方社会：唐中叶以来禅宗三大祖庭在宜春的文化建构》[J]，江西社会科学，2016.
- 2、《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在民间信仰中的整合——以明清南方地区龙母信仰为例》[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6.
- 3、《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普庵信仰的生根、扩散》[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6.